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重庆市一级期刊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9 772096 337254

01>

2025/1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二五年第一期（总第四十九期第九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本刊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2023年10月修订）反映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敬请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对照处理，以使稿件经制度化流程得到更高效率的办理。

一、常设专题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三、具体要求

（一）导向。稿件须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注意防范具体表述、引用注释或参考文献、图表中的话语歧义与隐形意识形态风险。我刊在审编校全程中对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稿件实行“一票否决”。

（二）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及时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坚持大统战视角，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避免“就统战谈统战”。

（三）立论。立论基础坚实，问题提出部分应包含研究背景陈述、文献述评、创新点阐述等内容。要有精到的文献综述，开门见山地指出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政策依据、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且实际引用了大量的期刊前沿文献。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不少于10条，同时注意回溯三年以上的代表性论文。

（四）论证。论证中注意材料支撑，使用丰富、可信、有说服力的论据，避免泛泛而谈。题目、摘要、关键词、图表应做到规范、简洁、清晰。

（五）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文法规范，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逻辑错误。请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如发现问题较多、学术态度不端正的，特别是如在编校中发现文字硬伤、低级文字错漏情形，即使已经审理录用的稿件也将作退稿处理。

（六）注释与参考文献。注释使用尾注体例。引用各类文献时务必核实原文，确保准确性。参考文献体例详见《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https://mp.weixin.qq.com/s/kv8cyCnRcp7QbkYXlJeX0g>。

（七）篇幅。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的优秀论文篇幅可达1 5000~20 000字左右。

（八）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一般不高于15%。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九）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一个月。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审稿流程：一审→二审（含专家外审）→三审。

（十）其他约定。对契合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的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十一）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二）联系方式。电话：（023）62874725；微信公众号：tyzxxxyj；开放获取：<https://cqsy.net.cn/?Tongyi/Zhanxian/>。

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详版请见本刊微信公众号相关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5 年第 1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 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 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 俊
李 捷 杨 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 俭 张 建 张献生
陈 纪 陈 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相德宝 袁 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 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主 编：王 鸿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5 年第 1 期（总第 49 期）
双月刊 2017 年创刊 第 9 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两个结合”视角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 01 “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 肖存良
13 “两个结合”视角下协商民主的价值逻辑 / 冯辰翔 张树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民族大团结研究

- 25 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析、实践探索和当代启示
/ 张淑娟 王 硕
41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与实践 / 张冠华
53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与实践维度 / 陈文元
63 《黑神话：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路径与启示——基于文化符号视角 / 李培鑫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红线观与实践研究

- 7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实践进路及原创性贡献
/ 魏崇辉 李垠辰
9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与价值意蕴
/ 张嘉升 杜艳华
1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丰富内涵与实践方略
/ 刘金华 杨志平

- ◎ CSSCI (2023—2024) 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115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演变

/ 张 建 姜星宇

132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 徐 政 宁尚通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专题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经验与启示研究

143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八大经验 / 焦洪昌 何智伟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全球超级选举年选后效应与大变局下世界政党政治走向研究

157 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及其影响 / 钟厚涛

研究现状与动态

168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图景与实践进路

——基于“三大体系”视角 / 刘春泽 张 换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5 No.1(Sum No.49) Vol.9

- 01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CP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Xiao Cunliang
- 13 The Value Logic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Feng Chenxiang&Zhang Shuhua
- 25 Deng Xiaoping's Theoretical Analysis,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Zhang Shujuan&Wang Shuo
- 41 Th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y Belongs to the Chinese Nation Economy" Zhang Guanhua
- 53 The Key Elements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of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Background Chen Wen yuan
- 63 The Logic, Path and Inspiration of "Black Myth: Wukong" Empowering the "Two Innovations" i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Li Peixin
- 77 The Core Meaning, Practical Approach and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the Red Line
Wei Chonghui&Li Yinchen
- 90 The Generative logic, Main Content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the Red Line
Zhang Jiasheng&Du Yanhua
- 103 The Generating Basis, Rich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Strategy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the Red Line
Liu Jinhua&Yang Zhiping
- 115 The Evolution of China and America High–Level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ince Trump's First Term
Zhang Jian&Jiang Xingyu
- 132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Xu zheng&Ning Shangtong
- 143 Eight Experiences of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Macao Jiao Hongchang&He Zhiwei
- 157 The Trend and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s Policy Towards Taiwan during Trump 2.0 Period Zhong Houtao
- 168 The Value Picture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Stud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Major Systems" Liu Chunze&Zhang Huan



“两个结合”视野下的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肖存良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从“两个结合”视野反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发现“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一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也是“两个结合”与统一战线相互契合的创新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法宝论、又团结又斗争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独立自主原则等理论观点，形成了自身丰富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求同存异理论，推动了统一战线的现代化转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理论、“两个健康”理论、“五大关系”理论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实现了统一战线与“两个结合”的有机统一，提出了“政治力量”论、“政治同心圆”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论、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这些创新理论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又成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核心内容。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1.001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24ZDA065）

作者简介：肖存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引用格式：肖存良.“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J].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1-12.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1-0001-12

一、问题的提出

自 1922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政策之后，统一战线在我国经历了百余年发展历程。在其发展过程中，统一战线一方面实现了本土化，由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的统一战线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创新，产生了大量新思想和新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统一战线为什么能够实现持续理论创新？统一战线依靠什么进行持续理论创新？这是统一战线史研究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而“‘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1]。这为我们解答百余年来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两个结合”与百余年来统一战线理论创新高度契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和改革时期，“两个结合”推动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诞生，实现了统一战线“为革命服务”向“为现代化服务”的转型。新时代，“两个结合”推动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促进巩固和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学术界目前没有从“两个结合”视野整理梳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研究。现有研究要么探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2]，要么从“第二个结合”视角探讨统一战线的作用与地位^[3]，要么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相结合，探讨如何实现“统战以德”^[4]。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探讨“两个结合”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

二、“两个结合”视野下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从苏维埃俄国传入我国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理解、运用和发展，对其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 and 把握，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整体上偏重统一战线，一定程度上忽视武装斗争，尚不能有效地把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1922 年，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与国民党实施党外合作的国共合作方案。1923 年召开的党的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身组织独立性。陈独秀和马林在会上解释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的代表性政党，应该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应该帮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取得国民革命胜利，因而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5]。1924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

肖存良. “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1-12.

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5] 16-17}。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协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进行两次东征、统一广东全省,然后挥师北伐。北伐军半年之内由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推动国民党由仅执掌广东一省的地方性政权一跃成为全国性政权。然而,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反戈一击,图谋消灭共产党,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迅速遭到失败。

毛泽东从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相互关系的视角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原因。他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6] 归根结底,大革命失败原因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7],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尚不能成熟地使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也不能把它与武装斗争有效结合起来使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整体上偏重武装斗争,一定程度上忽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范畴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与知识分子的联系不紧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对其他党派不加区别地视为“敌人”,一度把邓演达、谭平山组织的“第三党”看作“统治阶级的奸细”^{[5] 43};对国民党改组派一律排斥;福建事变发生后,19路军主动提出与红军靠拢,双方合作反蒋,但是红军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没有与19路军配合作战。红军也在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挫折,进行了长征;党在白区和苏区的工作也遭到了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7] 792} 归根结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等采取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7] 792},同样没有把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有效结合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六届中全会上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6] 534}。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来看,在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的关系上,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团结与斗争相结合,“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7] 792}。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艰苦的建设工作,真正全面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胡绳在论述这段历史时指出:“又要武装斗争,又要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中,又要团结,又要善于同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做斗争。这一套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熟起来,摆脱了旧的公式。”^[8]

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运用步入正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标志着统一战线成为中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而不仅仅是共产国际输出的统一战线。

第一，中国共产党把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区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明确“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6] 745}。进步势力主要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大力发展；中间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与地方实力派，他们具有动摇性，如果不坚持团结与斗争相结合，他们就会像大革命时期一样，在顽固派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变成他们的同盟军。但是“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6] 748}。对顽固派则要进行坚决斗争，但是斗争也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三是休战原则，打退顽固派进攻之后适可而止。上述三原则，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有理”“有利”“有节”^{[6] 749-750}。中国共产党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了大革命时期“只会团结不会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只会斗争不会团结”的问题，既牢牢地把握了团结与斗争的主动权，又紧密地团结了中间势力，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不再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样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而是认识到“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6] 750}。国民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9]。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力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中派、打击右派，这就解决了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导致中派倒向右派，联合打击左派等问题。

第三，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6] 648}因而，新民主主义政权实际上就是统一战线政权，“三三制”政权形态则是当时统一战线政权的表现形式。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因素充分发展但又趋向于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张力塑造了这种社会形态的生机与活力，二者之间的并存共生是这种社会形态存在的前提，二者之间的统一战线是这种社会形态存在的现实基础。没有统一战线，我们就无法深刻而全面地理解新民主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因而新民主主义概念本身就内在包含着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既赋予统一战线以必然性，又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得以升华，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后完全中国化的产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首先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协调与国民党之间的官方关系，深入国民党统治区，通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肖存良. “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1-12.

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 以职业为掩护, 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10], 深深扎根国民党统治区, 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组织群众开展政治运动。在政治运动中, 抛头露面的往往不是共产党员, 再加上单线联系网络和严格的组织纪律, 国民党难以真正掌握共产党员的行踪。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 则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这样就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结合成了有机的统一体。在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公开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结合起来, 通过武装斗争占领敌后区域, 既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 又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推动基层组织发展壮大。通过建党建政建军三者有机结合, 中国共产党能够迅速在敌后扎根, 建立起一批敌后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熟练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 建立了一个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而巩固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 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7] 1466}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把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彻底孤立起来, 推动中国共产党仅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总之,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教训之后,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提出了法宝理论、又团结又斗争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独立自主原则等理论观点, 形成了自身丰富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 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两个结合”视野下建设和改革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根据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建国、开国建政后大量进入国家政权的具体实际,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合作、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和“要有两个万岁, 一个是共产党万岁, 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的“两个万岁”思想^{[5] 257-260}; 根据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具体实际, 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思想^[11]; 根据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具体实际, 提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方针^{[5] 231}; 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的积极变化, 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理论^[12]。这些思想理论创新既是社会具体实际的产物, 又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反复强调两个方面: 一是解放思想, 实现思想意识上的民主, 由民主解放思想, 推动改革开放; 二是统一战线, 通过统一战线获取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统一战线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 首先要解决其性质问题, 即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定性问题。如果还是沿用以往革命统一战线的传统定性, 继续对统战人士进行阶级斗争, 就难以推动他们真正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浪潮中来, 因而迫切需要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际, 运用“第二个结合”,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新时期统一战线发展所需要的思想资源, 从中国的文化基因、语言和思维中科学界定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

第一, 根据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 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是爱国统一战线, 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给予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改造和进步以重大影响。作为一种具有伟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文化传统，它使中华民族能够经受住无数自然的、社会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一直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13]。从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爱国主义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能够激发广大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内心的文化认同、前来大陆投资兴业，带来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资源。

邓小平在 1979 年 6 月 15 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14]该论断阐明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同年 9 月 1 日，邓小平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爱的统一战线，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这样范围就宽了，具有广泛的性质”^{[14] 159}，“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回归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14] 158}。“革命的爱的统一战线”的提法还具有一定的复合性质，把革命统一战线与爱国统一战线结合在一起。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了“爱国统一战线”这一概念^[15]。这一概念既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定了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确定之后，统一战线实现了由革命化向现代化转型，推动了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前来祖国投资兴业，也推动了统一战线走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之中，从而形成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产生了“两个范围联盟”“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海外统战工作”“统一战线‘三者’联盟”等新概念和新判断^{[15] 16-32}。这些新概念和新判断都建立在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定性基础之上。

第二，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同存异的理念，提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基本原则。《周易·睽卦·象传》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同与异、和与同都是重要概念。客观世界纷繁复杂、变化不断，这是异。万物有联系，前后相贯通，这是同。同与异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以存异，异以成同。“求同”是指寻求双方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存异”是指双方暂时搁置彼此在价值观和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求同”和“存异”都是手段，目的是双方共生共存、交流合作、共同发展^[16]，君子因此求大同而存小异。

求同存异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华民族智慧结晶，中国共产党把它视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1991 年，江泽民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在政协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都要学会求同存异。求同，就是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大同；存异，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照顾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和意见，并通过各自学习和互相协商、互相监督，共同提高，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逐步达成一致。”1999 年，李瑞环在全国党内省部级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班座谈会上指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需要把握许多重要原则，但有一条特别需要引起重视，这就是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原则。”^{[15] 46}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现代化推进了市场化，市场化推进了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引起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对统一战线产生了强烈影响，另一方

肖存良. “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12.

面统一战线在回应这种影响的过程中又进行了理论创新,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这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 社会分化与社会结构变化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领域具体实际的重要体现。

第一, 市场化改革之后我国大量知识分子“下海”, 由体制内单位进入体制外的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工作或自主创业。据此, 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这一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基础理论。1992年,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转发中央统战部〈九十年代统一战线部门工作纲要〉的通知》中, 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通知》指出, 在我国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占大多数, 各个领域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统一战线工作就有了基础, 并强调统战部门要重点做好有代表性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1993年, 第十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再次强调,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 需要大力加强。在1993年的机构改革中,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在知识分子工作方面的主要职责是: 调查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 反映意见, 协调关系, 提出政策建议; 联系并培养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负责教科文卫和国有大型企业中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5] 427-428}。

第二, 根据市场化改革之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概念和“两个健康”(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理论。2001年,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 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时使用的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提法。2002年,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上述“六种人员”, 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从而正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科学论断, 并由此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论断, 科学界定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地位, 回答了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而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5] 426-427}。这既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 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又推动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使统一战线理论紧密结合社会实际、对经济社会变化保持高度回应性。

第三, 根据市场化改革之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提出统一战线要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的理论。2006年7月, 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 “我想着重谈谈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这是政治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些重大关系, 也是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重大关系和谐,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 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 事关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17] 2006年10月, 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写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 “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五大关系”成为党的总任务、总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5] 487}。

总之，在“两个结合”视野下，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万岁”思想、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两个范围联盟理论、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理论、三者联盟理论、“两个健康”理论和“五大关系”理论等，进一步推进了统一战线本土化、时代化，统一战线理论更为丰富多彩。

四、“两个结合”视野下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尤其关注新时代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变化。这种社会结构变化既与新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化一脉相承，又体现出很多新时代的新特征。

第一，个体化。改革开放推进了现代化，现代化必然导致社会分化。一方面，社会分化表现为社会的个体化，个体从单位制中出来之后进入市场，成为独立的社会个体或市场经营主体。另一方面，独立的社会个体又会在市场和社会之中根据业缘、地缘、趣缘、学缘等因素而在社会中基于市场化条件再次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丰富多彩的社会分层结构。这样的最终结果是，原有的阶级阶层内部发生分化，原有的阶级中会产生新的阶层。新的社会力量分化出来后，会产生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会使整个社会阶层结构更为多元。执政党要对新旧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进行有机整合，其重要方式就是统一战线^[18]。

第二，群体化。社会个体化之后，独立的个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在市场中与他人交往，个体在与他人交往中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或实现个人价值，推动个体与利益一致或价值观念一致的主体结合，组成社会群体。这时候的社会群体不再是原来基于行政化而形成的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群体，而是基于市场化而形成的以社会化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如网络作家群体、职业电竞选手群体、律师群体等。

第三，网络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新增网民 2 480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19]。互联网在我国不但成为一种生产形态和生活形态，也成为一种社会形态和社会交往方式，线上社会和线下社会都是实实在在的现代社会。当社会进入网络化时代之后，统一战线密切关注社会网络化对自身产生的影响。网络统战工作形式多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网络企业为主的网络统战工作，这种统战工作与线下企业统战工作既有一致性，又有特殊性；二是以网络人士为主的网络统战工作，这种统战工作既关注以网络言论和影响社会舆论为核心的网络大咖，又关注以网络为谋生手段、通过网络经营维持个人生活的网络人士，如网络作家、职业网红等。

肖存良.“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1-12.

第四,智能化。智能化主要是指社会逐步进入数字时代和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智能化不同于网络化,是比网络化更为高阶的社会形态。目前,人工智能已经逐步进入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变成一种社会形态,引起社会结构变化。在统一战线领域,人工智能部分进入了统战文化和统战宣传,如利用VR技术推进统战历史文化资源的建设与保护,实现“在线+在场”的融合发展等。当然,智能化对社会结构变化和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影响,尚需跟随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而深入观察。

根据新时代社会结构变化,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统一战线紧跟社会结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

第一,根据新时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工作方针,逐步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系统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的战略判断。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2017年召开了全国首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由原来的“六种人”变为“四种人”,同时提出了“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工作方针,以及组织起来、凝聚起来的基本工作思路,建立了从全国到省市县各个层次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把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凝聚起来^[20]。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在新时代统战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根据群体化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统战工作和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等新概念。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包括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和行业协会等社会群体中的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在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新社会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等机构中从业的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主要是指大量“自雇人士”,他们凭一技之长而不受雇于任何单位,包括网络作家、独立设计师、心理咨询师等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上述新概念一方面拓展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范围,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工作面,另一方面高度关注了社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新兴社会群体。

第三,根据网络化时代的社会实际,提出了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和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等新概念。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人士都是随着网络技术、新媒体迅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兴社会群体。2014年,中央统战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促进新媒体行业健康发展和新媒体从业人员健康成长为主题,以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新媒体行业代表人士为重点,把新媒体从业人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5] 571}。网络人士泛指在互联网上有影响力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党外人士,主要分布在体制外,可以具体概括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平台,从事经营管理、生产传播、技术研发、投融资等活动,具有舆论传播能力、内容生产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人员。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是指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把各类从事网络活动的党外人士,特别是从事内容生产和传播的网络人士团结凝聚到党周围,通过与网络人士建立统一战线,建构网上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政治同心圆。2019年,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加强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联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对做好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字统战等新概念即将诞生,需要进行相应

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在“第二个结合”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形成了更为强烈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又成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核心内容。

第一，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德政”“仁政”的思想主张，以及“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传统智慧，强调统战工作要关注人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形成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治力量”论。第二，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强调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把求同存异发展为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治同心圆”论。第三，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和“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文化精神，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理论，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这是新时代以来围绕我国政党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20] 42}。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座谈会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首次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第四，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第五，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清、慎、勤”的为政传统，儒家“义利”观念，以及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强调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理论^[21]。第六，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形成了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论^[22]。第七，继承和发展“和谐”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和”或“和谐”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作为概念在西周晚期正式提出。春秋末期，晏婴、老子和孔子等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很重视“和”，将它作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核心概念来看待^{[16] 1}。“和”作为不同因素的和谐统一，内在需要协商，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3]

总之，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并把“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与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统一起来，提出了“政治力量”论、“政治同心圆”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论。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

肖存良. “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12.

发展的新成就。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实践,以不断谱写新篇章的创造性成果,诠释了坚持“两个结合”是党青春永驻、基业长青的密钥所在^[24]。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演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轨迹^[25]。“两个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两个结合”推动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成为百余年来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一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也是“两个结合”与统一战线相互契合的创新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法宝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确定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提出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以及“两个万岁”思想、两个范围联盟理论、三者联盟理论、五大关系理论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提出了“政治力量”论、“政治同心圆”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等。这些创新理论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又成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2] 张凤政.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中国化的“两个结合” [J]. 重庆行政, 2022 (4): 84-87.
- [3] 李素军.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阐释 [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2): 5-11.
- [4] 原晓龙. 统战以“德”——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J].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3): 29-38.
- [5] 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2017: 13.
- [6]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44.
- [7]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92.
- [8] 金冲及. 一本书的历史: 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114.
- [9]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47.
- [10]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231.
- [11]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 下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688-689.
- [12] 周恩来选集: 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62.
- [13] 甘葆露, 张耕民. 当代爱国主义浅说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12.
- [14]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156.

[15]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统一战线 100 个由来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14.

[16] 丁四新, 等. 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5.

[17] 胡锦涛文选: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471.

[18] 林尚立. 分化与整合: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战略取向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 (1): 30-32.

[19]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 [EB/OL]. (2024-03-22) [2024-06-27]. 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9007251064981248275.

[20] 张献生. 新时代统一战线知识简明读本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0: 95-97.

[21]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253-254.

[22] 中共中央统战部. 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J]. 求是, 2024 (2): 23-28.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73.

[24] 齐卫平. “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实践 [J]. 中共党史研究, 2023 (3): 17-24.

[25] 陈明明, 杨东光.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12.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王京菁



“两个结合”视角下协商民主的价值逻辑

冯辰翔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2401）

摘 要：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政治建设中探索形成的重要民主形式。从“两个结合”视角看，协商民主理论以人民民主的内核实现了从西方话语体系向中国话语体系的转变。协商民主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四个基础”贯穿着鲜明的价值逻辑，是有根、有源的文化积淀与复杂社会治理的理念融合，是党的群众路线与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价值契合，是协商民主同选举民主的制度配合。“两个结合”视角有助于发掘协商民主价值逻辑的完整图景。“四个基础”如何在政治结构、历史传统相适应的发展中彰显民主真谛，如何在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突显制度优势，如何在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展现民主价值，在理论与实践构成了渐次展开、逐步深入的问题环链。这既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提供了新命题，也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话语体系提供了新议题。

关键词：“两个结合”；协商民主；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1-0013-12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1.002

作者简介：冯辰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

引用格式：冯辰翔，张树华.“两个结合”视角下协商民主的价值逻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13-24.

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完善协商民主机制作出重要部署。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安排，贯穿着鲜明的价值逻辑，在以中国式民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强大作用力、巨大塑造力和非凡影响力^[2]。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3]在这一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协商民主的来源，深刻总结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背后的价值逻辑在于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四个基础”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吸收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为发展中国式协商民主提供了价值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较多。CSSCI 收录期刊与中文核心期刊年均发表论文 80 余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其社会主义属性、理论内涵、比较优势、实践经验等。龚晨、陈惠丰、宋汉晓等曾就协商民主的由来与“四个基础”的关系、协商民主的“四个基础”与群众基础的关系等展开了讨论。2019 年以来，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主要放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范畴内探讨，比较缺乏基于“两个结合”视角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协商民主“四个基础”论断。既有研究相对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回应，应进一步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指示来展开。

“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4]一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也是“两个结合”与统一战线相互契合的创新史^[5]。“两个结合”是深刻理解协商民主具有“四个基础”的新视角、新方法。深刻领会“四个基础”的内涵，需要学理化探究其背后的价值逻辑：何谓“协商民主具有深厚的‘四个基础’”，如何“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四个基础”何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协商民主发展。

系统回答好以上问题，需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具体而言，研究目标上“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探究方法上“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研究态度上“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6]，研究立场上要有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话语体系的自觉。溯本求源，亦即要把握“基础”与“价值”的核心要义及其内在逻辑机理，把握从“文化基础”到“理论基础”的演进逻辑，从“实践基础”到“制度基础”的位阶逻辑和价值指向，以此厘清“协商民主具有深厚的‘四个基础’”的价值逻辑。这既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理化阐释提供了新命题，也为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生产提

冯辰翔, 张树华. “两个结合”视角下协商民主的价值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3-24.

供了新议题^[7]。

二、传承古代政治思想的文化基础

西方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与中国的协商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虽然两者汉语同词且语义内容有重叠,但其理论来源及所含的具体内容和制度有重大差别。西方语境中的“协商民主”,其“协商”是对传统代议制的反思,强调以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与西方的协商相比较,中国的协商在集体中进行,或者说更突出集体协商机制,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的“商量”“民本”等思想。中国的协商形式独特、独有、独到,源自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思想,是继承中发展的重要体现^[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9]。“两个结合”中的“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发展协商民主的价值内涵和表现形式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一) 传统文化塑造协商理念

协商基础源于对“众”的认识。古人很早就开始意识到集体力量的重要性,以及从“人”到“众”的力量效能提升。从春秋战国思想家文子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到《三国志》中“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从《吕氏春秋》中的“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到《孙子兵法》中的“上下同欲者胜”;从《古今贤文》中的“人心齐,泰山移”,到《易经》中的“二人同心,其力断金”,都表明充分发挥和利用众人的力量和智慧,就能所向无敌。

协商理念源于“和”的共识。协商理念源远流长,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推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主张“天下”的共有、共享、共治。中华文明内含包容性,其发展历程表明中国从不以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素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尚和合特征,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强调多元一体、同生共荣,注重不同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间的协调与共处、沟通与互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还有“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强调“议事以制,政乃不迷”,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些文化基因是协商民主形成的文化支撑。

(二) 协商实践中摸索制度雏形

协商会议源于“解”的需求。协商会议在古代已经有了雏形,比如,西汉时期的“盐铁会议”就是一个通过协商解决多元利益冲突、处理经济事务的典范,会议涉及重大经济民生政策,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汉代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也是针对国家重大政策的专题协商会,解决教育文化领域的重要问题,展现出汉代协商政治的初态。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4]制度是一种社会规则或组织结构,通过法律、规章、习俗、惯例等形式在社会成员之间传递,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断地与新的社会条件相适应。

协商制度源于“谏”的思想。协商制度从古代开始逐渐形成并完善。我国古代政治重视审议慎

议精神，言官谏议制度化是这一精神的直接体现。这一制度萌发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成员对氏族首领开展民主监督的习俗。秦朝设有“谏议大夫”，两汉时期、隋朝时仍称为“谏议大夫”，唐朝则增设了“左拾遗”和“右拾遗”，宋朝时专门设立谏院，首长称“左谏议大夫”和“右谏议大夫”。谏议制度能够助力匡正政策的过失、减少决策的失误，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扮演着积极角色，内含咨政建言的制度智慧。西周时期，周召公在谏周厉王止谤时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强调通过协商引导民意合理表达，避免社会矛盾激化。这些制度和理念所蕴含的协商思维一直延续至今并被制度化运用。

三、继承传统政治智慧的理论基础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其形式是具体的，其内容是发展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土壤、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着不同的国家建立不同的民主话语体系，在差异化发展的话语体系基础上产生具有人类政治文明共同价值的民主制度，同时又具有本国土壤的独特适应性^[9]。“两个结合”为建立民主话语体系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赋予继承传统智慧辩证的思维方式，构成在继承中发展的理念遵循。

（一）“商量”朴素政治理念蕴含民主真谛

“有事好商量”的施政理念推动“商量好办事”的行政实践。“商量”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的《易·兑》中。《易·兑》中说“商，商量裁制之谓也”。这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过商量来解决问题是一种重要的决策手段。毛泽东曾说过：“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周恩来也强调过：“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现在的不少基层行政实践已经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商量”机制^[10]。比如，广州市政协的“有事好商量”平台，聚焦民生难题，特别是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重点领域，促进问题的解决和民生的改善。2024年的协商议题包括针对广州停车难问题的“盘活各类资源，优化提升城市停车利用水平”，旨在解决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以及乡村风貌修复、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等社会面话题，还围绕推动乡村振兴组织“驴友”、民宿业主、村干部、村民，与政协委员、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旅游协会负责人围坐一圈，共同为振兴乡村文旅找到好办法，让更多群众参与协商，让更多群众受益于协商。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理念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落地生根。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民主的核心要义，民事就要民议，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应该由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协商，让人民群众通过民主的方式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决策、执行和管理中来^[11]。北京市东城区的“小院议事厅”就是一个典型的“民议”机制，居民们在这里就关系到他们生活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从而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民事民决，意味着在充分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由群众共同决定涉及他们利益的事项，集体决定才是“民决”，体现群众意愿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武汉市推行的“四民工作法”，通过居（村）民大会（代表会议）制度，让群众参与到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中。民事民办，强调群众参与到事务的执行和管理中来，通过自治的

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浙江省的乡村善治实践中, 村庄事务“民事民管”已成为常态, 95%以上的矛盾纠纷和问题在镇村两级得到妥善解决^[10]。

从“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出发点延伸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落脚点。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协商民主的真谛在于它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表达, 协商民主制度的价值要求是如何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12]。当前基层产生的社会矛盾, 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复杂多样, 绝大多数本质上仍是人民内部矛盾, 究其本源是根本利益一致而具体利益诉求不同, 因此, 基层矛盾应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这一原则至关重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 不同的个体、群体或组织往往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观点^[13]。“找到最大公约数”意味着在这些差异中寻找共同点, 即那些能够被各方接受和认同的基本价值、目标或利益。通过有效沟通和交流, 彼此之间增进理解和信任。协商需要开放的心态、耐心的倾听以及愿意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在找到共同点的基础上, 各方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这可能涉及到一定程度的妥协, 但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 而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和共同利益而做出的合理调整, 最终达成一种共识, 画出最大同心圆。

(二) “四个凝聚”政治理念蕴含价值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协商民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1]。“四个凝聚”政治理念蕴含丰富的方法论意义, 是人民民主全过程性的集中表达, 是人民历史观的价值体现。

凝聚人心蕴含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凝聚”涵盖了从增进理解、形成共识、促进合作、增强合力、实现目标的全过程。协商的过程就是从民生到民心的过程, 特别是基层民主就是把老百姓的身边事凝聚在议题中, 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协商议题、制定协商形式,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感、公平感和认同感^[14]。在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和解决方案上形成共识、团结民心, 为广泛接受的政策推广和实施打下良好的人民群众基础。

凝聚共识蕴含包容多样的价值选择。协商可以汇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在主要方面形成共同的认识, 形成推动社会和谐与平稳发展的强大合力, 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凝聚共识包含汇集、汇聚到融合的全阶段, 让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阶层在政治协商的平台上交流对话, 求同存异, 在多样中寻求一致, 在持续的过程中让各方都有持续的参与感和被尊重感。凝聚共识的前提是对个人利益的承认、对分歧的尊重, 确保矛盾问题“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听了有人办”, 进而才能构建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认识^[15]。

凝聚智慧蕴含尊重科学的价值态度。凝聚智慧一方面是广泛凝聚各方面智慧, 发挥各自所长, 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改革、发展群策群力, 发挥智力才能; 另一方面是蕴含尊重科学的内在要义, 人才的背后是科学,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自然科学的科技探索, 也需要社会科学的价值探索。科学方法强调逻辑和理性分析, 协商过程要求通过批判性思维来评估不同的观点和方案。科学精神鼓励开放的交流和讨论, 凝聚智慧的过程也倡导开放性, 鼓励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普通公众参与讨论, 分享知识和经验^[16]。科学思维不断推动新知识的发现和新技术的发展。凝聚智慧就是创新思路, 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和改进方法。

凝聚力量蕴含“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价值实现。发轫于中国土壤的协商理念蕴含深刻的力量汇

聚之意，解决公共问题需要更多力量、更广泛的参与者。公共的问题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跨阶层互动、跨民族交流、跨学科创新等打破壁垒与界限，弥补各自的不足，能够实现资源整合与力量的聚变跃升。

（三）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的价值契合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我们党靠群众工作起家，新时代新征程上，筑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群众基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至关重要。党的优良传统与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使得协商民主具有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下选举政治演变发展的协商制度特征，党的群众路线贯穿群众政治参与全过程，政治参与过程内含参与权和监督权，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一体两面。

推进协商民主，突出人民史观的执政价值。人民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的执政价值体现为“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党的人民史观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基础。协商民主之所以具有显著适应性，关键在于它来源于中国土壤，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协商民主所蕴含的人民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全新的、科学的、正确的历史观，是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表现^[17]。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发展协商民主要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协商机制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关键作用，丰富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从人民群众的真知灼见中获取改革发展的智慧力量。

推进协商民主，彰显群众工作法的施政价值。群众工作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协商内容来源于群众的实践，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也是矛盾和问题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最需要协商解决的地方。为此，要因地制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运用好“四下基层”制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营商下午茶”到“群众留言板”，从“小院议事厅”到“接诉即办”，北京“党建引领接诉即办”、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江苏“不见面审批”、浙江“最多跑一次”等一项项探索，都是为了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群众的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们的需要和追求是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原动力，也是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动力^[18]。

四、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19]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是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领导核心，关系到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发展的根本方向。通过党的领导，协商民主能够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愿和需求，使政策制定更加科学、民主和合理。“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现路径，表明党在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推进协商民主的自觉达到新高度^[20]。

（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引领协商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

冯辰翔, 张树华. “两个结合”视角下协商民主的价值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3-24.

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21]党的领导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保证。只有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国家和社会事业各领域、各方面才能有序推进、协同发展。

党的领导推动协商的制度建设。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推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核心力量,是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根本保证。在党的领导下,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多类型协商同步推进,高层协商、基层协商多层次协商同步进行,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多形式协商共同发展,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确保了协商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二）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22]。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统一战线为实践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统一战线的重要方式。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三者是有机整体,目标一致、本质一体,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程^[23]。

统一战线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巩固基础。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对于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实践充分证明,协商民主是多数的商量,更是广泛的协商,是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的题中之义^[24]。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人士及海内外中华儿女,通过系统规范的制度机制和丰富多样的协商平台,增进统一战线成员对党的决策部署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统一战线发挥凝聚人心、提供制度安排、增进政治认同、丰富协商形式和整合资源力量等多方面作用,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巩固提供坚实基础。

协商民主为党民主执政提供重要支撑^[25]。协商民主是党实现民主执政的重要方式,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要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广开言路、广集众智、广求善策,营造宽松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和体谅包容,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党的民主执政推动党的科学执政,协商民主为党的民主执政提供了坚实支撑。它不仅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制度设计,也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通过协商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得以丰富和发展,巩固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

（三）协商民主蕴含监督的价值指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发展,高度重视民主监督在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对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提出新的部署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积极围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要决策部署情况开展民主监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机制”。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要部署,为推动民主监督提供了根本遵循。

融协商和监督于一体的政治监督。民主监督是协商民主的核心要素之一，它确保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公正性和有效性，这既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题中之义，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民主监督是为了推动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确保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有机融合^[26]。民主监督同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共同构成我国监督体系。民主监督聚焦党和国家重要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为政治监督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融建设性与制度化于一体的协商式监督。在协商式监督中，“协商”是方法渠道，蕴含着参与性；“监督”是价值指向，蕴含着制度化建设。实践中，要准确把握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监督方式，准确把握监督的方向和重点、节奏和力度，深入组织会议监督、视察监督、提案监督、调研监督、专项监督等协商式监督形式。健全民主监督工作机制，加强机制保障，寓监督于协商会议、政协提案、专委会调研、党派“直通车”、社情民意等制度化工作之中。充分借助协商对象联系面广、包容性大的特点，发扬“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优良传统，通过监督把意见建议转化为政策选项，通过协商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形成有利于开展民主监督的良好政治和社会氛围，形成民主监督制度化发展的体系化路径，彰显民主监督的特有优势和重要作用^[27]。

五、完善中国式民主的制度基础

中国式民主是扎根中国大地、反映人民群众真实意愿的实践创新，具有鲜明政治特色和显著比较优势。从西方民主话语体系到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转变，核心是突出人民民主制度基础的构建。人民民主是协商民主的精神内核，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链条的各个环节，而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保证人民民主的理念、方针、政策贯彻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8]。这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内涵和价值旨归。

（一）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体系

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多个层面和多个主体的协调与合作^[29]。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体系，要持续推进协商民主理论构建，着力健全各层级协商机制，不断拓展协商方式，搭建群众触手可及的平台，积极营造良好的“商量”氛围，不断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完善协商民主体系是发挥协商民主优势的基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30]协商民主贯穿人民政协履职全过程，要加强政协协商与党委、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专题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界别协商等协商形式的特色优势，提高政协协商水平。发挥好专题协商的聚焦性作用，紧密围绕国家的大政方针，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中的聚焦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议政建言，通过协商推动问题的解决和政策的改进。发挥好提案办理协商的专业化、程序化优势。提案办理协商涉及提案者、提案承办单位、政协组织及有关方面，协商过程贯穿于提案的提出、立案、交办、经办、督办、反馈各环节，通过推动政协提案办理开展的协商活动可以增进共识，发挥好政协在完善协商民主体系中的组织、协调、督促、服务作用，推动提案办理协商广

泛多层制度化开展^[31]。发挥好界别协商的智力优势。界别是人民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政协开展协商活动的基本单位。界别协商是政协平台优势和组织优势的交汇点,是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必要途径。

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3]机制是制度建设的关键,健全协商民主机制,要求完善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全面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切实落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战略任务。机制的核心要义是实现程序化、规范化、系统化,这要求建立健全政治协商制度机制,制定具有实质操作性的协商制度,针对不同协商渠道,分类形成制度规范和工作规则,明确协商的内容、对象、方式以及协商成果的运用。落实是机制的重要环节和最终体现。要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把协商结果落在政策实践中、落在群众期盼里,对明确规定需要协商的事项必须经协商后提交决策实施,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32]。

(二) 协商民主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链条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2]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途径完善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链条。深刻理解协商民主的基本特点和方针政策,需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我国政治领域的基本定性、地位作用 and 目标任务。

灵敏性,体现基层民主单元“末梢神经”的社会治理要义。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现代社会矛盾纠纷增多,个体性矛盾纠纷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将公共安全风险隐患及时解决在基层,是基层协商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防止小矛盾上行外溢、小纠纷升级激化,需要高度重视基层民主单元服务“最后一公里”的作用。村、社区、学校、医院、企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社团等基层民主单元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是全过程链条的“末梢神经”,完善其灵敏性可以有效推进基层协商实践^[33]。比如,浙江舟山市的“民生面对面·书记市长走进基层单元”活动,带动县区、街乡镇“一把手”走进基层单元听取民情民意,零距离解决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让“民声”成“民生”。只有重视基层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在丰富的基层实践中拓宽思路,从“收音壁”的倾听到“回音壁”的反馈,从“有事找代表、服务在网格”到“民主茶桌”满满几大页的民意,推动基层“小单元”建设,搭建民主“大舞台”,才能激发民主“大能量”。

烟火气,体现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的温度。这种温度深深植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民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通过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实践,协商民主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概念,而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满足群众需求的生动实践^[34]。这种民主形式多样,如“小院议事厅”“板凳民主”“小区圆桌会”“议事群”“民主恳谈会”和“村民议事会”等,都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具体表现,它们展现出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勃勃生机。“五议聚民意”工作法等基层协商民主的烟火气体现在它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上,从居民提议、群众商议、社区复议、专业审议到最终决议,协商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沟通与交流,寻求私益的平衡和公益的最大化。针对从老房子漏水、路面破损到公厕保洁、增设无障碍通道等涉及居民生活的问题,该机制促进调节冲突利益、满足利益诉求。基层

协商民主以信任关系为支撑，共饮一杯茶、共商一件事，能够在协商主体间产生安全感和确定感，在平等、轻松的氛围中推进基层治理，从而达成协作意愿。基层协商民主的烟火气是其贴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它通过各种创新的形式和方法，以“民情全覆盖、民意全对接、民事全答复”不断增强协商的实效，让协商民主真正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三）协商民主释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职尽责。”^[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政治格局稳定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前提，协商民主使得政党协商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序可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平台。

突出政党协商“集体性表达”的制度渠道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主要体现为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35]。各民主党派反映所联系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的是人民群众整体利益和部分群体利益的统一，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他们采用集体性表达的制度形式充分发表意见，中国共产党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形成集体意见，从而将各方意见包容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中^[36]。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了积极且重要的角色。民主党派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提出集体提案，并提交书面发言和口头发言提案；通过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三种协商形式，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聚焦国家发展等重大问题，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提出重要的政策建议。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有效利用政党协商这一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为国家的决策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37]。

契合需求的“广泛多层式”制度结构作用。政党协商涵盖从中央到地方的多个层级，中央层面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通常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亲自主持，相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出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地方层面省、市也设立相应的协商机制，部分地方在县（市、区）一级实施政党协商。例如，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广泛的政治力量参与协商过程，这确保不同政治力量的声音都能被听到和考虑^[38]。广泛的参与和多层级的协商旨在凝聚最广泛的政治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有助于推动国家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增强政策的接受度和执行力^[39]。

六、结语

协商民主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四个基础”贯穿着鲜明的价值逻辑，是有根、有源的文化积淀与复杂社会治理的理念融合，是党的群众路线与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价值契合，是协商民主同选举民主的制度配合^[40]。“四个基础”不仅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展开方式，而且指向理论的存在形态多元、表现形式多样，科学揭示中国式民主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蕴含着建构思想、建构制度、建构

冯辰翔, 张树华. “两个结合”视角下协商民主的价值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3-24.

形象的理论要义^[41], 打破了西方对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长期话语垄断, 跳出了二战后西方民主模式的“话语陷阱”。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体系的构建, 以丰富的民主实践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度、言之有理^[42], 体现出西方话语体系到中国话语体系的转变, 展现出中国特色政治理论的概念原创性、话语时代性和内涵创新性, 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的魂与根, 有力地支撑了以理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4 年 9 月 20 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1 (2).
- [2]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 [EB/OL]. (2024-03-04) [2024-12-01]. http://www.qstheory.cn/wp/2024-03/04/c_1130085139.htm.
- [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9 月 21 日) [N]. 人民日报, 2014-09-22 (2).
- [4]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5] 肖存良. “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J/OL]. 统一战线学研究, 1-11 [2025-01-0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215.C.20241227.1348.002.html>.
- [6] 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蔡奇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4-11-30 (1).
- [7] 杨家豪.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理论研讨会综述 [J]. 政治学研究, 2024 (2): 254-256.
- [8] 克里斯蒂娜·雷加达斯, 靳呈伟. 认识当代中国民主的多样路径 [J]. 人民论坛, 2023 (6): 46-48.
- [9] 林尚立. 论当代中国政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 [J]. 政治学研究, 2024 (2): 3-12+257.
- [10] 肖滨. 基层政治参与单元有效运行的中国方案——浙江省打造“基层单元”实践经验的理论解读 [J]. 政治学研究, 2023 (3): 60-68+169.
- [11] 韩瑞波, 彭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直接民主的理论基础、实践演进和发展机理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4 (5): 85-92.
- [12] 张君. 论中国式民主的辩证特征 [J]. 政治学研究, 2024 (2): 25-39+257-258.
- [13] 张力伟, 吴楠. 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责任政治逻辑 [J]. 学习与实践, 2024 (11): 44-53.
- [14]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 [EB/OL]. (2024-09-22) [2024-12-01]. http://www.qstheory.cn/wp/2024-09/22/c_1130204046.htm.
- [15] 张力伟. 走向日常生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质探源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3 (2): 103-110.
- [16] 张贤明.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体系建构与基本进路 [J]. 政治学研究, 2023 (1): 42-50+156-157.
- [17] 张树华. 比较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特征与实践方向 [J]. 当代世界, 2023 (3): 15-21.
- [18] 王红艳.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科学内涵与独特优势 [N]. 光明日报, 2023-12-15 (11).
- [19]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J]. 求是, 2020 (14): 4-17.
- [20] 刘化军. “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新研究——“2024 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年会”综述 [J]. 马

- 克思主义研究, 2024 (9): 145-147.
- [2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 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N]. 人民日报, 2016-05-04 (9).
- [2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3] 林克庆.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J]. 求是, 2024 (5): 34-38.
- [24] 张树华, 李旭.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 格局、趋势与原则方向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3 (2): 98-108+159.
- [25]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N]. 人民日报, 2024-02-23 (9).
- [26] 孟祥锋. 健全协商民主机制 [N]. 人民日报, 2024-08-29 (9).
- [27] 赵凡. 健全协商民主机制 彰显协商民主优势 [N]. 人民日报, 2024-09-19 (9).
- [28]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4-09-22 (1).
- [29] 张雅勤. 基层民主协商中话语共识达成的掣肘因素及其消解 [J]. 行政论坛, 2024 (6): 51-60.
- [30]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J]. 求是, 2024 (4): 4-13.
- [31] 陈喜庆.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 缘由、定性和功能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9.
- [32] 包心鉴. 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J]. 政治学研究, 2023 (1): 13-23+155-156.
- [33] 汪仕凯. 论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14.
- [34] 吴兵兵, 刘伟. “微协商”: 协商民主的重心下沉 [J]. 理论月刊, 2024 (11): 53-62.
- [35] 钟德涛, 付瑀.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 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28-42.
- [36] 刘志礼, 魏梓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26-37.
- [37] 张君. 论中国式民主的辩证特征 [J]. 政治学研究, 2024 (2): 25-39+257-258.
- [38] 孟书广.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 [J]. 理论研究, 2024 (10): 6-14.
- [39] 王红艳. 中国协商民主为什么真?——以标准、条件和效能为视角的分析 [J]. 政治学研究, 2022 (2): 92-102+170.
- [40] 杨光斌. 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表述问题 [J]. 政治学研究, 2022 (1): 16-20+156.
- [41] 张贤明.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体系建构与基本进路 [J]. 政治学研究, 2023 (1): 42-50+156-157.
- [42] 景跃进. 民主理论的发展: 超越与重构 [J]. 政治学研究, 2022 (1): 3-9+156.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龚静阳



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 理论探析、实践探索和当代启示

张淑娟^{1, 2} 王硕¹

(1.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3;

2. 北方民族大学 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邓小平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个维度搭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完整框架: 在政治层面进一步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制化, 又以“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等历史遗留问题, 对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作出复合型的政治安排; 在经济层面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 在文化层面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 在社会层面厚植中华民族安定团结的社会土壤; 在生态层面建构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坚持国家(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则, 秉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基础, 坚持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核心原则。这一思想体现出从阶级叙事转向民族叙事的变革性、国家关系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包容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再认识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前瞻性等特征。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紧紧围绕现代国家建设需要, 在理论与实践探索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1.003

作者简介: 张淑娟,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北方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 王硕,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1AMZ002);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重点课题“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研究”(ZL2024001); 北方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项目“‘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主体性研究”(23BF001)

引用格式: 张淑娟, 王硕. 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析、实践探索和当代启示[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25-40.

关键词：邓小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振兴中华；中华民族主体性；民族叙事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1-0025-16

2024 年 8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财富，就是以他为主创立的邓小平理论。”^[1]其中关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与邓小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外交等领域的思想具有同等地位，同属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篇章。2024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他还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2]。就此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成为国家发展目标的叙述方式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中华民族主体性全面建构期，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不仅要从单元民族层面获得力量，同时亟需从国家民族层面汲取营养。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一整套政治话语，为新时代民族叙事奠定了基本思路 and 重要主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相关思想，从中获得思想力量成为学术研究绕不开的任务。

目前，学术界分别围绕邓小平民族理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关于邓小平民族理论，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关于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实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彰显出求实性、时代性、系统性等特点^[3]，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开拓和奠基^[4]。有学者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分别回溯了邓小平民族理论在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等地区的具体实践，总结了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以及需要注意的重大问题^[5]。二是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本体的认知和反映，从历史基因浸润、民族国家框架、统一战线视域等三重维度剖析其全貌^[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维护国家政治共同体统一与稳定的思想之舵^[7]、回应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时代强音^[8]、促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金色桥梁^[9]。学者们还从坚持党的领导^[10]、新质生产力赋能^[11]、强化文化认同^[12]、整合集体记忆^[13]、互嵌社区建设^[14]等维度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既有研究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还较少将邓小平民族理论置于国家民族框架或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背景中，剖析其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思想，研究其认识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坚守和建构中华民族主体性、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等内容。全面梳理这些问题，能够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参考。

一、邓小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系统布局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众多领域。邓小平立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个维度搭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完整框架，即在政治层

张淑娟,王硕.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析、实践探索和当代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25-40.

面进一步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制化,又以“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等历史遗留问题,对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作出复合型的政治安排;在经济层面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在文化层面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在社会层面厚植中华民族安定团结的社会土壤;在生态层面建构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

(一) 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安排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是制度安排的基础部分,国家结构形式是指一个国家的各个部分采取何种方式整合为整体。邓小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的政治安排,既作出了具有承续性的制度安排,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制化;又作出了具有变革性的制度安排,突破“一国一制”的“单纯型”国家结构形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付诸实践。两种安排赋予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以复合型特征,在国家结构上实现成功整合,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内涵。

第一,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制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对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作出的有效制度安排,是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创新,其对于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优势在实践中不断被确证。邓小平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15]邓小平更加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制化建设。他强调:“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16]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内容,为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4年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第一部基本法,使民族区域自治在原有基础上步入法制化的轨道。《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现了国家对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彰显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随着这一法律的实施,各民族自治地方、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相继制定了相关法规,着重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进一步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制化,基本形成了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以民族自治地方相关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这一制度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通过复合型的政治安排及法律保障得以确立,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第二,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继承。一是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内聚性和向心力的民族共同体,拥有一致性和整体性的集体身份认同,使祖国统一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二是源自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谋略。毛泽东曾经提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17]以及“一纲四目”^[18]、“和为上计”“爱国一家”等理念,周恩来也提出“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这些都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方针提供了理论铺垫。“一国两制”方针因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最早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时由理论变成现实。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作出了基本概括:“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5] 58}“一国两制”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实行“两制”的根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港澳台地区享有主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最高利益，“两制”则从属并统一于中华民族的国家之内。对于饱受主权丧失之苦的中华民族而言，一个中国原则确保了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一国两制”又赋予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其前提条件是确保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一国两制”方针使两种不同制度在统一的国家架构下共存共生，为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赋予了复合型特征——普通集权模式、民族区域自治模式、特别行政区复合模式于一体，从祖国统一、高度自治、共同发展的维度搭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架构，堪称当代中国制度文明创新的典范。“一国两制”将国家统一与区域发展统摄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之中，既有利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又有利于所设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发展，使国家结构形式的目标功能更具复合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

（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富裕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经济共同体。共同的经济利益是政治共同体的团结之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形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同时共同富裕又作为目标导引对中华民族提出“共同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如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而团结在一起。”^[20]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出现失误，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受阻，缺乏活力、效率低下，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无法为各族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开辟新道路。面对困局，邓小平提出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决策，为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找到了“关键一招”。

在“改革”问题上，邓小平首先明确“改革”的地位和性质，将其视为“第二次革命”。他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1]，以此表明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不进行改革，则无法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繁荣发展，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将无从谈起。同时，邓小平强调改革“胆子要大”并且“步子要稳”，以此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稳步前进。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并不局限于西南一隅的空间视野，而是将西南地区的局部工作置于全国工作之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对少数民族的帮扶政策。比如，在经济建设上，号召建立民族贸易机构、物资交流会、生产示范区，推动城乡经济互助，同时主导兴修了成渝铁路、康藏公路等交通干线，逐渐破除了阻绝当地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障碍，极大带动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教育事业上，帮助各少数民族积极筹办民族学院，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技术人才。在民生问题上，对西南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访问工作，组织慰问团、访问团、参观团，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民族政策、协调民主建政、调解民族纠纷，缓解了民族隔阂和互不信任的局面，使少数民族群众深深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在安全问题上，发动群众，实行军民联防，协助少数民族彻底肃清了民族地区的匪患，奠定了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基础。通过一系列帮扶政策，民族地区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各民族经过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族际边界自然消解，中华民族的共同性随之增强。

在“开放”问题上，邓小平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5] 64}，对中华民族所处的世界局势作出了精准研判。从地理大发现开始，人类已经走进以聚合为主的历史，世界上各个民族也开始从相对闭塞、孤立转向相互依存的状态，这一态势在全球化进程中骤然加快。由此，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5] 78}。这也是基于历史教训的经验总结，中华民族曾因长期的闭关

张淑娟,王硕.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析、实践探索和当代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25-40.

自守,一度走向贫困落后。在这种情形下,中华民族的整体生存无法得到保障,也失去了顺应世界发展大潮的历史机遇。追求充分发展的民族繁荣是当今世界不争的事实,民族繁荣始终与民族交流相伴随。在全球化进程中,相较于国家边界之内的民族交流而言,超越国界的民族交流呈现出更加强劲的势头。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特征和优势,要实现繁荣发展并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需要将视野看向“外部”,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长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21] 91}

无论“改革”还是“开放”都以实现国家富强、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必须强调的是,增进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方向,但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差异性的存在,更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地实现共同富裕,因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15] 155}。由此,邓小平指出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共同富裕目标上所衍生出的行动准则。

(三) 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话语天然具有政治性,是寻求意识形态认同的出口,建构话语体系是现代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认知和利益关切,作为旗帜能够凝聚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振兴中华”是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中的高频词汇,集中反映了他对民族复兴的深切关怀,作为各族人民的话语共识,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话语基础。同时,他又以“民族团结”话语标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保持聚合的生命线。

第一,“振兴中华”被不断强调并频繁使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顺利实现了从阶级叙事向民族叙事的转变,掀开了“振兴中华”话语纵深推进的历史新篇章。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发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号召,从那时起一代代中华儿女为振兴中华民族前赴后继,书写了恢宏史诗。重立“振兴中华”的话语旗帜,能够唤醒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思考国家发展的前进方向。“振兴中华”话语契合了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和提振民族自信心的现实需要,具有国族凝聚的独特功能。由此,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展演出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两条轨迹,产生了“国家”与“民族”两套话语系统,取代了以“国家”指称“民族”的叙事方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21] 162}“国家”和“民族”并列强调,开启了“民族”与“国家”彼此互持的新征程。邓小平在谈及理想问题时指出:“有理想要有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22]将“振兴中华民族”归纳为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的政治情感,这一表达实质上突破了单纯的公民国家认同逻辑,对其赋予了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认同,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90年4月7日,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15] 357}将“振兴中华”与“四个现代化”并列强调,提升了“振兴中华”的话语分量,进一步激发了各族人民的命运与共感与民族自信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振兴中华”话语的使用频次明显增多,话语内涵更加丰富,释放出强劲的话语势能,成功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出场。“民族复兴”经历了与“振兴中华”频次相当并最终上升为主流话语的进阶样态,经过一系列的话语形塑并沿用至今,跃升为一个十分稳定且成熟的概念,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成

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话语支撑。

第二，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线。关于民族团结问题，邓小平围绕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反对民族分裂、消除民族隔阂等内容诠释了民族团结的内涵及重要意义。邓小平将民族团结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源泉，强调了民族团结在民族工作中的根本性地位。他指出：“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23〕}加强民族团结与消除隔阂是塑造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一体两面，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中国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分歧和偏见，无不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障碍。邓小平认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23〕}¹⁶²消除民族隔阂的关键在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23〕}¹⁶³。此外，邓小平格外重视经济建设对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民族团结作为一种群体情感，有赖于物质发展的根基性支撑，共同的利益追求时刻影响着各民族内外交往的发展程度，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21〕}¹⁸⁶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融合，诸多伟大成就使中华民族获得持续滋养，发展更快、方向更明确，各族人民在共赴美好前景的道路上拥有了统一旗帜和民族自信，自觉将生活层面的朴素情感上升为强烈的民族情感，并不断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土壤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社会共同体。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前进。邓小平深刻认识到混乱局面对整个社会的沉重打击，十分重视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提出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15〕}²⁸⁴的重大论断，并妥善处理了社会矛盾，规正了思想滋扰，加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营造了安定团结、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

第一，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造团结稳定的社会局面。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但现存或潜藏的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显露。邓小平在正确认识和评估阶级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以此建构合理的利益格局。对于经济利益的矛盾，为保障各族人民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21〕}¹⁴⁶他同时强调：“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21〕}¹⁷⁵对于精神生活领域的矛盾，邓小平提出了“三个坚决执行”的方针，即“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21〕}¹⁸³，在思想、学术、艺术领域掀起了包容和谐的思想潮流，极大激发了社会活力。

第二，有效规正思想滋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弥漫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腐朽思想开始迸发，主要体现为封建腐朽思想残余、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传播等，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理想、信仰和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离散与消解。邓小平指出：“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

张淑娟,王硕.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析、实践探索和当代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25-40.

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24]此项工作旨在引导各族人民将精力投入到现代化建设和实现自我价值之中,稳定人心,在全社会营造积极向上、创新进取的健康风气。

第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社会治安是关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各种违法乱象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具有直接破坏效应。对此,邓小平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15] 378}对于破坏社会风气、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国家必须做到全面、有效的应对和处置。社会综合治理意味着治理手段的多元化、系统性,将法制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基本准则,同时也离不开社会教育的引导。正如邓小平指出:“打击犯罪、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25]邓小平力主法德并举,重视社会教育的引领作用和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营造了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五)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态家园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生态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邓小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行系统布局时,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的唯物史观出发,强调自然的客观性、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将植树造林、设立自然保护区、“三北”工程、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等提升至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了环境优美的生态家园。

第一,科学认识自然的客观性、先在性,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早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被视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26],被长期作为人类索取的对象,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甚至发出“征服自然”的口号。面对破坏生态环境、反噬经济建设的现象,邓小平指出:“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21] 346}并且,邓小平从自然的客观性和先在性出发,提出:“大自然是不同寻常的课堂,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24] 652}这一论断表明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将自然比喻为值得永远学习的“富矿”,揭示了自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倡导尊重自然的客观性和先在性,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关系。对于如何揭秘自然的客观规律性,邓小平十分重视培养真正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指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16] 882}同时,邓小平意识到全党缺乏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明确指出:“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23] 262}从尊重自然规律出发,培养一大批懂自然的干部,能够避免因不了解自然规律而造成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

第二,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确保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邓小平主张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同步发展、统筹兼顾的新路,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邓小平指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15] 363}邓小平主张在经济建设中注重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同时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又将反哺经济发展,实现共赢。正如邓小平在谈及黄河治理问题时指出的:“黄河所以叫‘黄’

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16] 868}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推进的持久战，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邓小平以大历史观审视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意义，要求人们持之以恒地书写保护生态环境的历史，维持中华民族的连续性。他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16] 895}

二、邓小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了原则框定，无论是对内强化民族凝聚力，还是对外塑造民族影响力，都必须坚持国家（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则。只有确保民族国家的先在性和稳定性，共同体成员才能在国家边界之内享受一切公共福利。基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本盘，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基础。同时，他从“对内反思”和“向外呈现”的角度提出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核心原则，主要锚定了坚持“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坚持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根本遵循。

（一）坚持国家（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则

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民族国家为现代民族提供了“政治屋顶”，民族之间的竞争表现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因此，国家利益在民族国家的利益结构中居于最高地位，具有不可侵犯性。邓小平以务实的态度强调国家利益是处理国际、党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在外交上走上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道路，并将国家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外交工作的标准”^[2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中华民族再度赶上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大潮。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无论实力强弱，各国都努力在这一变局中占据有利地位，这就决定了“变中趋稳，乱中求治”的世界历史趋势。同时，任何国家都将面临利弊共存、机与危同在的处境，如何保持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成为各个民族国家无法避开的重要课题。邓小平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内国际问题的最高准则，兼顾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内的利益结构上，邓小平强调每个人都应“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21] 233}。面对错误思潮的侵蚀，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准绳评判公民行为的正当性。他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5] 3}这一表述划清了维护与损害国家利益的界线，充分肯定了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正当行为，为各族人民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利益指明了方向。

总之，对内而言，国家利益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重利益，事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方位发展，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使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负有更多的责任感和自觉的使命感，进而转化为强大的内聚力量。这是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8]。对外而言，在国际交往中强调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既是确保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前提，同时也以“共同利益”的视角关照对方，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充分尊

张淑娟,王硕.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析、实践探索和当代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25-40.

重他国利益,平等相待,积极维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这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大家庭”延展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初期,为保证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稳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基本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主张,为塑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供了根本前提。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任何困难都挡不住我们前进,任何阻力都将被我们打破。”^{[21] 206}

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15] 357}。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建构起各族人民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优势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这一本质规定就具有“共同性”意蕴,更加坚定了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道路,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只要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将更加团结有力。

关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真正的共同体,而实现这一远大目标势必要经过民族与无产阶级专政共存的漫长时期。民族的产生、发展并最终走向消亡是一个漫长进程,而在这一过程之中,“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26] 419},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借助民族国家的形式实现政治解放并完成民族共同体建设。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15] 365}因此,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建设“真正的共同体”的必要通路,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各族人民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热情。只要民族国家具有长期存在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就能依靠人民民主专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15] 357}政党是现代社会整合的强力中介,能够将自身以及拥有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形成稳定、团结的社会关系。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围绕“中华民族”不断塑造出符合长远利益且极具社会整合功能的话语符号,极大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新时代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事务领域诉诸的意识形态力量,获得了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助推中华民族走向牢不可破的共同体。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可以说是苦难中铸就辉煌、奋斗后赢得未来,其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能动塑造,以高度自觉的政党担当始终关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积极发挥在政治上、价值上和组织上的政党优势,助推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

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两者都是在丰富实践中得到检验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把握民族发展规律、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了认知范式和阐释原则。邓小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5] 382},“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23] 163}。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原点,中国共产党从中不断汲取真理精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进程中，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所不具有的新话语、新论断，完成了一系列的原创性贡献。同时，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对“中华民族”的概念界定、内在结构、发展状态、前途命运、利益关切等核心要素的认知和表达，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转变过程，逐步确立了新型民族政策的基本框架，开创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邓小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的系统布局乃至新时代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了理论铺垫。

（三）坚持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核心原则

中华民族主体性是指中华民族作为主体的特性以及成为主体的条件，主要“依托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并与其他民族比较而产生，是对自身的肯定与关照”^[29]。中华民族主体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场域或实践活动中的自觉理性与优势，主要通过“一内一外”两个维度得以彰显。无论是内在的自我觉解，还是外部的自我坚守和优势显现，都能助推中华民族走向自觉，进而提升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根本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将在巩固主体性的过程中更加牢不可破。

1. 对内反思：坚持“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

“两个结合”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在特定方位下对自身的历史文化作出理性对待和能动建构，以坚定的文化主体性确证自身的存在价值，对内在历史演进中塑造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对外在比较优势中提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邓小平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传统，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巩固文化主体性，特别是以“第二个结合”坚定了中华民族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我。

第一，在“第一个结合”中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应用问题，为巩固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越是能够生发出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从而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这是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0]。就此而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基础。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15] 3}，并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在与他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邓小平更加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鲜明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21] 262}值得强调的是，在推进“第一个结合”中，邓小平也在思考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不断挖掘现代化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正如邓小平将中国式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描绘为“小康社会”，运用“以古喻今”的叙事方式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等，在相当程度上妥善处理了“第一个结合”的问题，也是文化主体性“浓度”提升的重要表征。

第二，在推进“第二个结合”中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问题，为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形塑了文化自觉意识。邓小平明确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5] 44}一个民族只有彰显出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拥有决定文化传承、创新以及现代转型的主动意识和能力。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改变了一段时期对传统文化“重批判轻继承”的认识及做法，体现出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

张淑娟,王硕.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析、实践探索和当代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25-40.

1980年8月20日出台的《关于做好当前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在特殊时期民族文化被大肆摧残破坏^[31]。为了复兴民族文化、更好地服务现代化建设,《意见》进一步强调:“提倡各民族艺术互相交流、学习、借鉴,但要以发展和提高本民族的艺术为主。注意保持各自的民族艺术特色,绝不能削弱这种特色。”^{[31] 279}同时,邓小平强调要对民族文化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21] 335}。这些论述重塑了中国共产党依据自身传统文化建构中华民族的自觉,拨正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走向,进而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回归。如果忽略甚至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民族瑰宝,中华民族主体性就会被遮蔽,彻底失去文化根性,中华民族势必无法形成自我意识和民族自信,也将失去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的立足点和支撑点。

2. 向外呈现:坚持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

从向外呈现的角度而言,中华民族主体性表现为一种民族主动意识和独立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开放的共同体,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各种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涌入中国,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人的思想。有的人在一些方面逐渐形成依附心理,忘却应有的清醒和反思,导致民族主动意识、独立意识和民族自信心呈现衰颓趋势。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强调坚持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目的就是持续建构民族主体性,确保拥有对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最高权威和自主决策能力,以及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应有的高度清醒、反思和批判,彻底走出“挑战—应战”的被动局面。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也是规避世界主体性危机的重要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5] 3}很难想象一个主体性极度膨胀或是依附性十分强烈的国家,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长期站稳脚跟,即便获得了短暂利益,但也将因其畸形的民族主体性或歪曲的主客体关系最终走向衰落甚至灭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多极化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且站稳脚跟,摒弃了主体性膨胀和主体性依附的两个极端项,邓小平指明了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15] 311}。邓小平多次强调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力更生”“立足于自己”“靠自己发展”等观点,都富有建构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深刻意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筑了民族主体性的高地。

同时,坚持高度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盲目的排他性。邓小平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15] 64}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早已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彼此促进、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中国在坚守应有的主体地位的同时,更应当扩大开放,以更加包容的姿态迎接世界发展大潮中的众多机遇。正如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21] 91}其中暗含了中华民族主体性对外呈现的两个面相: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封闭和排外,而是关照自我的同时争取外部支持,为“走好自己的路”援引更多的优秀成果和经验;二是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之上,还应具有前瞻性视野,积极扩大开放,关注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主体性对自我关照、自我反思的超越。

三、邓小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特征

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体现出从阶级叙事转向民族叙事的变革性、国家关系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包容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再认识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前瞻性等特征，在理论与实践探索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正确发展方向。

（一）变革性：实现从阶级叙事向民族叙事的转变

在调适民族问题的核心叙事上，邓小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于从整体上完成了阶级叙事向民族叙事的思想转变，理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关系，完成了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新中国的成立成功解决了革命逻辑下的民族凝聚问题，形成了以阶级叙事为基础的民族理论传统，但这一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能够提供多大程度的支撑和现实解释，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和确证。判明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先决条件，这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叙事地位。“阶级与民族是人类群体基本的存在方式和组织形式，也是重要的政治动员工具和理论分析工具”^[32]，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不同表征，既对立又统一。在阶级社会里，阶级问题对民族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民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阶级问题的解决，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最大障碍，只有彻底铲除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才能实现被压迫民族的真正解放。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26] 419}值得强调的是，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又有所区别，不能因其存在联系就在二者之间完全构造等号，也不能因其存在差别而将二者完全割裂，因为民族问题比阶级问题的存在更漫长，民族认同比阶级认同更持久^[33]。若是不能准确把握民族问题的实质，则无法对其核心叙事的地位作出合理调适，甚至走向对立面，造成民族工作的混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清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桎梏，民族叙事开始成为主流。民族叙事与现代化建设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以民族叙事为基础的理论常常用以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思想走向成熟。邓小平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21] 186}邓小平对新型民族关系的定论性概括，明确了我国各民族内部不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物质基础，剥削阶级已被消灭；新型民族关系的本质不是对抗性的、斗争性的，而是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关系。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通知》指出：“各民族的存在，多数是千百年历史形成的，在今后很长期间也将继续存在。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34]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淆。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明确了我国各民族的关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并且鲜明指出“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35]。以上重要讲话和重要文件对新型民族关系的定论性表述，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画上了终止符，确立了民族叙事在民族问题中的核心叙事地位。

除理论层面的思想廓清之外,阶级叙事转变为民族叙事,还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建设以及“振兴中华”的民族建设的积极回应。相较于阶级叙事,民族叙事之于国内场域而言,强调的是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这与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方向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作为力量凝聚和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民族叙事能够为各民族增进共同性、包容差异性提供“粘合剂”。正如“振兴中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话语符号一样,民族叙事将各族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内嵌其中,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显然有助于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觉醒与强调,更加彰显国族集聚效应。同时,民族叙事之于国际场域而言,强调的是特殊性和多元性。民族叙事不仅为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存在及其建构提供现实解释,而且能够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合作搭建桥梁。

(二) 包容性: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分歧将中华民族利益置于优先地位

邓小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维护外部关系即国际、党际关系上的最大贡献,在于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将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意识形态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以自我存续发展作为首要目标,需要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壁垒求得安全和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意识形态作为衡量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的唯一标准。

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邓小平将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作为对外交往的最高准则,摒弃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阵营的传统思维,从过去支持“世界革命”转变为服务现代化建设。由此,邓小平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中国的开放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及发展国家利益时指出,“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15] 330}。邓小平以务实精神表明了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至上。他还强调评判国家利益的行为准则: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质言之,不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异定亲疏,凡是有利于发展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合理要素,都可以“为我所用”,这突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一些片面认识,不仅缓和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更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吸纳了更多的外部资源。1990年3月3日,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对外交往时“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5] 353}。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差异是现代世界的客观存在,但消除分歧和隔阂仍有较大的空间,超越分歧只是前提,落脚点是合作。

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分歧的包容性,前提是互不干涉。邓小平指出:“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36]互不干涉,是处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理应由本国政党和人民依据自身的实践和经验进行判断,绝不允许任何人将自己的观点或模式强加于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21] 318}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外部势力的干涉往往是造成国际紧张甚至国际动乱的重要因素,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分强弱、意识形态不分异同,都应当相互尊重、互不干涉,为动荡的世界局势创造积极的稳定因素。邓小平指出:“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15] 361}邓小平在国际交往中强

调淡化国家意识形态差异，又提出互不干涉的基本前提，开辟了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的新境界，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相处的基本原则。

（三）前瞻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再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

民族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范畴，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与之相伴而生的民族问题也将长期存在。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多次提及“要经过一个长时期”“要做长期的工作”“不要怕患‘慢性病’”等观点，揭示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部分民族问题始终存在于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消除，势必要依托长期的民族工作及制度安排才能逐步解决。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民族消亡是民族发展的最终结局，但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因为一定意义上的民族差别和民族隔阂，是由于不充分的社会生产力难以克服客观自然条件而导致的，是民族过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各民族将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彼此间的共同性增加、差异性减少，同时这一变化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愈发强烈。因此，世界各民族走向融合，民族走向消亡，终将实现于人类社会高度发展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还需要经过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而社会主义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全方位发展，并开始走向消亡阶段，也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5] 379-380}在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族融合的因素日益增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但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更不能否定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准确锚定了社会主义民族过程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揭示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铺垫。

四、邓小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当代启示

邓小平从具体实际出发，深刻揭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本质、发展规律和破题方法，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初步思想建构。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接续探索，拨正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走向，疏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去—当下—未来”的历史脉络，彰显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当下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主体性全面建构期，需要从国家民族层面汲取营养，获得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进力量。全面分析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系统布局、基本原则和时代特征，并从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轨迹和规律，能够深切感受到邓小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高度关注、科学构想和战略选择，是激励中华儿女始终凝聚、共同奔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

第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国家（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国家（中华民族）利

张淑娟,王硕.邓小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析、实践探索和当代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25-40.

益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具有不可颠覆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民族国家仍然是人类最基本最具感召力的政治结构,能够提供足够的亲近感和庇佑感。因此,无论是对内强化民族凝聚,还是对外塑造民族影响力,都应当坚持国家(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则,引导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发出更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个艰巨且漫长的历史过程,对于现实国情和历史阶段而言,具有不可超越性。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又将民族消亡的“时间表”作了后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应当认清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自觉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和演进逻辑,立足于特定历史方位对社会整合、国族凝聚作出战略性选择,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第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中华民族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不同场域或实践活动中所彰显的自觉理性与优势。对内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战略中的复归与高扬,使中华民族坚定了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力量,坚守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根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对外而言,坚持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既要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国特色、中国实际,又要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坚持扩大开放,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延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意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应有的格局和胸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24年8月22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8.
- [2]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7日)[N].人民日报,2024-09-28(2).
- [3] 金炳镐.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的伟大贡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6):17-22.
- [4] 张艾力,金炳镐.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伟大贡献——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J].贵州民族研究,2014(12):1-6.
- [5] 曲青山.邓小平民族理论与实践[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145.
- [6] 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意涵[J].学术界,2020(1):78-86.
- [7] 商爱玲,朱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底蕴和思想方略[J].重庆社会科学,2019(10):27-34.
- [8] 于春洋,汪微微.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素、结构与功能[J].新疆社会科学,2022(5):82-90+179.
- [9] 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3):9-13.
- [10] 严庆,王跃.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探索,2022(5):79-95+2.
- [11] 曾鹏,唐婷婷.新质生产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广西民族研究,2024(2):59-66.
- [12] 郝时远.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1-10.

- [13] 张淑娟,王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集体记忆的整合逻辑[J].学术界,2023(12):82-95.
- [14] 陈纪,蒋子越.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条件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2021(4):18-24.
-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7.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62.
- [17] 赵云献.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40.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21.
- [19]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8.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69.
- [2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0.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49.
- [23]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4.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01.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078.
-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1.
- [27] 张淑娟.批判与反思: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再认识[J].学术界,2016(12):96-106+323.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 [29] 张淑娟.民族复兴视域下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建构逻辑[J].探索,2023(6):41-52.
-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 [31]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国家民委民族政策文件选编(1979—1984)[G].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277.
- [32] 张淑娟.中国共产党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的调适与重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J].学术界,2024(7):64-78.
- [33] 张淑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人的解放:基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互动[J].贵州民族研究,2021(2):16-22.
-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01.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49.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41.

责任编辑:王京菁 校对:卢媛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与实践

张冠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 要：“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重要表述，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提升到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这一重要表述体现了两岸经济关系的性质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愿景，体现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理念与政策思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提供重大制度政策机遇。同时，民进党当局加速构建“倚美谋独抗中”经济产业体系，外部变局冲击和局部解构传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方式。应对挑战要善于化危为机，要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引领两岸共同市场建设，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强两岸融合发展的创新驱动动力，以高质量对外开放提升两岸融合发展水平，探索共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产业的新路径，在融合发展中深化同等待遇，务实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不断践行“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经济；两岸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1-0041-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角度，提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重大论断。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马英九一行，从中华民族高度提出“四个坚定”——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进一步探讨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理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1.004

作者简介：张冠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引用格式：张冠华.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与实践[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41-52.

论内涵，丰富两岸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实践路径，增强“四个坚定”的经济动力与基础，对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一、“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呈现出一系列两岸融合发展新特征，“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理念指引与实践意义日益体现。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等重要论述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对“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重要表述的专门研究较为薄弱，相关成果更注重研究两岸经贸关系的实践^[1]。国内有关中华民族经济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民族维度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视角切入^[2]，或是在探讨中华民族经济概念中引入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相关内容。现有成果多从中国国家主体经济角度展开研究，涉及两岸经济关系的内容较少^[3]。加强研究和探讨“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和实践意义，对于丰富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学术与政策参考价值。

早在 2010 年 4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一行时即强调，60 多年来，尽管两岸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我们始终认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我们倡导和推动两岸加强经济合作，有助于共同促进民族经济繁荣发展，有助于维护和扩大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博鳌会见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时指出，希望本着两岸同胞一家人的理念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5]。同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巴厘岛会见萧万长，在谈到两岸经济合作时强调“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双方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更好应对挑战^[6]。2014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平潭考察调研时指出，两岸同胞同根同祖、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7]。2017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 10 周年的贺信中指出，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增进同胞福祉和亲情，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8]。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郑重指出，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9]。202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向 2023 两岸企业家峰会 10 周年年会致贺信指出，“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两岸经济合作开辟广阔空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奋斗^[1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与背景的涉台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重要表述，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提升到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揭示了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的性质与特征，提出了推进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目标与前景，阐明了以深化两岸利益融

张冠华.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与实践[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41-52.

合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明确了本着两岸同胞一家人的角度解决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共同应对国际经济挑战。这一重要表述内涵丰富,是“两岸一家亲”理念的重要内容组成,对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国家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引与实践意义。

这一重要表述体现了两岸经济关系的性质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愿景。“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是由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确定的。中华民族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11]。中华民族经济包含中华民族同胞所有经济,主要由中国国家主体经济与台港澳地区经济共同构成。两岸经贸交流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经贸交流。两岸先后加入世贸组织后,两岸经贸关系仍属中国国家主体与其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贸关系,两岸经贸关系只有在一个中国框架内才能得到发展^[12]。两岸经贸关系恢复和发展以来,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并在两岸贸易与投资的性质定位、两岸经贸协商方式、两岸“三通”涉及的航线旗证等问题处理以及两岸达成的经贸协议等经济事务安排中得以具体实践和体现。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重要表述,还体现了两岸经济发展的共同民族特性。两岸经济发展方式深受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影响,有着许多共同的民族经济发展特色。70多年来,两岸虽然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走出了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但都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兼容并包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成果,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呈现共同的民族特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升级中,两岸的经济现代化均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中国大陆实现了持续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台湾同胞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做出重大贡献,也分享了大陆发展机遇”^[8]。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展现出许多独特优势。中国人的勤俭节约与重视储蓄,为两岸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摆脱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储蓄不足、贸易逆差“两个缺口”发挥重要作用。两岸在现代化进程中均重视发展实业,中国人的勤劳促成了两岸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持续升级,成就了海峡两岸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和关键地位。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使两岸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并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华民族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与贡献持续增强。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重要表述,蕴含着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愿景与实践路径。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与基础,有赖于中国国家主体经济与台港澳地区经济在各自优势基础上加快制度化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推动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形成合力,提升中华民族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力。40多年来,两岸经济关系持续发展,彼此成为重要贸易投资伙伴。中华民族经济正形成国家主体经济与台港澳地区经济优势互补、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呈现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及外部复杂环境影响下,两岸仍主要基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互补合作,制度化合作水平不高成为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制约因素。两岸同文同种、经济互补优势尚未充分发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重要论述,就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推动两岸“应通尽通”和社会公共资源合作共享。我们要在两岸各领域具体实践“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逐步构建两岸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下共同繁荣发展的制度机制,

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治理框架；在融合发展中探索和实践“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经济社会治理方式；在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将两岸各具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化方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经济体的构建中，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13]。

这一表述体现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理念与政策思路。两岸经贸关系恢复后，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政方针，考虑到两岸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大陆将台资视为特殊内资、两岸贸易视为国内特殊形式的贸易。两岸贸易恢复初期，大陆曾对进口台湾产品免征关税^[14]。1991 年，外经贸部提出两岸经贸交流应遵循五项原则，即“直接双向、互利互惠、形式多样、长期稳定、重义守约”。2000 年，外经贸部就颁布《对台湾地区贸易管理办法》发表谈话指出：我们从两岸间不同的经济制度和贸易体制的现实出发，参照现行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和法规，规范对台贸易。20 世纪 80 年代台商开始赴大陆投资。台资既不同于外资，也暂时无法完全等同于内资，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面临的难题^[15]。1988 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22 条”）颁布，确定台资“可以参照执行有关涉外经济法律和法规”“享受相应的外商投资企业待遇”。1994 年、1999 年大陆先后通过《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实施细则，加强对台资保护的同时，在法律上确立了台资比照适用国家有关涉外经济法律、行政法规。1994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定了台商投资的领域、项目、方式^[16]。此后，两岸贸易与投资作为特殊形式的内贸与内资，与大陆涉外经济法规接轨并享受“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特殊待遇，台商优先享受了大陆的各项鼓励优惠政策，并在税收减免、土地供应、财政支持以及外汇管理等方面享受和大陆企业相比的“超同等待遇”^[17]。

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台胞和台企在大陆享受的政策措施与大陆居民、企业迅速拉近。2008 年大陆为营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环境，开放实施内外资所得税体制并轨。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陆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加快商签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放宽投资准入等^[18]。2019 年全国人大通过《外商投资法》并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实施，原有的“外资三法”同时废止。2019 年 12 月国务院通过的《外商投资实施条例》，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者在内地投资，参照外商投资法和本条例执行。同时，2008 年后两岸签署的 ECFA 等 23 项协议规定，大陆不仅对 539 项台湾进口货物免关税，还对台湾金融等 11 个服务行业的 19 个项目实施开放。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同等待遇持续扩大，台胞台企优先分享了大陆经济发展成果。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操弄“台独”议题，使两岸关系日趋严峻复杂、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面临停摆。大陆积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探索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以新理念、新思路、新政策加快在经济社会领域实践“两岸一家亲”理念。2018 年以来，大陆先后推出“31 条措施”（2018 年）、“26 条措施”（2019 年）、助力台企“11 条”（2020 年）、“农林 22 条措施”（2021 年）等重要举措。2023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该重大决策部署在福建全面探索和实践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进程中，发挥全局性示范和引领作用。相关重要措施以推进台胞台企在大陆同等待遇为出发点，率先让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正形成日益完善的制度、政策和法

张冠华.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与实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41-52.

治体系。在大陆台胞台企与当地居民、企业在各领域的待遇差别迅速缩小,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在融合发展的实践中日益展现。

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根基。两岸同文同种及经济互补优势, 成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使两岸经济关系呈现不同于一般国际贸易投资关系的发展特征。通常来说, 文化差异与市场障碍是国际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两大难题。大型跨国公司相对具备克服文化差异的实力, 往往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 然后拉动相关配套中小企业跟进。但两岸同文同种同属一个中国, 在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 台商在大陆投资经营不存在文化差异障碍、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反而有共同文化优势, 更容易形成良性互动的政商关系。台资中小企业容易生存并借助大陆低成本生产要素快速发展壮大, 形成中小企业先行、拉动大企业跟进的独特历史进程。从台商大陆投资规模的演进看, 1992 年台湾地区制订《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后逐步放松两岸经贸往来, 1993 年对赴大陆投资台商进行补办登记。按照台湾方面统计, 1993 年共核准台商投资项目 9 329 项, 投资金额 31.68 亿美元, 平均每项投资金额仅 34 万美元, 中小企业为绝对主力, 基本反映了 1993 年前台商赴大陆投资“中小企业先行”的特点。当时台湾制造业企业结构中, 中小企业主要从事加工出口制造业, 大中型企业位于产业链中上游, 生产原料设备供应中小企业。在两岸尚未实现直接“三通”情况下, 中小企业带动岛内中大型企业跟进投资, 赴大陆单项投资规模持续扩大。2001 年两岸先后加入 WTO 后, 台商赴大陆平均单项投资额升至 234.8 万美元, 2007 年突破千万美元规模, 此后大体保持在 1 500 万~2 000 万美元水平, 大企业成为台商大陆投资的主导力量。

台商凭借两岸同文同种的独特优势在大陆快速发展壮大。许多中小型台企迅速成长为大企业, 一些从事食品、纺织、制鞋等传统产业的台商充分运用大陆优势生产要素、庞大内需市场和共同的民族消费习惯, 由台湾地方品牌很快发展成为两岸知名品牌和国际集团企业。如旺旺集团 1992 年正式在大陆投资, 1994 年在湖南设立首座工厂, 30 多年来已发展成为大型集团企业, 收入增长百倍, 跨媒体、保险、医疗、酒店、养老、文化等多个行业和领域。两岸经济关系恢复和发展以来, 台湾岛内几乎所有产业都参与了大陆投资, 保住了台湾地区作为全球加工出口基地的地位, 带动岛内产业集中向高科技产业升级, 保住了台湾制造业的竞争力^[19]。台湾中下游电子信息代工厂商在大陆的规模扩大, 使跨国公司电子产品代工订单持续向台商转移集中, 进而拉动岛内半导体等产业需求扩张, 推动岛内制造业结构快速向半导体等产业升级。当前台积电在全球芯片代工市场占有率达到 60% 以上, 其生产订单主要来自欧美地区, 产品主要出口至大陆并由台商加工组装为信息通信产品后出口海外。这显示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与两岸产业分工关系密切。

两岸初步形成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布局。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 中国内地(大陆)、港澳台地区已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合作格局, 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正呈现由多元趋向一体的态势。从贸易投资看, 大陆和香港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和进口地区, 台湾成为大陆重要投资贸易伙伴。截至 2023 年, 台湾共有 1 209 家上市上柜公司赴大陆投资, 占全体上市上柜公司的 70.5%, 累计投资 27 356 万元新台币(按照 2023 年底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约 890 亿美元)^[20]。2020—2021 年, 台湾对大陆出口依存度达到 43% 左右的历史高点。该数据近年受外部环境影响有所变化, 但大陆和香港作为台湾主要出口市场的地位没有改变。两岸同文同种, 两岸产业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密切。尤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台湾岛内发生严重泡沫经济、土地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及新台币兑美

元汇率迅速升值，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部分企业赴东南亚投资因无法克服文化差异而陷入困境。此时，台湾中小企业赴大陆投资得以生存并获得“第二春”。若没有两岸经贸关系的恢复与快速发展，台湾经济很可能陷入中小企业大量破产、产业升级缓慢的困局。两岸经贸关系恢复以来，岛内集中发展半导体、石化、机械等中上游产业，台湾现代服务业在大陆也获得新的发展空间。随着两岸产业合作密切，中华民族经济中的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持续提升，正形成多元互补、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

二、“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引领和塑造了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成为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主导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提供重大制度政策机遇。同时，外部环境剧变和两岸关系严峻复杂对两岸融合发展形成新挑战，如何因势利导、化危为机，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重大机遇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推进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两岸经济关系由此恢复并长期保持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两岸经贸关系同期进入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全面发展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步入深化融合发展新阶段。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路径。其主要政策内涵与目标，是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和推进应通尽通，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由传统“两头在外”的发展方式向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主导方式转变；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促进两岸贸易投资发展动能由过去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通过市场与动能的双转型，实现两岸融合高质量发展，在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过程中逐步构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进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多项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对完善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政策、实践“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和深远影响。

《决定》提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于推动两岸贸易投资方式由“两头在外”向国内市场主导转变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在大陆投资的台商主要采取代工生产模式，形成“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三角贸易投资方式。两岸贸易特别是台湾对大陆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方式占 60% 以上，许多台商经营与大陆内需市场和产业体系关联不密切。“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台商在大陆投资错失大陆“世界市场”的重大机遇^[19]。《决定》提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市场，着力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以及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流通体制、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等。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国内统一大市场加快建构为台商从代工生产向建立自有品牌和销售渠道、拓展内需市场提供新的市场与制度政策空间。特别是《决定》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对深

张冠华.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与实践[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41-52.

化台企同等待遇有重大意义。

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提供新的创新驱动。以创新驱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有巨大潜力与基础。《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2023年大陆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高达44%,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10%;据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的数据,大陆人工智能产业核心规模已近6000亿元,算力指数排名全球第2位、处在世界第1梯队。新能源汽车销量887万辆,世界占比63.5%。大陆庞大的创新产业与市场,为创新驱动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巨大空间。如台积电在被迫中断为华为等大陆高科技公司代工芯片情况下,2024年第2季度来自大陆的营收仍达到16%。创新驱动以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为主导的两岸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融入国家新经济市场,形成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有利于两岸高水平开放与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当前,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加速推进“倚美谋独”路线,成为阻碍两岸高水平开放和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难以推进,已达成的23项协议运行与实施也面临阻碍。当前,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更多采取单方对台开放方式推进,但开放程度与方式受到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水平不高等诸多因素制约。《决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等。中央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诸多重大改革措施,对于完善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具有重大促进意义。对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机制将步入新的制度化开放阶段。

（二）外部变局冲击和局部解构传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两岸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密切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但电子信息产业等台企出口市场主要在欧美地区,创新驱动也主要来源于欧美跨国公司外包产品与技术升级。近年来,外部环境剧变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下的全球供应链重构,深刻影响传统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格局。“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两岸供应链模式面临较大冲击,部分供应链加快回流台湾岛内或外移其他地区。台湾对大陆投资、出口依存度波动性增强并出现调整。台湾岛内的半导体、信息电子产业正加快融入美国人工智能等供应链体系,但由于美国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加强对华遏制,两岸新技术产业合作面临复杂挑战。

外部环境剧变影响下,两岸贸易投资及台湾对外贸易投资结构加快调整,“两头在外”的传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方式正在局部解构。据台湾方面统计,近年来台湾对大陆(包括香港)出口依存度先是由2018年的41.3%一度上升至2020年的43.9%历史最高点,随后持续下降至2023年的35.2%,2024年1—9月又降至31.2%^[21]。投资方面,2018年后台湾对大陆投资占整体对外投资比重由过去60%以上的情况加大调整,2023年降为11.4%,2024年1—7月再降至8.7%。同时,台湾当局与美国等加快重建直接供应链,对外贸易投资向海外扩展。台湾地区对美国出口比重由2018年的12%左右持续上升到2023年的17.6%,2024年1—9月又快速上升至24.1%,创本世纪新高;对东盟出口比重由2018年的17.4%升至2023年的17.6%,2024年1—9月为18.2%^[21]。拉动台湾对外贸易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布局调整带动的供应链重组。在中美贸易摩擦、美西方加大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

以及美国加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增强供应链韧性政策影响下，部分原在大陆生产的电子信息产品向东盟、北美、中东欧转移，直接拉动台湾地区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台积电应美、日、欧等“要求”前往投资设厂，已规划对美（650 亿美元）、日（225 亿美元）、德（100 亿欧元）总投资金额近千亿美元。在未来 5 年或更长时间内，28 纳米及以下的海外产能将达 20% 以上。尤其是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兴起，其人工智能芯片主要依赖台积电代工，人工智能服务器制造 90% 左右来自台湾电子代工厂商，台湾服务器对美国出口比重由 2017 年的 8.1% 快速增长至 2023 年的 73%。岛内电子信息产业从技术到市场加快向美倾斜。

（三）民进党当局加速构建“倚美谋独抗中”经济产业体系

2016 年民进党当局重新上台后，基于“倚美谋独抗中”路线，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两会协商机制停摆、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发展进程停滞。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施政上推动“脱中入美”，力图减轻对大陆经济依赖、加入美西方经济体系。

2016 年蔡英文当局推动所谓“经济发展新模式”，目的是将依托大陆发展的“效率驱动”模式转换为不依赖大陆的所谓“创新驱动”模式。台当局对内重点发展与大陆关联度较低的“5+2 创新产业”，对外全力推进所谓“新南向政策”，声称“希望新模式能够有助于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在蔡英文首个任期内，所谓“经济发展新模式”成效欠佳，“5+2 创新产业”未有起色，所谓“新南向政策”实施后台湾地区对东盟贸易投资不升反降。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蔡英文当局推出“投资台湾三大方案”吸引台资回流。其中重点吸引台商回流的《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到 2024 年 9 月 13 日共吸引 317 家企业、13 003 亿新台币返台投资。蔡英文在第二任期强化“倚美谋独抗中”路线导致两岸关系严峻复杂，台当局提出重点发展“六大核心战略产业”，涉及领域与所谓“台湾安全”密切相关。2022 年蔡英文“双十讲话”强调打造“韧性经济与产业”，包括提升台半导体产业“护台神山”地位、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构建全球供应链韧性与流通体系等，显示台当局经济施政加快向所谓“经济安全”和构建“备战”经济体系发展。

2024 年赖清德上台后加大“急独”冒险挑衅，以强化两岸“制度对抗”“和平保台”掩护“抗中谋独”，以谋求融入所谓“民主共同体”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上，赖清德当局提出“五大信赖产业”，全方位推进经济“脱中入美”，强化所谓“经济安全”。“五大信赖产业”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是提升台湾核心产业的地缘政治地位，强化半导体自主供应链体系，将目前世界市场占有率超过 12% 的产品提升至 30%，打造“护台群山”，增强外部势力在台经济利益，提升其“保台”经济动机。二是增强所谓“经济安全”，除持续加强关键战略物资储备外，还在通信、信息“安全”等领域强化所谓产业“安全韧性”。赖清德上台后还专门成立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目标之一是“必要时支持军事行动”。三是加快与大陆产业脱钩，相关产业的技术来源与市场更依赖欧美而与大陆关联较弱。部分重点发展产品如监控产品、无人机等更是借美西方排斥大陆产品而力图取代。四是融入并扮演所谓“民主价值供应链”关键角色。台当局谋求在军工产业、安控产业、人工智能及新一代通信产业等领域嵌入美西方相关产业并扮演关键供应链角色，声称成为亚太第一“民主供应链中心”，试图深度与外部势力进行战略产业捆绑。同时，赖清德当局加大开展“经贸外交”力度，拓展“台独”国际生存空间。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声称，将着力推动以所谓“民主”为核心的“价值外交”、以“和平”为核心的“同盟外交”及以“繁荣”为核心的“经贸外交”，

张冠华.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与实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41-52.

分别建立所谓“民主价值链”“对抗‘威权’的第一岛链”以及“信赖供应链”。

（四）两岸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格局与态势不可扭转

今后一段时期，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面临的重大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大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经济引力与外部势力及民进党当局策动的离心力将步入更为复杂和关键的博弈时期。总体来看，外部环境剧变及两岸供应链重构对台湾经济影响复杂；中长期来看，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强劲引力始终占据上风。

经过 40 余年发展，两岸在同文同种、地缘相近、优势互补基础上已形成了中华民族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台湾地区经济不可能脱离大陆庞大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优质生产要素而实现长期繁荣发展。台商在大陆迅速发展壮大，具备了在海外直接投资的能力。近期台商应对地缘政治展开的海外多元布局，更多是将部分下游加工组装阶段外迁，而中上游产业须依托大陆生产供应，仍离不开两岸供应链的强力支撑。当前台商对外投资总量的半数仍在大陆，其中制造业投资的三分之二在大陆。两岸融合发展的基础坚实。台商在两岸及第三地进行的产业链重构，客观推动两岸供应链向海外第三地拓展。近年来大陆对台湾地区、越南等地中上游零组件出口快速增长，显示台商海外布局仍离不开大陆生产的支撑^[22]。

岛内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交流与经贸合作，两岸关系紧张加剧台湾经济发展风险。基于地缘政治因素而非市场配置导致的两岸供应链重构，导致台湾地区产业发展过度向半导体等 ICT 产业倾斜，其他产业发展持续低迷不振。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普遍薪资较低，而薪资较高的 ICT 产业就业者占总就业人数不到 10%，使岛内贫富差距不减反增，2017—2023 年最高 20% 家庭收入与最低 20% 家庭收入之比由 6.07 升至 6.12。多数岛内民众获得感不强，2024 年赖清德虽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但处于“双少数执政”困境。近年来岛内民调显示，多数民意支持两岸交流与经贸合作，对民进党当局政策形成制约。同时，两岸关系日益严峻复杂形势下，美西方加快分散对台关键产品供应链依赖的动机增强，不仅“要求”和吸引台积电赴美、日、欧直接投资建厂，还在“友岸外包”中将台湾排除甚至视为“危岸”，要求台企采取“台湾+1”方式在海外布局以规避风险。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力图持续提升半导体等产业在美西方关键供应链的角色地位，增强台积电等半导体产业的地缘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强化“倚美抗中”路线加剧台海地区风险，反而增强美西方关键供应链的“去台化”动机。民进党当局陷入矛盾困境，将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

三、“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发展方向

当前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主体经济与台港澳地区经济既密切合作又各自保持相对独立的运行体系，形成多元共存的经济形态。践行“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渐进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和构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对于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和实现民族复兴意义重大。当前，外部复杂挑战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并存，应善于化危为机，坚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在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引领两岸共同市场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陆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广，完全容得下来自台湾的商品，完全容得下来自台湾的企业^[7]。发展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大

陆经济应扮演主导角色，即应形成以庞大内需市场为牵引、完整产业体系为依托、自主创新为驱动的发展动力机制，推进经济合作制度化，渐进式打造共同市场，引领台湾经济产业深度融入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提升大陆对两岸融合发展的主导力、践行“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提供更有利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今后一段时期，应充分运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机遇，推动“两头在外”、跨国公司主导的两岸供应链合作方式向大陆市场和产业主导的合作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存量台企由代工生产为主向发展自主品牌升级，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 and 完整产业体系实现经营方式转型升级，推进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相互嵌入式合作，以产业融合引领两岸经济融合，塑造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新格局。

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强两岸融合发展的创新驱动动力。近年来，两岸产业结构水平拉近、传统生产要素互补优势减弱，但在经济形态、产业布局、新技术革命等领域形成新的高度互补优势。把握国家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大机遇，要推进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动能由要素驱动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强两岸高技术产业合作有利于集聚两岸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对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和促进大陆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着力加强两岸融合发展的创新驱动机制与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密切衔接，扩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度供给中的同等待遇。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中重视和发挥台胞台企作用，推动两岸技术、人才、数据等领域交流合作。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推动两岸创新要素跨境有序自由流动，同等优先对台全面开放制造业及相关现代服务业，鼓励支持台企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积极推进两岸制度性开放，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推动台胞台企同等待遇。要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作为两岸融合发展主动力，将两岸供应链合作导入大陆新经济市场。

以高质量对外开放提升两岸融合发展水平。在民进党连续当政形势下，今后一段时期既要着眼于提升两岸融合发展水平，加大对台开放力度；又要针对民进党限制两岸经贸交流政策采取有力反制措施；同时结合全球及两岸供应链重构，把握大陆高质量对外开放机遇，推动两岸产业合作向海外拓展延伸。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与 RCEP、“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鼓励两岸企业充分运用 RCEP 的原产地累积规则，推动两岸供应链与 RCEP 区域内产业链、价值链相融合，积极构建以大陆市场和产业体系为依托、向 RCEP 国家和“一带一路”区域延伸的两岸新型产业合作布局。要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机遇，完善推进两岸制度性开放的政策机制，通过党际、民间、区域、企业合作等多元合作机制与平台推动两岸应通尽通，推进两岸制度、规则、规制、标准、资质对接相容，逐步构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制度化框架和共同治理平台。

探索共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产业的新路径。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既有民族特色，也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两岸经济各自特色与比较优势，共同发展具有民族共性与特色的经济产业，应成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推动两岸现代服务业合作，逐步加大对台开放力度，对台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两岸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共同培育壮大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新一轮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产业迅速崛起，为两岸产业合作提供新空间。两岸应加强创新合作、标准共通，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共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创

张冠华.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与实践[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41-52.

新产业。

在融合发展中深化同等待遇，践行“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台商是特殊内资，两岸贸易是特殊内贸，应加强政策创新，进一步实践“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同时，台澎金马为单独关税区，应通过推进两岸制度化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来实现同等待遇。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停滞形势下，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要更多通过单向方式推进台胞台企在大陆同等待遇。应结合《决定》创新完善两岸融合发展制度政策，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在性质和实践上赋予台胞居民以市民待遇并向公民待遇扩展，视台企为中华民族资本并在更多领域给予同等待遇，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与民族责任感。

务实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当前，应务实运用和维护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既有成果，持续扩大两岸人员和经贸往来。在中长期政治条件具备后，要在既有经济合作制度化基础上构建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制度机制，推进两岸资金、技术、人员、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便利化、自由化，构建两岸宏观与对外经贸政策协调机制，努力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目标，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 [1] 闫瀚东, 闫安.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实践——两岸经济合作历史回顾与存在问题思考[J].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 1-4.
- [2] 李曦辉. 发展中华民族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探讨[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3): 42-50.
- [3] 徐光木. 中华民族经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及实践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5): 13-25.
- [4] 习近平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N]. 人民日报, 2010-04-11(2).
- [5] 习近平在会见萧万长一行时强调 两岸同胞要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N]. 人民日报, 2013-04-09(1).
- [6] 习近平会见萧万长一行[N]. 人民日报, 2013-10-07(2).
- [7] 习近平在福建调研时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和保障[N]. 人民日报, 2014-11-03(1).
- [8] 习近平致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10周年的贺信[N]. 人民日报, 2017-05-25(1).
- [9] 习近平. 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2019年1月2日)[N]. 人民日报, 2019-01-03(1).
- [10] 习近平向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10周年年会致贺信[N]. 人民日报, 2023-11-15(1).
- [1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2023: 2.
- [12] 外经贸部和国台办发言人就中国台北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发表谈话[G]//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年鉴.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1: 921.
- [13] 吴宜. 以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J]. 闽台关系研究, 2024(1): 17-30.
- [14] 李非.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M]. 北京: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94: 80-81.
- [15] 刘震涛, 江成岩, 王建芬. 前途——再论两岸经济关系[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36-37.

- [16]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的决定 [EB/OL]. (2016-07-28) [2024-11-1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6-07/28/content_5090926.htm.
- [17] 季烨. 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同等待遇法律问题刍议 [J]. 台湾研究, 2018 (3): 40-47.
- [18] 李成钢. 改革开放 40 年来利用外资法律制度的变迁与展望 [EB/OL]. (2019-02-20) [2024-11-10].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9-02/20/content_2071908.htm.
- [19] 陈添枝. 越过中度所得陷阱的台湾经济 1990—2020 [M]. 台北: 远见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2022: 312.
- [20] 上市(柜)公司 2023 年度海外及大陆投资情形 [EB/OL]. (2024-04-18) [2024-11-10].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4180002&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 [21] 2024 年 9 月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 [EB/OL]. (2024-10-08) [2024-11-10]. <http://www.mof.gov.tw>.
- [22] 张冠华. 全球经济变局下两岸供应链重构走向探讨 [J]. 亚太经济, 2023 (5): 143-152.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王京菁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与实践维度

陈文元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新时代党中央审视当前国内外形势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展是解决各类民族问题的总钥匙，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发展才是第一要务、坚定民族团结大政方针，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紧密联结起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建设与治理的整体性、战略性工程，应充分考虑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强化共同、增进凝聚、把握机遇等实践维度，巩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统治根基，稳步推进各民族共同迈入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1-0053-10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1.005

作者简介：陈文元，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副教授，“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高端智库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贵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高端智库专项课题“贵州省打造民族交融互嵌典范的问题与对策调查研究”（GZMUSK【2023】ZK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的动力机制研究”（21&ZD212）

引用格式：陈文元.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与实践维度[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53-62.

一、问题的提出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使命之成败。进入新时代以来，国际局势严峻，政治格局日趋复杂，国家宏伟前途与中华民族命运交织。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民族工作将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来自内部的风险隐患和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的历史时期^[1]。值此背景，开展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国家大计、民族大计。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202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2]202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把“广西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腹地”^[3]。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4]。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作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5]。因此，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既是积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与进步，也是新时代我国抵御内外风险的保障与后盾。

“腹地”一般指统治中心的周边区域，现在指中心城市的毗邻地区，犹如卫星城，起到辅助、巩固作用。对省级、市级行政区划而言，腹地就是与省会城市、地市城区中心有一定距离但又在其影响与辐射的范围之内的区域。扩大开来，腹地与边疆、边区、边地有重合，既非“焦点”与“核心”，亦非国家发展建设的“龙头”与“支柱”^[6]。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国家战略腹地是对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发挥支撑作用的非国家核心区域^[7]。国家战略腹地应具备地理区位的枢纽性、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创新发展的引擎性、城市文化的凝聚性等基本特征^[8]。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形态复杂，平原、山地、高原、草原、森林、河流、海洋、沙漠、冰川兼而有之，各地风俗习惯不尽相同，社会结构不一，民族众多，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既有先天的优势，又有较大的施展空间。从历史维度审视，中国有着丰富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经验，自先秦伊始到近现代以来，采取了诸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移民、商贸等多类方式加强腹地与后方开发建设，既推进了国家治理，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日益巩固。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协同奋进、努力拼搏，相继开展了三线建设、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西部协作等战略国策。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开展的三线建设，可视为当代中国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先行范例，既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又促进了各民族互动互嵌互融，实现了边疆与内地的进一步整合^[9]。

从地理环境与区位结构审视，中西部地区既是我国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点区域，又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区域。在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中西部地区可以发挥重要地位和作用，能够体现我国在区域发展方面全局一盘棋的战略主动^[10]。因此，经由国家协同调配东部沿海地区资源与力量推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动力与支撑。相应地，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与进步，进一步平衡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从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方位发展。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是全中国各个区域、各个民族共同的事业，并非边疆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的单向任务。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势在必行，

边疆与内地若不能协同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不能全面实现。双向铸牢、共创共赢, 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11]。新时代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具有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战略功能, 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系统支持, 有利于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当前, 围绕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这一重要国家大计与发展契机, 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 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全面开展多元策略, 巩固已有业绩, 开拓全新局面。基于此, 笔者审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形势, 思考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与实践维度, 进一步突显“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深嵌关系, 以期为新时期国家大发展和中华民族大繁荣提供思维借鉴。

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建设与治理的整体性、战略性工程, 既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又有通过加强各民族大团结来促进国家建设的战略价值。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两者既互为依托, 又相互夯实。发展是民族工作开展过程中解决各类问题的总钥匙, 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结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政治资源、经济助推、文化熏陶, 坚持发展才是第一要务, 坚定民族团结大政方针, 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紧密结合起来, 促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昌盛。

(一)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更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亦无法前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掌舵手,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优势。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现实依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12]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 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打败了西方列强和国民党反动派, 建立了新中国, 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又克服种种困难,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 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诸多历史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废除了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制度, 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全心全意帮扶各民族开展社会经济建设, 实施援藏、援疆计划, 开展民族地区专项扶贫、特殊扶贫工作与惠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就业、卫生、医疗政策, 各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多重困难与不同挑战中砥砺前行, 我们党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将“民族团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线。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国已建立了健全的民族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各司其职、基层广泛参与的民族工作强大合力。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坚强领导至关重要。历史和实践充分

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根本保证。

（二）坚持发展才是第一要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仅仅是一项纲领、一份文件、一个口号，而是要贯之于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基础上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谱写了中华儿女筚路蓝缕、团结奋斗的精彩华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的民族，没有先祖先辈的辛勤耕耘、一路向前，就没有今天光辉灿烂的成就。勤劳务实、奋发有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

就全国而言，发展总体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社会进步，才能摆脱内部困境，为各民族争取更多的资源、利益，使各民族在发展中团结，在团结中进一步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拼出来、干出来的”，“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12〕}。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不是单纯的政治任务，不搞形象工程，不能浪费资源，更非狭隘的平均主义，要严格秉持“发展才是第一要务”的根本宗旨。近些年来，国家稳步推进江海联运、新亚欧大陆桥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现代化交通网络的规划与建设，努力将中部国内大通道与西部联通欧亚的区位优势发挥出来，以优化提升、深入构建中西部地区在国内大循环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地位与战略优势。而且，经由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通过国家布局将东部沿海地区的技术、产业、人才、资金向中西部地区过渡、转移，既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空间结构与产业模式的调整、转型，又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重构、升级，增强了经济实力，从而保持国内大循环供给与需求的全局动态平衡。现代国家体系与体制下，发展才是硬道理。深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有雄厚国力与强大经济实力的基础保障，才能充分发挥其最大的实效作用。坚持发展才是第一要务，以统筹全国、全社会、各民族、全方位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在团结奋斗中实现各民族繁荣发展。

（三）坚定民族团结大政方针

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要以各民族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为出发点开展经济社会建设。民族团结是稳定之根、力量之源，处理好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奋勇前行的重要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中，“团结”一词出现多达 26 次。确保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华民族前进道路的重要基石，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也要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努力提升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全力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13〕}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更须以保障各民族权利和利益为前提，从各民族根本利益的角度谋篇布局开展相关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基于国

陈文元.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与实践维度[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53-62.

家政策、国家力量推动社会建设,应以增进“共同性”为目标,带领各民族团结奋斗走向繁荣富强,以更好地抵御未来国内、国际乃至自然界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团结就是力量。中华文明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延续发展,靠的就是各民族同心同德、团结互助。坚定民族团结大政方针,努力构建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政治结构,才能发挥出中华民族的强大实力,攻克各类难题,渡过各种难关。历史经验表明,团结则事成,分裂则事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离不开各民族团结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各民族精诚团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各民族万众一心、携同并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要起到争取民心、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要通过国家建设、战略布局,引导各民族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嵌入,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三、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维度

新时代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结合实践维度,应充分考虑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强化共同、增进凝聚、把握机遇等方面,更系统地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深入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稳步地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一) 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繁荣发展的一切前提,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是国家军事部门的职责,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关键区域的影响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14]。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的国家联合各种反华势力频频发难,抹黑我国民族工作,推动“民族问题国际化”,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就无法完成。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应确保以国家安全为根本红线,以关乎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的责任意识来推进。

一方面,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抵御外部冲击实现高水平安全的稳定器;另一方面,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在综合考虑国家安全前提下的谋篇布局,旨在防患于未然。以贵州为例,贵州深处西南腹地,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多民族交错杂居,地理形态复杂,如果仅以传统视角审视,贵州的区位优势并不突出,在现代国家发展战略中似乎无法成为重要辅助。但贵州动植物、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多彩贵州拥有着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与特色的人文环境,又有气候温度与空气质量的加持,再加上地处西南与中南的交汇,作为战略后方迂回调整空间与条件极佳。贵州与其他省份相比有着天然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优势,贵州是新时代国家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支撑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依次布局钢铁、能源、军工、交通、通信、大数据等产业进入贵州。如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贵州重点发展铁路、钢铁、国防、航空等产业,电力、机械、化工、冶金、建材等亦获得长足发展,川黔、贵昆、湘黔等铁路相继通车^[15]。近年来,贵州的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四年排名全国第

一^[16]。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这一重要部署，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多元化，为经营主体抵御外部冲击提供后备支持，能够使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新突破，把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战略基石筑得更加牢固。

（二）经济建设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内部之所以能够和平共处，与各民族在经济往来中十分讲究互利互惠密不可分^[17]。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2]。这充分表明，推动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抓手，也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例如，“十三五”期间，国家向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多达 3 800 余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高达 2 万多亿元^[19]。“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与“推动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战略，表明国家极为重视经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国东西部经济差异明显，国家战略腹地是经济动能转换的承载区，是“后方”支撑起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能够增强经济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路径。具体来说，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要统筹兼顾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效能与结构布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国内大循环进入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打造优势产业、基础行业，逐步减少被外部技术遏制与资源依赖，增强国家经济的稳定性与多样性，提升危难时刻的抵抗力，深化后备支撑，将时代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有了物质保障与经济发展加持，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才能更为充分、更有活力，从而呈现更高质量的民族工作，构建更高层次的民族团结。

（三）强化共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0]自先秦至清，中央王朝不断强化对周边各族的统治与治理，各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完整的中国统一体，不是由我国某一个民族建造的，而是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建造的^[21]。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各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这一“共有家园”的“共有精神”^[22]。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更要积极利用和强化这些元素。

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西部地区将是重点。而中西部地区又是我国各民族聚居的重要区域，蕴含着丰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实践，更积累了丰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巩固的经验启示。中西部地区的时空、地理、人群编织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变脉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构建的中心，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工作的指引^[23]。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不能忽视中西部地区的角色和位置。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要更进一步强化各民族共同体意识，挖掘各民族共同性元素，描绘各民族手足相亲、互相帮扶的团结画卷。

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解决好民族问题、处理好民族关系、做好民族工作，始终是事关改革

陈文元.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与实践维度[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53-62.

发展稳定全局, 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的大事。如作为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 云南位处我国西南边陲, 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是我国民族工作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2015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 云南民族关系亲密融洽, 民族工作成绩突出, 这是云南最可宝贵的财富。在党的殷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 云南各民族和衷共济开创了新格局、新面貌, 经济总量稳步提升^[24]。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发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引领作用, 云南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宗教活动场所等“6+N进”工作。持续实施“石榴红”工程, 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同心营”“百家宴”等交流活动, 各族群众联系不断加强、了解不断加深、认同不断增进。深入挖掘茶马古道、西南联大旧址等历史文化遗存, 引导各族群众树牢“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25]。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腹地之一, 云南实现了大变革、大发展, 各民族在经济建设中进一步交融互嵌, 为国家的繁荣稳定与民族团结贡献了重要力量。

(四) 增进凝聚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构建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式格局, 是保持国家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具有延续性与拓展性的民族团结战略^[26]。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应结合各地的实际开展多方面实践,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具体的经济社会建设活动当中, 经由国家与地方双向助推, 辅之民间助力, 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商贸、旅游等各个领域开拓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不断深化“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交融互嵌关系。譬如近年来, 贵州省积极实践探索, 利用“多彩贵州”民族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村BA”“村超”。2023年, 历时78天的“村超”赛事, 共举办98场比赛、126场民族文化表演, 火热的赛事、多彩的民俗、活跃的市场, 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27]。以“村BA”“村超”为新引擎的“贵州经验”, 对于当前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亦有参考价值。

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中西部地区将是重点。现今的中西部地区, 是在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国家治理、因俗而治、民族迁徙、移民戍边、屯田、和亲、商贸、战争等情况后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地开展帮扶互助、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交通改造、乡村振兴、美丽中国建设等发展举措。这些举措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路径与技术手段, 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转型, 夯实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合理开发利用民族关键符号能够强化民族认同, 促进民族团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8]。要借助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契机, 积极利用中西部地区体现民族团结的历史文化资源, 推陈出新, 构筑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

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具有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要汇集全国、全民族、全社会的力量,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属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交通等领域互通有无、一体联动、互为依存。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既能提升中西部地区社会发展, 也能优化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与市场空间, 两者在资源、技术、人力上有着广阔的协同互构关系。

（五）把握机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展开的。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更应在这一大的背景下统筹谋划。当前，国内的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把握发展机遇就是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机遇。

当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矛盾与风险并存，来自国外的打压遏制亦可能升级。结合当前国内发展形势，中国全域协调发展已进入关键期，到了“以中促东”的新发展阶段^[29]，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冲锋机”需要中西部地区这一“助推机”的强力支撑。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对于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与中心城市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理应妥善谋划，稳步布局，把握主动权，统筹开展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当前形势虽有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一定意义上，新时代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三线建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三线建设”是我国面对国际形势恶化和外国势力封锁的极端条件下的备战方案，大量军工、钢铁、煤炭、机械、化工、冶炼、电子、交通、能源等产业在西南、西北地区铺展，堪称西部大开发的先行^[30]，这些举措奠定了现今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党中央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部署，旨在未雨绸缪、预先准备、强大自身，全面发展中西部地区，平衡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国家发展结构体系。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既是开拓国家发展空间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全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

四、结语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际形势存在不确定性、复杂性，内外风险挑战增多。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大部署，这既是接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与进步，更是新时代我国抵御内外风险的现实保障。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把握关键要素，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发展才是第一要务、坚定民族团结大政方针，充分考虑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强化共同、增进凝聚、把握机遇等实践维度，努力构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共建共生共融格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推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路径，须全国一体谋划、分级分类调整。要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开创新的发展格局、新的前进力量，全方位实现中国全域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将各民族团结起来，携手并进、万众一心、共同奋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合力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参考文献：

- [1] 郝亚明. 从五个主题词来深刻把握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J]. 西北民族研究, 2023(2): 5-15.
- [2] 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 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返京途中

陈文元.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与实践维度[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53-62.

在陕西汉中考察 蔡奇陪同考察[N]. 人民日报, 2023-07-30(1).

- [3]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蔡奇陪同考察[N]. 人民日报, 2023-12-16(1).
- [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N]. 人民日报, 2023-12-13(1).
-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 2024-07-22(1).
- [6] 陈文元.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的边疆边区边地: 历史向度与时代意义[J]. 青藏高原论坛, 2024(3): 1-6.
- [7] 张可云.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N]. 中国经济时报, 2024-10-09(1).
- [8] 蒲清平, 马睿.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和推进策略[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37-48.
- [9] 陈文元. 论历史移民与民族交融互嵌——以三线建设为讨论中心[J].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 2024(6): 1-7.
- [10] 李芳华.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N]. 光明日报, 2024-05-21(11).
- [11] 纳日碧力戈. 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4): 1-5.
- [1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13]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8-29(1).
- [14] 汤继强. 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2): 3-25.
- [15] 扈伦. 贵州的三线建设[J]. 贵州文史丛刊, 1988(4): 38-41.
- [16] 王恬. 讲好70年发展的贵州故事 奏响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强音——“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贵州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综述[N]. 贵州日报, 2019-10-10(1).
- [17] 徐光木. 中华民族经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及实践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5): 13-25.
- [1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19] 李俊清. 找准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发力点[N]. 中国民族报, 2021-10-12(5).
- [20]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N]. 人民日报, 2019-09-28(2).
- [21] 翁独健.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8.
- [22] 陈文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与现实路径——基于发挥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作用的视角[J]. 青海社会科学, 2023(1): 64-69.
- [23] 郝亚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3): 9-13.
- [24] 数说75年 | 你好, 这里是云南! [EB/OL]. (2024-11-05) [2024-12-06]. <https://www.yn.gov.cn/sjfb/>

sjtj/202411/t20241105_305398.html.

- [25] 王宁.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云南各项工作的主线 [N]. 中国民族报, 2024-02-27 (1).
- [26] 郝亚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若干话语趋向 [J]. 民族研究, 2022 (4): 1-12+139.
- [27]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调研组. “村超”、“村 BA”何以火爆出圈 [J]. 求是, 2024 (11): 63-69.
- [28] 田敏, 陈文元. 论民族关键符号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南宁市三月三民歌节为例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1): 24-30.
- [29] 王小广, 周擎擎, 梁雅楠, 等.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J]. 区域经济评论, 2024 (5): 48-57.
- [30] 王庭科. 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 [J]. 党的文献, 2000 (6): 63-67.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龚静阳



《黑神话：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的逻辑、路径与启示 ——基于文化符号视角

李培鑫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与其他媒介形式相比，电子游戏以其交互性特征更加契合青年群体的文化接受规律，使“电子游戏+文化符号”成为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强力引擎。作为主打文化表达的作品型游戏，《黑神话：悟空》克服了市场盈利导向下文化符号的拼贴与杂糅，其文化符号呈现高度契合“两创”要求的内在价值指向。从具体路径方面看，《黑神话：悟空》通过使用作为叙事构件的文化符号、作为人文理念的文化符号、作为交往媒介的文化符号，分别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表征、精神内核与文明意蕴，实现了游戏叙事与文化叙事的相促相融。从经验启示方面看，《黑神话：悟空》的文化符号呈现，深度把握了游戏性与人文性、传统性与时代性、主体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动态张力，展现出独属于中国游戏创作者的文化抱负，为后续的游戏文化产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范本。应当持续深挖《黑神话：悟空》案例对文化表达方式创新的有益启发，为今后运用电子游戏叙事等多种方式，创新讲好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故事增添力量。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文化符号；游戏；《黑神话：悟空》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1.006

作者简介：李培鑫，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度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研究”（22VSZ055）

引用格式：李培鑫.《黑神话：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路径与启示——基于文化符号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63-76.

一、问题的提出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202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3]。2024 年 10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4]由此可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是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必由之路。

作为“第九艺术”与“文明容器”的电子游戏,已经成为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要载体。这方面最有代表性、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无疑是中国游戏开发商游戏科学(Game Science Studio)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开发上线的国产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以下简称《悟空》)。上线当日,这款游戏在全球游戏平台 Steam 的在线人数迅速突破 200 万。2024 年 8 月 22 日,《悟空》在 Steam 热玩榜和热销榜均位列第一。同年 8 月 23 日,《悟空》的全平台销量已超过 1 000 万套,总销售额超过 15 亿元,好评率达到 97%。2024 年 11 月 22 日,在第 42 届金摇杆奖颁奖仪式上,《悟空》连续获得“终极年度游戏”和“最佳视觉效果”两项国际性游戏大奖。2024 年 12 月 13 日,在被誉为游戏界“奥斯卡”的 TGA2024 颁奖典礼上,《悟空》斩获年度“最佳动作游戏”和“玩家之声”两个奖项。在成为游戏圈“国民级游戏”的同时,《悟空》也“出圈”到文旅、外交等多个领域,如山西临汾市隰县小西天景区等游戏中的一些取景地,在“跟着悟空游山西”^[5]话题下,吸引众多游客开启“文化朝圣”之旅;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其“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6],并欢迎海外游客开启“东游记”,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命之旅”。文化表达是电子游戏的构成要素和标识,没有文化表达的游戏是浅显的、空洞的。《悟空》之所以爆火,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其以游戏为媒、以文化为核,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二次创作,向世界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

当前,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切入对《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研究。第一,文化产业视角。有学者从中国文化产业历史变迁的视角探讨《悟空》如何在游戏文化体验、前沿 3A 技术和产业崛起的三重作用下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IP^[7]。第二,传播学视角。有学者认为,《悟空》合理运用一系列“智能+”的数字传播策略,在保住自身传统文化气质的同时,拓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8];有学者全面审视了游戏媒介形式的传播特质,认为《悟空》以多样化的表现手段激发不同地域文化的共振、实现跨文化共情,提升了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力与传播效果^[9]。第三,游戏演化规律视角。有学者认为,《悟空》在游戏玩法上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实现了游戏玩法与传统文化之“器与魂”的深度融合,而传统文化的巧妙融入,为其带来独特美学和厚重底蕴,增

李培鑫.《黑神话: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路径与启示——基于文化符号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63-76.

强了游戏的生命力和感染力^[10];有学者指出,《悟空》借鉴了深具日本与欧美传统的“魂系”游戏机制,在玩家具身“表演”与“游历”以及一系列环境细节、物品描述和NPC对话中打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景观世界^[11]。

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理论脉络,但其中的逻辑机理与具体路径尚未得到明确揭示,尤其是欠缺从文化符号视角探讨《悟空》文化意义生成的深层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2]文化符号是承载特定文化意义、观念与价值的标识,能够以恒久的符号载体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传达并强化某种文化的独特性和认同感。本文尝试解析《悟空》游戏空间中文化符号的呈现、运转以及意义再造机制,并以《悟空》为方法,总结出具有普遍价值的“电子游戏+文化符号”建构经验,为游戏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增进文化认同提供参考。

二、《悟空》以文化符号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机理

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13],符号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文化符号在电子游戏中的选择和呈现不仅关乎视觉效果,更关乎文化记忆中符号意义的重新解读和诠释。我们可从理论、实践和价值这三个维度,精准把握《悟空》以文化符号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机理。

(一) 理论基础:文化符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文化符号”是由“文化”和“符号”构成的集合性概念,其中,“文化”限定了“符号”的指代范畴,“符号”为“文化”展开自身提供了基本载体。分别来说,文化是指包括知识、信仰、传统、艺术、法律、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要素在内的精神产品的总和,符号则是象征、代表和指示事物的媒介。故而,文化符号是承载着特定文化意义、观念与价值的标识,能够以恒久的符号载体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传达并强化某种文化的独特性和认同感。

马克思在对思辨哲学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与扬弃中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符号研究。他强调,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最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脱离社会生产实践的文化符号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华民族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立足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生产生活实践,通过文化编码、赋意,凝练总结出一系列用以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文化符号。从文化符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看,长城、元宵、中华龙、中国结、十二生肖等一系列文化符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变迁,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命脉,是代表中国形象、展现中国精神、彰显中国气质的重要载体。

文化符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因为其具有直观性、传承性、共享性等特质。第一,文化符号具有直观性。文化符号能够以简明直观、高度凝练的方式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例如,“福字”“喜鹊”“莲花”等文化符号,均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价值观,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将古人追求幸福、吉祥、清廉等一系列抽象、复杂乃至“不可传达”的观念和

情感传达出来。第二，文化符号具有传承性。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纽带^[14]。借助具象化的文化符号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跨越时空的界限，充分唤起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与心理归属，不断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身份确认。第三，文化符号具有共享性。文化符号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既承担着文化传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责任，又是文化创新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出海”的重要工具，为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关键支持。

（二）实践求索：“电子游戏+文化符号”是助推“两创”的强力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5]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工作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障碍。

首先，西方强势话语降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度。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强势话语下的文化霸权成为“两创”工作的首要挑战。西方在其电影、小说、戏剧、电子游戏等文化产品中嵌入大量文化符号，潜移默化中构建了一套西方主导的世界文化秩序^[16]。在这个秩序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猎奇式想象”，被无端误解。这导致部分人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降低，甚至存在文化虚无主义倾向。

其次，浅层化认知僵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力。个别文化工作者对于文化内涵的浅层化认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照本宣科，忽略现代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需求和期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未能被深度挖掘；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度创作，通过低品质内容吸引公众流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与流行文化和各类新技术手段进行生硬地结合，引发文化失真和文化扭曲问题。

最后，碎片化信息分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意力。互联网平台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固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要途径，但海量的碎片化信息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显著的工业症候。人们可能深陷一种注意力分散的异化状态，年轻人更青睐冲击力强、信息传递直观的文化产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粘性与深度面临考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工作所面临的障碍，使文化产业工作者与相关学者开始寻求更具创新性尤其是更加贴近年轻人行为习惯的模式。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 5.5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51%^[17]。电子游戏在社会媒介图景中扮演了愈发重要的角色。究其原因，不同于其他媒介的单向传播形式，电子游戏可以创造交互式的文化体验，高度契合青年群体文化接受的规律：以青年群体为主体的玩家不再是传统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基于角色代入，融入沉浸式的文化氛围中，成为文化的主动参与者、建构者。最重要的是，电子游戏能有效吸收年轻一代的热情和创意并贯穿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中，提高中国文化的“青春度”^[18]。

因此，电子游戏本身并非“玩物丧志”的低级娱乐活动，也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其和“精神鸦片”划等号，“电子游戏+文化符号”已经成为当今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强力引擎。2021 年 11 月，商务部、中央宣传部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鼓励优秀传统文化产品、文化创意产品和影视剧、电子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出海。北京、

李培鑫.《黑神话: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路径与启示——基于文化符号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63-76.

重庆和杭州、广州等多地政府也陆续出台游戏产业扶持政策,支持电子游戏积极进行文化表达。《原神》《逆水寒》《江南百景图》《燕云十六声》和《悟空》等国产游戏积极探索文化符号呈现的多元方式,使玩家在游戏过程获得强烈的文化沉浸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利用与传播拓展出广阔的空间。

(三) 价值耦合:《悟空》的文化符号呈现高度契合“两创”的价值指向

国产游戏中的传统文化符号呈现,既是我国文化事业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现实中“两创”困境所“倒逼”的必然结果。

问题在于,有的游戏开发商在市场盈利导向下,仅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符号当作游戏卖点与噱头,导致文化符号被商品化处理,其文化意蕴被商品逻辑冲击殆尽。例如,一些游戏场景设计中加入“长城”“兵马俑”等视觉符号,但缺乏对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深层挖掘;一些游戏将“孙悟空”“哪吒”等历史人物符号作为其游戏角色,仅靠“帅”或“技能炫酷”来吸引受众,未能体现人物背后的精神内涵。曾因探索“电子游戏+文化符号”而广受赞誉的《原神》^[19]和《逆水寒》《江南百景图》《燕云十六声》等游戏,也普遍属于消费型游戏,以抽卡、氪金为主要玩法,盈利导向一定程度上压过了内容表达,存在玩家覆盖量少、海外输出不够,甚至“讨巧”地利用文化符号引导氪金等问题^[20]。更有甚者,日活跃用户数破亿的国产游戏《王者荣耀》曾将历史人物荆轲设置为女性形象,不仅有违“两创”的本意,还造成了深刻的文化误解。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中国游戏业连续多年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居全球第一,但其背后是少数资本对游戏市场近乎寡头式的垄断,在市场浮躁之风的影响下日益陷入思想文化停滞的状态^[21]。

正如有评价指出,这种做法“仅仅为了适应消费社会需求的传统再造,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传统文化核心内容和表征形式的割裂,并导致人们很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真正的认同感”^[2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真正的价值指向,不是复古主义与简单复刻,也不是全盘否定与历史虚无,而是在珍存和致敬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基础之上,遵循从“看到”到“理解”再到“认同”的逻辑,赋予其更具原创性和时代感的文化表达,激发其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展现和延续中华民族精神风骨。因此,在“两创”的价值导向下,“电子游戏+文化符号”绝不能沦为市场盈利驱动下文化符号的简单拼贴,而应当在文化领域承担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吐故纳新的厚重历史责任。

作为中国首款真正意义上的“3A”游戏,《悟空》是消费预期可控的买断制单机游戏(全价268元),也是明确主打文化表达的作品型游戏,与以往的消费型游戏各为泾渭,在经济效益、游戏娱乐与文化表达之间实现了可贵的平衡。新华社称之为“打开了解中国文化的新窗口”“为全球玩家带来一场视觉与文化的双重盛宴”^[23]。《中国文化报》记者撰文指出:“强烈的文化本位意识、深沉的传统文化情怀再一次显示出《黑神话:悟空》的中国风范与当代特征。”^[24]《悟空》制作人冯骥在接受央视专访时流露出真挚的文化情怀。他认为,《西游记》与孙悟空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之一,“好的传统文化与合适的载体结合就会 $1+1>2$ ”,梦想着“让全世界玩家能通过这个载体去深入了解中华文化”^[25]。《悟空》主创团队深入研究了各类文化符号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属性,并将其巧妙地融入游戏空间之中,依据游戏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游戏过程中使玩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建构起深层次的文化血脉关联。总之,

《悟空》的文化符号呈现高度契合“两创”的价值指向，其成功既为国产游戏的文化符号呈现树立了新标杆，也彰显出中国游戏产业走向世界的新力量。

三、《悟空》以文化符号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具体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符号，是一套囊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民族精神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广泛分布于语言、文学、艺术、哲学、习俗、服饰、环境、建筑等多个领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悟空》的设定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为背景，玩家扮演的主角“天命人”可以在火焰山、盘丝洞、小西天、花果山等作为“符号世界”的“西游世界”中进行探险、解谜、采集、制作、互动、战斗等活动，各类文化符号发挥着表征、互动与建构作用，为全球玩家塑造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东方世界。

（一）作为叙事构件的文化符号，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表征

叙事，是将一系列事件、人物、场景等叙事构件，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和时间线索，讲述一个故事的过程。电子游戏作为传统文化的新型载体，往往会将多样化的文化符号融入自身的游戏叙事中，直观地展现文化特色。《悟空》将各类文化符号穿插在自身的游戏叙事中，不是为了炫技而堆砌的文化奇观，而是让文化符号自身来传达其历史意义，由此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表征。

第一，语言文字符号。语言文字是表达、交流的基本载体，也是记忆传承、民族认同的关键符号。正如有学者所言：“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26]《悟空》将默认语言设定为简体中文，能够更准确、更深层次地传达游戏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提升玩家的文化沉浸感。在bilibili游戏社区，有网友评价：“谁懂在满是英文的游戏平台中，一句‘本游戏默认语言为简体中文’的震撼力。”更有网友风趣地指出：“以前是在‘Language’界面里找‘中文’选项，现在则轮到国外玩家在‘语言’界面找‘English’选项。”这种文化认同感不仅有助于提升玩家的游戏体验，也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游戏中的汉字字体以欧阳询风格行书为主，笔画凌厉，延续着中国书法粗细对比的调节、空间疏密的处理，以数字化的方式再现了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在敌方妖怪“虎先锋”出场时，屏幕上会浮现出取自颜真卿《清远道士诗》中的“虎”字。同时，游戏中不乏对古文经典的引用和解释，这些古文经典不仅使游戏的文化内涵更加厚重，也为玩家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会。例如，游戏中引用了春秋经典《左传》中的“善不可失，恶不可长”，《汉书·艺文志》中的“礼失而求诸野”，西汉名篇《大学·诚意》中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唐代诗人孟浩然《送席大》中的“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丰富了游戏的文化内涵。此外，游戏还运用“心急吃不着热面皮”“血化风，沙化雨，无主的猫鼠儿串一气”等陕北方言俚语，使得游戏语言充满地方特色，让玩家感受到中华语言文化的丰富多彩。

第二，时间符号。无论是传统文化的生成演化，还是今天文化事业的“两创”工作，都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进行的；中外文化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具体的、历史的时空环境差异。时间符号是记录和传承历史的重要工具，当社会历史事件转化成“时”“日”“节”等时间符号，能够使民族的过往历史和集体记忆在代际传承中得以复现，从而促进文化的历时性、共时性传播。在

李培鑫.《黑神话: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路径与启示——基于文化符号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63-76.

游戏的发售日选择上,主创团队特意将《悟空》定于农历七月十七发布,这一天在民间传说中正是齐天大圣的诞辰日^[27]。这一集体仪式的构建既体现出主创团队对大圣形象的崇敬与纪念,也加深了游戏与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密切关联。在游戏叙事和情节设计中,《悟空》融入了大量关于天干地支、十二时辰、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二十八星宿,乃至“一盏茶”“一炷香”“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等时间符号,这些时间符号是中国古人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观察自然和哲学思考的结晶,既展现出中国古代计时、惜时、敬时的智慧,也传递出中华民族厚重深邃的“大历史”意涵。

第三,空间符号。空间是承载社会关系情境的介质,具有特定的文化形塑功能。有学者认为:“任何空间都体现、包含并掩盖了社会关系——尽管事实上空间并非物,而是一系列物(物与产品)之间的关系。”^[28]空间中的建筑、环境、标识等符号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信息。《悟空》主创团队走遍中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和历史遗迹,使用全景3D扫描技术在游戏中高度还原了众多中式古建筑,如古朴庄重的太原晋祠,幽静神秘的隰县小西天,静谧灵动的大同悬空寺,庄严壮丽的重庆大足石刻。这些古建筑不仅是砖石木瓦的堆砌,展现出中国古代匠人的非凡创造力,还深刻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同时,游戏运用了笛子、古琴、琵琶、唢呐、大鼓等中国传统乐器铺展配乐,在潜移默化中烘托出极富东方韵味的空间场景,营造出一场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视听盛宴”。

此外,游戏还创造性地融入了说书、武术、舞狮、春联、灯笼等传统民俗符号,人参、灵芝、经络、调息、元气等传统医学符号^[29],锁子黄金甲、凤翅紫金冠、藕丝步云履等传统服饰符号,让玩家在游戏的每一处细节中都能领略到厚重而优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作为人文理念的文化符号,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2023年7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后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观看苏绣制作时指出:“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这个苏绣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功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心和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30]文化符号除了在“器物”层面展现为一系列传统文化的特色表征,也具备着深层次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等精神人文属性,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一位YouTube用户对《悟空》发表了如下评论:“这款游戏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它与西方世界观下的游戏完全不同,我被它完全迷住了。”玩家之所以会感觉《悟空》“与西方世界观下的游戏完全不同”,是因为这款游戏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亦可称之为秉承“很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

原著《西游记》的故事,围绕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而展开。《悟空》以二次创作的形式,既充分浸润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又灵活运用跨媒介叙事,推动静态的文字作品转化为动态的影像语言与游戏语言,极大地拓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意的可能,促成观众深入理解经典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中华民族精神气质。

首先,在文化主体性叙事中彰显民族自豪感。文化主体性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内容的独特性、文化表达的自主性以及文化创新的能动性^[31]。《悟空》打破了西方国家对3A游戏的市场垄断,以坚实的文化主体性立场讲述了更契合国内玩家精神文化需求的“中国故事”,大大激发了玩家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在Steam平台上,一类评论写道:“扮演龙裔、猎魔人、刺客、勇者等等都很好,但你说可以当猴哥?这种来自血脉、历史、文化和童年记忆的加成,是过去多少年

都不敢想象的”，“你曾在美国西部骑过马，在欧洲当过海盗，在他国战场上当过士兵，在埃及当过刺客，现在你终于可以回到你的家乡，做你自己的英雄了”。作为陪伴一代青年人成长的神话人物，孙悟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形象，是智慧、勇敢和正义的象征。他的名称“悟空”寓意着对世间万物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以及对自我修行和超越的追求，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在游戏流程中，玩家将以“天命人”这一孙悟空的化身形式，重新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炼，演绎“直面天命”与“突破天命”的处世哲学，直接体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玩家与孙悟空的跨时空对话与精神互通，就是中华民族在强烈文化惯性下得以“根脉不断”“魂魄不散”的最真实写照。

其次，在文本解构和重建中展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结合时代特色与青年人的接受习惯，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与重建，使传统文化不再是具有距离感的展演式表达，是“两创”的重要途径。《悟空》不仅对原著进行了重新诠释，而且在解构和重建中创造出更加紧张、复杂的情感纠葛和利益冲突，实现了对人物核心品质与道德观念的深度挖掘。例如，游戏叙事发端于孙悟空协助唐僧取经的任务圆满完成之后，孙悟空虽然被封为“斗战胜佛”，但他不愿卷入天庭的权力斗争，也无法适应天庭的陈规旧矩，而向往花果山返璞归真、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传递出中华民族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伦理精神：既有儒家对建功立业以至“平天下”的渴望，又有释家和佛家对摆脱世俗纷扰、实现内心宁静与自由的追求。此外，八戒的善良、蜘蛛精的真挚、牛魔王的义气、虎先锋的执着、红孩儿的不妥协、杨戬的反叛精神，都是主创团队在文本解构和重建中展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尝试。经典文化产品的内容创新必须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尚德”的人物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主创团队对现代社会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错误文化思潮的批判。

最后，在游戏交互中形塑玩家价值观。电子游戏之所以被称为“第九艺术”，是因为玩家可以与游戏进行交互体验，即游戏主角是玩家意识的化身，由玩家来实时扮演和操控。在学理上，这是一种在玩家与角色之间建立联系继而代入情感的符号学逻辑^[32]。《悟空》设计了多样化的交互方式和任务系统，如战斗、制药、解谜、探索等，令玩家能够在游戏中获得具身经验与“编码/解码”式的快感，以互动体验形塑玩家价值观。具有代表性的是，游戏中有散落于各地的蒲团，蒲团的位置需要玩家自行寻找，于蒲团上打坐，可以帮助角色恢复生命值，同时游戏界面会自动播放一段四周风景观光的图像，并伴以空灵淡雅的音乐，让玩家在极具禅意的氛围中静心安神、小憩片刻。在互动式参与中，构建起传统蒲团符号与静心安神的意义关联。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玩家所扮演的“天命人”在游戏中经历种种磨难而不断觉醒的过程，也是玩家不断磨炼心智、突破自我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亦是孙悟空自强不息、勇敢斗争的精神于每一个玩家身上的投射。《悟空》设定了不同的结局，玩家的每一次选择都会影响结局走向。倘若玩家急于通关而忽略了对游戏情节的深入探索，就无法取回“意见欲”以集齐“大圣六根”，由此会迎来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结局。这样的设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顺其自然、循序渐进的价值理念极为贴合。游戏中的“意”，正是“斗罢艰险又出发”之意，是“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33]之意，鼓励玩家享受游戏过程，切莫急功近利。

（三）作为交往媒介的文化符号，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意蕴

从文明类型学的理论视角看，中华文明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这也是其得以生生不息和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在世界

李培鑫.《黑神话: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路径与启示——基于文化符号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63-76.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的背景下,不断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文明形象,具有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交流互鉴等重大战略与现实意义。

文化符号是文明识别的重要标识。有学者认为,电子游戏的文化传承最终要上升到文明层面,指向对中国价值体系和人类文明形态的认同^[34]。也就是说,电子游戏的文化符号呈现,不仅对国内玩家群体来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而且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发挥着交往媒介的作用。以“游戏出海”促“文化出海”,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有效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放水平,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文明形象的积极尝试。

第一,以文化符号的民族性展现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文明形象。当前,全球3A游戏市场主要被美国、日本、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游戏公司所占据,理解海外游戏的故事背景与文化传统是国内玩家“被迫的必修课”。一些海外游戏有时会用文化符号来传达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如中国龙是“邪恶”的化身、丹凤眼被刻画为“眯眯眼”,这掩盖了中华文明的真实面貌。在民族性维度上,捷克的战马工作室曾开发了游戏《天国:拯救》,从自身祖先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一段中世纪历史,打破了以往的“大国中心主义”叙事模式,激发了玩家的文化认同。类似地,《悟空》提炼了大量的中国传统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传统节日、民间信仰等文化符号,将这些符号巧妙地融入游戏世界观、任务设计、道具设定中,形成了独具中华文明特质禀赋和文化印记的文化主体性叙事。在游戏的英文版本中,“妖怪”被翻译为“Yaoguai”而非“monster”,“龙”被翻译为“loong”而非“dragon”,就是为了避免民族性的文化符号陷入西方“话语陷阱”之中。《悟空》的文化符号呈现是中华民族在“电子游戏+文化符号”领域实现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肯定,能够促使海外玩家积极了解中华文化,以电子游戏为介质展现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文明形象。

第二,以文化符号的时代性展现中华民族锐意创新的文明形象。一种文化倘若离开了民族性,就将丧失自身的特质和“主格”;倘若离开了时代性,就会因复古守旧而丧失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要求文化工作者不断赋予传统文化以更具时代特征的新内涵,使其与现代文明形式相适应。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文化内容的更新,还包括文化表现形式的创新与表达方式的现代化。一方面,《悟空》对原著进行批判性改编,剔除了原著中反映封建糟粕文化的元素与符号。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其中积极正面的文化观念,如突破“天命”、勇于探索、不畏艰险等,以此激励和引导青少年玩家打破陈规、锐意进取。另一方面,《悟空》的文化符号呈现,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和照搬,而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游戏设计理念、数字技术支撑手段深度融合,实现两者兼顾的高品质文化体验与游戏体验。《悟空》在视觉效果上充分运用了水墨画风格、古代建筑风貌、传统服饰设计等中国传统美学符号,并结合3D渲染、空间计算、全景光追、虚幻引擎等现代游戏产业的高精尖技术,制作出逼真的环境场景与人物画面,为玩家带来既具古典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视觉盛宴,使玩家能够在更具真实感和沉浸感的氛围中领略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35]以《悟空》对文化符号的时代性呈现为微观案例,可以反映出中国游戏产业、计算机工业乃至中华民族整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锐意进取的文明风貌。

第三,以文化符号的世界性展现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文明形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采用强制性的方式向海外民众灌输或强加中华文化,而是在充分尊重世界文化多

样性和受众差异性的前提下，通过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来不断打磨更加优质的文化作品，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传播效果。文化传播是优质文化作品在海外传播时自然而然的结果。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海外玩家并不了解《悟空》复杂的传统文化背景知识，对于“中国首款 3A 大作”也没有情怀加成，他们只是希望在“中国好故事”中获得良好的游戏体验。正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悟空》秉持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编织出精美动人的游戏叙事，使玩家在欣赏和享受游戏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并认同其中的文化内涵。经过游戏的塑造，孙悟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符号形象，日益跨越文化边界，唤起世界各地玩家的情感共鸣。有国外网友评论：“在玩过《悟空》之后，我才知道创造悟空的不是鸟山明，而是吴承恩。”为了便于国外玩家接受，《悟空》以大量现代审美和科技元素支撑其文化符号呈现，也采用了西方常见的“英雄旅程”式游戏模式，使玩家自行拼凑悟空的英雄史诗。同时，将“灵”与“肉”的纠缠、理性与非理性的取舍、善与恶的斗争等西方角色扮演游戏常用的“浮士德难题”作为叙事桥段，规避了文化单一性的“自我陶醉”式创作，“玩家在游戏中获得的操作反馈和演算结果跨越了国家之间社会环境、历史进程和精神底色的鸿沟，唤起对人类共有的命运与情感的思考”^[36]。《悟空》展现出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文明形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文化力量。

四、《悟空》以文化符号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经验启示

作为主打文化表达的作品型游戏，《悟空》的文化符号呈现把握了游戏性与人文性、传统性与时代性、主体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动态张力，展现出独属于中国游戏创作者的文化抱负，将为电子游戏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更具普遍性的经验启示。

（一）游戏性与人文性的平衡：深度凝练文化符号以支撑电子游戏叙事

《悟空》能够跨地域、跨文化地被全球玩家所接受与喜爱，根本原因是把握了游戏性与人文性的动态平衡。电子游戏最核心的属性是“游戏性”，游戏性涵盖了游戏的可玩性、乐趣性、竞技性、交互性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构成了游戏作为商业文娱产品的本质特征，也是玩家在游戏中获得乐趣和满足感的关键。诚如有学者所言：“乐趣这一要素体现了游戏的本质。”^[37]如果忽视了游戏性的营造，游戏产品就无法吸引和留住玩家，将导致游戏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游戏的人文性就无从谈起。同时，人文性是游戏性的重要支撑，如果电子游戏具备丰富的文化背景、深刻的人文主题并能够唤起玩家的情感共鸣，就能增强玩家的游戏沉浸感，使玩家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倘若忽视了人文底蕴的支撑，游戏便会沦为“为了游戏而游戏”的文化消费产业。

我国文化创作者要掌握好游戏性与人文性的平衡，警惕一种“画皮”“换皮”“拼凑”式的游戏创作逻辑，即仅仅将文化符号作为游戏宣传与营销的工具。应当在不违背电子游戏之游戏性的前提下，合理调用本土文化符号以支撑电子游戏叙事，由“产品思维”走向“作品思维”，提高电子游戏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从汉语书法到传统建筑，从民风民俗到神话传说，从血缘族系到家国认同，我国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中蕴含着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传统文化，构成了文化符号的“质料”与“信息源”。文化符号是文化创作者从大量的传统文化信息中，通过特定的标准化指标加以识别，并整理加工、编码赋义，结合主流价值观进行话语再阐释的结果。这意味着只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座“文化富矿”挖深、挖好,凝练出能够展现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才能为“两创”注入源头活水,为游戏叙事提供持续不断的文化滋养。同时,有必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框架下,结合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创作要求,赋予文化符号以新的时代元素,对文化符号进行新设计、再构思与再阐释,使其更加简洁直观、新颖独特、实用有效以及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基于此,再将文化符号巧妙地融入剧情设计、角色塑造、场景搭建等游戏叙事中,才能打造极具历史感、人文感的文化故事,为玩家带来更优质的游戏体验。这也正是《悟空》作为一部文化作品而非纯粹游戏商品的深远意义所在。

（二）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创新电子游戏对文化符号的多元呈现方式

“两创”要求我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文化动态发展的框架中加以理解,即传统文化从来不是“静态的遗产”或“陈旧的记忆”,而是推动今日社会进步、促进文化创新创造的重要源泉。关键是,如何通过科学完善的文化传承手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活起来、火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38]当前,人工智能、全息投影、5G技术、元宇宙、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日新月异,支撑着“电子游戏+文化符号”的共生图景。在此背景下,一个亟需审思的问题是:如何在“内容为王”的原则下,使迅猛发展的技术服务于文化符号的深度凝练与真实呈现,而非对文化符号的跨媒介复制或商业化推广。为此,我国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与《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等政策谋划中,积极引导文化符号与现代技术元素有机结合。

《悟空》将技术视为内容表达的辅助性手段,在技术与内容的共生中构建了沉浸式文化符号体验空间。有学者总结,《悟空》的成功得益于发达国家研发的虚幻引擎技术和显卡算力、中国制作团队的长期主义和巨量资源投入以及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精妙绝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三者合一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灵韵”在数字时代被忠实地记录和广泛地传播^[39]。这启示文化创作者,需要选择合适的技术形式以支撑不同文化符号的呈现,依靠技术进步赋予文化符号新的面貌,打造一批文化底蕴深、认同度高、传播力强的文化符号。《悟空》尝试在游戏中融入音乐、电影、动漫、定格动画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将文字、图像、声音、影像等融合在一起,创新了电子游戏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多元表现形式,即“电子游戏+X+文化符号”。例如,在第一章节“天庭”的打斗场景,游戏以“影游融合”的方式,依靠精心打磨的剧情、镜头语言及画面构图,使玩家在体验游戏世界的同时,仿佛在观赏一部精彩绝伦的电影,充分调动了玩家的感官参与。其中,云雾缭绕的仙境氛围,庄严雄伟的凌霄宝殿,孙悟空挥舞金箍棒的飒爽英姿,这一系列精美的文化符号给玩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传统文化变得极为生动立体、可知可感,也促使玩家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这些文化符号的寓意。

（三）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以文化符号搭建共生性的游戏文化生命体

作为共同体意识的黏合剂,文化符号是在人的社会交往中产生的,具有传播价值观念、塑造社会认同、构建文化身份等意识形态功能。近年来,西方电子游戏中的文化符号愈发受到青年人的集体追捧,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内嵌其中,通过游戏这一媒介广泛传播给受众。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面对文化产业的健康蓬勃发展,我们要做的绝非拒斥

电子游戏，而是把握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充分发挥文化符号的意识形态功能，将更优质的文化符号融入电子游戏叙事。

从主体性的角度讲，《悟空》的文化符号传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特色表征、精神内核与文明意蕴，激发了玩家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相关部门和文化创作者要加快构建“电子游戏+文化符号”的培育体系，建立健全电子游戏内容审核机制，确保游戏内容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在电子游戏新媒介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使电子游戏文化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文化总是在交流中发展，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并行不悖。《悟空》的文化符号呈现，既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反映出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悟空》对孙悟空勇敢斗争形象的呈现，满足了西方玩家群体对英雄主义叙事的期待。在游戏中“曲渡紫鸳”这一章节，《悟空》试图跨越国别、地域、民族等文化界限，加入对爱情、自由等人文理念的追问，由此触动了无数海外玩家的心弦。人始终处于日常社会关系中，文化符号的意识形态功能必须落实到具身化的实践行动，即从符号世界走向生活世界。在玩过游戏后，海内外玩家有人开始主动阅读《西游记》，有人用各种乐器演奏游戏片尾曲《云宫迅音》，有人不远万里奔赴山西试图了解更详细的游戏背景知识^[40]。在各大游戏网站与玩家社区里，海内外玩家围绕《悟空》的各种文化符号进行着津津有味的探讨，呈现出人与人共生、人与游戏共生、游戏与文化共生的崭新气象。这深刻地展现出：中华民族能够以自身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为全世界的文化繁荣与人类文明的和合共生作出巨大贡献；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文化表达实践，可以让生活更美好，让世界更包容。

五、结语

《悟空》的最后一个章节题为“未竟”，所谓“未竟”，是指尚未结束。宋代诗人何梦桂有“怀古意未竟，伤今有余悲”的诗句。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也吟诵到“歌未竟，东方白”，意指就像东方即将迎来日出一样，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将更加辉煌。在这一章节中，身份神秘的老猴子带领玩家扮演的天命人泛舟而行，踏上寻觅大圣残躯之路，背景音乐逐渐从空灵静谧到慷慨激昂，暗示着未竟的事业和持续的奋斗。《悟空》的故事未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事业也未竟。

《悟空》孵化出传统文化表达的新模式，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开辟了一条稳健而崭新的道路，亦为后续的游戏文化产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范本。未竟之路，行则将至。面对数智技术崛起、中西文化碰撞、多元思潮交织的历史变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等改革部署，通过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两创”活力。我们应当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窗口期，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导向，创新运用新思路和新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更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更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 年 6 月 12 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

李培鑫.《黑神话: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路径与启示——基于文化符号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63-76.

- [2]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N].人民日报,2023-10-09(1).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2.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人民日报,2024-10-29(1).
- [5] 马睿珊.深挖文化底蕴 定制文旅产品 “跟着悟空游山西”吸引海内外游客[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09-04(12).
- [6] 2024年8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EB/OL].(2024-08-21)[2024-09-25].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zcjd/202408/t20240821_11477444.shtml.
- [7] 李闯.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下文化、技术与产业的共生演进——以《黑神话:悟空》为案例[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83-95.
- [8] 林升栋,李悦.《西游记》的分身——论《黑神话:悟空》的文化自信与国际传播[J/OL].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5[2024-12-0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285.C.20241104.0845.002.html>.
- [9] 许丹荔,王炳涵.游戏作为媒介赋能中华文化创新的实践探索——以《黑神话:悟空》为例[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6):114-123.
- [10] 曹书乐,石闵龙,何威.玩法为器,文化为魂:《黑神话:悟空》的国际传播与游戏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创新机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19-131+171-172.
- [11] 耿弘明.如何评估《黑神话:悟空》的民族性?——“魂系”游戏与“虚幻5”引擎引发的思考[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6):145-150.
- [1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5-46.
- [13]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5.
- [14] 常轶军.增进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J].探索,2024(3):14-23.
- [15]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7.
- [16] 郑祥福.西方文化扩张影响下的中国文化应对策略[J].天津社会科学,2019(4):50-54.
- [1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3-08-28)[2024-09-28].<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3/0908/MAIN1694151810549M3LV0UWOAV.pdf>.
- [18] 胡钰,朱戈奇.网络游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J].南京社会科学,2022(7):155-162.
- [19] 朱丹红,武艳.从网络游戏《原神》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化对外传播[J].出版发行研究,2023(11):73-78.
- [20] 郭毅,董鸣柯.国产游戏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现状、困境与对策[J].出版发行研究,2023(1):67-73+66.
- [21] 邓剑.中国当代游戏史的思想谱系:从本土现代化到资本与市场逻辑[J].探索与争鸣,2022(2):163-176+180.

- [22] 曾一果, 梁思璇. 再造传统: Z 世代的“新国潮”传播及其文化价值重构 [J]. 编辑之友, 2024 (9): 22-30.
- [23] 汤洁峰, 孙丁, 杨天沐. “悟空”出海引发热潮 海外人士感受中国文化多元精彩 [N]. 新华每日电讯, 2024-08-26 (5).
- [24] 罗群. 《黑神话: 悟空》: 是游戏, 也不是游戏 [N]. 中国文化报, 2024-11-01 (4).
- [25] 央视网. [中国新闻] 专访《黑神话: 悟空》制作人冯骥 好的传统文化与合适的载体结合就会 1+1 > 2 [EB/OL]. (2024-10-01) [2024-10-15]. <https://tv.cctv.com/2024/10/01/VIDEESMZpVa050gg6LrJW4iM241001.shtml>.
- [2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26.
- [27] 王枝忠, 苗健青, 王益民. 顺昌大圣信仰与《西游记》[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 68-71.
- [28]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M]. 刘怀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124.
- [29] 徐姗姗, 甄橙. 西游记与黑神话: 悟空——中医药文化创新性传承与文化自信构建 [J]. 中国医学人文, 2024 (11): 41-44.
- [30] 本报评论部.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两个结合”的时代意义 [N]. 人民日报, 2023-07-27 (5).
- [31] 田鹏颖. 建设文化主体性的真谛在于创造新的历史 [J]. 哲学分析, 2024 (3): 146-151.
- [32] 何威, 李玥. 符号、知识与观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游戏中的创新转化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 (1): 232-240.
- [33] 张戢, 詹丽华, 赵路, 等. 悟空破石记 [N]. 浙江日报, 2024-08-21 (3).
- [34] 赵鑫, 杨义成. 让游戏产业成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文明容器的游戏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综述 [N]. 深圳特区报, 2024-10-22 (7).
- [35]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4: 106.
- [36] 刘汉波. 《黑神话: 悟空》的“后西游叙事”、遍历空间实践与跨文化传播 [J/OL]. 云南社会科学, 2024 (6): 175-185 [2024-12-0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3.1001.C.20241129.1412.038.html>.
- [37] 约翰·赫伊津哈. 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 [M]. 傅存良,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
- [3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161.
- [39] 邓建国. “不可传达”的传达: 元宇宙技术与中国文化灵韵——以《黑神话: 悟空》为例 [J]. 文化艺术研究, 2024 (5): 11-18+111.
- [40] 夏瑾. 《黑神话: 悟空》出圈, 山西如何接住这“泼天的富贵” [N]. 中国青年报, 2024-08-30 (7).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卢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 核心意涵、实践进路及原创性贡献

魏崇辉 李垠辰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集中阐释了作为红线的主权和领土、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安全生产、18 亿亩耕地、生态保护等的核心意涵。维护安全是划定红线与守住底线的基本指向，维护安全就是划定红线与守住底线。其中，国土安全红线保障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政治安全红线保障社会稳定，生产安全红线肃正社会风气，粮食安全红线支撑独立自主，生态安全红线兜底可持续发展。中国为关于红线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了独特政治智慧，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划定红线有助于稳定国际局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划定红线为后发国家提供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凝结了“两个结合”的独特政治智慧，展现了守正创新的基本方法论。新时代新征程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必须坚持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生产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一体建设。

关键词：国家安全；红线；底线；“两个结合”；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1-0077-13

DOI：10.13946/j.cnki.jcqis.2025.01.007

作者简介：魏崇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垠辰，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 类）重点项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课题基金项目）“‘中国精神’的历史渊源及其新时代新形态研究”（23JDTCA058）

引用格式：魏崇辉，李垠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实践进路及原创性贡献[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77-89．

一、问题的提出

底线和红线都代表着一种限制或警示，但在具体含义和应用上有所不同。底线侧重于强调主体所能接受的最低标准，突出自我警示；而红线则多出一层越过此线将引起严重后果的意味，侧重于强调提醒他人。划定红线与守住底线都是为了维护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内政外交各种场合多次强调需要坚守红线，形成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囊括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呈现出国内与国际的统一。自 2013 年“生态红线”论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不断丰富红线的内涵与外延。其二，红线与底线、安全相交织与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反映了我们党对当前事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思考，折射出我们党一如既往的政治坚持和追求，是对现实诉求与挑战的积极理论回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经历了传统型国家安全体系、过渡性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型国家安全体系三个阶段”^[1]。1949 年至 1978 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红线主要是政权稳定、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对外为主，内外兼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为红线注入了政治定力、政治纪律、安全生产、珍惜和保护耕地、生态保护等新内涵。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红线进行了全面系统、发展创新的论述。2024 年 11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利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指出：“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 4 条红线，不容挑战。”^[2]2022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美国不能也不应逾越的红线。”^[3]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涉华政策演讲，《人民日报》发表的相关评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余地，没有任何退让空间。”^[4]这诠释了红线意味着不可退让。截至 2024 年 12 月 1 日，以“红线”为篇名收录于中国知网的文献共计 6 453 条，其中期刊 3 164 条。基本的研究方向有：一是关于各种红线内涵意蕴、面临挑战、实践路径的研究；二是基于特定视角、具体领域的红线研究。截至 2024 年 12 月 1 日，以“底线”为篇名收录于中国知网的文献共计 10 703 条，其中期刊 5 119 条。基本的研究方向有：一是关于我们党政治话语中底线的内涵和对象的研究；二是关于守住底线的逻辑研究。

“红线”意为红色警戒线，是不能逾越、不可接受、需要远离的禁区。划定红线，不仅在于从客观上描述该事件的最低限度，更主要的目的是阐明该事件的重要性。红线代表着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中最为核心的政治坚持。红线研究要从现实关切的问题出发，厘清哪些领域被划了红线以及为何是这些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5]红线研究要基于我们党的宗旨展开，从我们党的执政逻辑和政治追求出发，剖析划定的数条红线中所蕴含的政治哲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6]党的执政根基在人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划定红线、守住底线，也是以民心所向为根本。为此，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历史唯

魏崇辉, 李垠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实践进路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77-89.

物主义的眼光分析我们党划定红线背后的逻辑。提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 探究其中的基本逻辑, 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红线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底线思维, 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上, 始终注意旗帜鲜明划定红线, 以此警醒一些国家和群体, 让他们知悉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关切, 管控好自身行为不越线不玩火。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不仅推动相应领域取得长足进步, 而且显示出我们党治国理政核心追求的变与不变。

（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之红线

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对其管辖的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利, 是一个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 丧失了主权便不能称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 领土完整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尊严的体现。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都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就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划定红线。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7]《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网站刊载美联社报道, 援引此句并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国家主权划下了不可逾越的红线”^[8]。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强调: “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 都是对底线的触碰, 都是绝不能允许的。”^[9]在台湾问题上, 我们党以领导人会晤讲话、发言人答记者问、官方媒体发表文章等形式反复强调这是一根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红线。事实上, 我们党维护这根红线不容挑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比如,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联合利剑系列军事演习相继开展, 划定黄岩岛的领海基线等, 均彰显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有力维护。

（二）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之红线

从词源学角度看, “定力”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指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与执着信念。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时代发展新实践, 赋予“定力”新内涵, 提出了“政治定力”“战略定力”“改革定力”“前进定力”“耐心定力”等系列重要话语, 在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法治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关于政治定力的系列重要论述^[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政治上, “要增强政治定力, 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经济上, “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 文化上, “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他同时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 “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没有坚守法治的定力, 面对权势、金钱、人情、关系, 是抵不住诱惑、抗不住干

扰的”。对于生态环境保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解决环境问题要迈出更大步伐，也要有耐心定力”。为了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要对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环境作出清醒认识和准确判断，必须高度警觉，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对于外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党的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主要看干部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10]。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划定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红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随着形势的变化与认识的深化，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红线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丰富。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的”，“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11]。对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2]

（三）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之红线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讲政治不仅是宏观意义上全党的鲜明特征，亦是需要落实到微观层面每个党员的自觉行为。讲政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讲政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触碰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红线。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具体来说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针对“七个有之”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根源所在，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多次为全党勾勒划定政治红线，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13]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越过了就要严肃追究其政治责任。”^[14]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人不得越过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红线，越过了就是大忌，就要付出代价。”^[14]²⁴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要求“不断锤炼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坚守政治红线、纪律高压线、廉洁底线”^[15]。经过全面从严治党，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红线在全党充分彰显，全党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党的组织力、战斗力、凝聚力显著提升，在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时有了更大底气。

（三）安全生产之红线

生产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我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后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强劲的生产端。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是为了创造美好生活，但倘若生产中频繁出现安全事故，就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个体而言，生命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就社会而言，频发的生产事故易激起劳资冲突，影响社会大局稳定。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狠抓安全生产，划定并多次强调安全生产的红线。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16]2015 年，习近平

魏崇辉, 李垠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实践进路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77-89.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确保安全生产应该作为发展的一条红线。我说过,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观念,必须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起来。”^[17]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指示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的观念,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关系,坚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18],“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19]。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安全生产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和任务要求,为我国安全生产领域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四) 18 亿亩耕地之红线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0]粮食是维持人生理和生产活动的必要前提。我国是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需要巨量粮食资源。然而,我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却并非农业强国。我国粮食进口量较大,与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在当今动荡的国际局势下,粮食安全必须建立在本国耕地充足的基础上。

20 世纪末,各地的“开发区热”导致大量耕地被占用,引起人们对于耕地不足的担忧。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提出 18 亿亩耕地红线。18 亿亩是根据我国人口及工业用粮计算定下的指标,是一个约束性的底线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复强调耕地保护的重要性,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 2013 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大家立了军令状,必须做到,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17] 198}在 2020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防止违法改变用途,对违法占用耕地‘零容忍’,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21]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最新的国土调查结果看,全国耕地面积比十年前减少了一亿多亩。如果任由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还怎么能保得住?十四亿多人饭碗还怎么能端得牢?”^{[21] 332}可见,红线并非只是一个兜底性的条件,它警示人们,红线不仅不可触碰,且必须远离。18 亿亩红线不仅从技术上说明这是不容突破的底线,亦从政治上说明耕地保护本身的极端重要性。

(五) 生态保护之红线

自然地理条件是人们进行生产、创造历史的前提和基础。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产出优质的生态产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反之,倘若在生产中不注意环境保护,虽则短时间内能加快生产速度,但是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破坏的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大幅加速,带来国民经济水平的飞跃,同时也带来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健康状况面临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提出“生态红线”的概念。生态保护红线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证生态安全的底线,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生态红线的观念一定要牢固树立起来。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

可，不然不仅生态环境恶化的总态势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而且我们设想的其他生态环境发展目标也难以实现。”^[17]¹⁸¹2018 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对突破三条红线、仍然沿用粗放增长模式、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绝对不能再干，绝对不允许再干。”^[22]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刊文《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中再次强调要坚守生态保护红线^[23]。习近平总书记 10 多年来先后 20 余次强调生态保护这根红线，大力推动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筑就了强有力的防线。

三、维护安全：划定红线与守住底线的基本指向

红线是相对于底线而言的，底线与红线是安全的不同界面。划定红线、守住底线是一体两面，划定红线、守住底线都是为了维护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对外向美方划定 4 条红线，涉及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等领域。这些领域都关涉我国核心利益与国家安全。维护安全就是划定红线与守住底线。安全是底线，也是逾越必将遭受惩罚的红线。

（一）维护国土安全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直接对应的是我国的国土安全。国土安全并非仅指狭义的防卫领土不受其他国家侵犯，而是“兼顾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聚焦与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相关的安全问题”^[24]。国土安全不仅包括了国家统一，免遭外部势力武装侵略领土，也包括了国家在领土范围内自由地选择发展道路、在领海范围内自由开采海洋资源等主权不受侵犯。国土安全是关乎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从政治角度看，如果国土安全得不到保护，政府将不能有效维系统治，国家政权和所实行制度将产生动摇。从经济角度看，国土安全直接涉及自然资源、人口资源的归属，稳定的国土环境能够给发展提供安全的外部条件，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从社会角度看，国土安全是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的基本保障。国土安全如得不到保障，不仅会直接损害人民生命安全，更会导致人民对政府失去信任。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土安全是显示综合国力和彰显国家尊严的重要依据，是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前提，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

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国土安全的重大课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台湾问题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经济意义。一些势力叫嚣：“台湾地区作为封锁中国第一岛链的中枢，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升高。”^[25]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客观上使得两岸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爆发冲突的潜在风险为长久安全埋下隐患。同时，台湾问题还可能会引起国际冲突，危及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经济上，台湾问题限制了两岸经济合作，影响了两岸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长此以往也必将影响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贸易的发展。地缘上，台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日益上升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因此，无论从国家统一的政治经济意义还是从国土安全的现实意义出发，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一以贯之的红线。

（二）维护政治安全

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居于首要地位。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26]。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要

魏崇辉, 李垠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实践进路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77-89.

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 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5] 中国共产党政治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在于, 政权安全是核心, 制度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支撑, 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先导^[27]。

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可以从内外两个部分入手。对内, 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关键。特别是党的基层干部, 他们工作在党和群众接触的第一线, 直接代表党的形象。“蝇贪蚁腐”严重侵蚀群众切身利益, 啃食群众获得感, 损害群众对党的信任, 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对外, 境外敌对势力策划的种种活动, 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 其根本目的都直指破坏我国政治安全。任何意图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让“红色江山”变色的“颜色革命”行径, 都是我们不能容忍的红线。

（三）维护生产安全

生产安全即生产顺利进行未发生事故, 参与生产的人员、设备等安全得到保障。生产是社会运转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覆盖全社会各行各业。生产事故折射出的是安全生产意识的缺失和监管的缺席。我们党之所以将生产安全作为红线屡次强调, 原因不仅是人的生命权是最基本的权利, 还因生产事故牵涉众多, 生产过程涉及劳资矛盾, 安全监督涉及政府职责。

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强安全生产, 全国安全生产呈现总体向好的态势。但是, 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不容忽视, 事故时有发生。比如, 2013 年, 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露爆炸特别重大事故, 造成 62 人死亡、136 人受伤^[28]; 2015 年, 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造成 165 人死亡、8 人失踪、798 人受伤^[29]; 2019 年, 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造成 78 人死亡、76 人重伤^[30]。潜在的社会负面影响需要引起充分重视。有学者统计, 我国近 20 年重特大化工生产事故中, 违规生产是重特大事故发生的最大诱因, 共 18 起, 占总数的 43.9%^[3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做好生产安全工作, 必须深刻理解、科学把握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始终强化红线意识, 坚决杜绝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四）维护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指“在国家或地区政府的组织下人们食物需求的满足状况（充足供应），以及维持这种状况的能力（供应韧性）”^[32]。粮食安全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民以食为天, 粮食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纵观人类文明史, “以粮食为核心的社会现象与重大事件, 都与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动荡与政权变迁如影随形”^[33]。为此,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国际环境动荡加剧及全球气候异常现象对国际粮食供应链稳定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进而可能从外部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因此, 我国必须保证粮食安全自给自足。

2006 年,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 18 亿亩耕地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 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我国自提出 18 亿亩耕地红线以来已有近 20 年, 我们党始终将其作为治国理政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来推进。2024 年 6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正式施行。截至 2022 年底, 全国共有耕地 19.14 亿亩^[34]; 2021

年以来,全国耕地总量增加 1 758 万亩,连续 3 年实现净增加,遏制了耕地持续多年减少的态势^[35],我国粮食自给自足水平大幅提升。2024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14 130 亿斤,比上年增加 221.8 亿斤,首次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下一步,要深化粮食购销、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物资储备管理机制改革、完善粮食稳价调控机制、健全粮食产后节约减损长效机制,进一步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红线^[36]。

（五）维护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蕴含多维度内涵,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和稳定性;二是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三是国家应对生态问题能力^[37]。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系统提供了人类社会生存所必需的水、空气、土壤及各种自然资源。生态安全是其他安全的重要载体与基础,事关大局,对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阐述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明确指出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3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但生态安全问题形势严峻,成为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大事。2012 年,32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比例仅为 40.9%;198 个城市的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一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高达 57.3%;全国共发生 542 起突发环境事件等^[39]。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2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_{2.5})平均浓度为 29 微克/立方米,实现近 10 年来连续下降;劣 V 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0.7%;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113 起^[40],相较于 2012 年大幅改善。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紧绷生态安全之弦,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守牢生态安全的红线。

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明确自己的红线,有效管控分歧,防止风险升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发展中明确安全红线,创造了许多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凝结了“两个结合”的独特政治智慧,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方案。

（一）中国为关于红线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了独特政治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内涵丰富深刻,凝结着“两个结合”的独特政治智慧,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划定红线、守住底线、维护安全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为我们划定红线、守住底线、维护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是“两个结合”的又一光辉典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彰显鲜明的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是坚持“两个结合”、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坚持守正创新,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比如,红线的划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应有之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我们党的执政逻辑和政治

追求出发来解析划定数条红线所蕴含的政治哲理, 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第二, 守正创新是中国划定红线、守住底线、维护安全的基本方法论。为了维护安全, 需要划定红线、守住底线。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自己而言, 守的就是底线; 对他人来说, 划的是红线。守住底线红线, 要求不犯方向性、颠覆性错误, 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动摇。但划定红线、守住底线, 并不代表一成不变, 而是要在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中找到最佳平衡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搞改革, 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 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 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 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41]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 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在划定的红线内大胆改革。一方面, 创新需要划定红线。创新不代表可以没有底线, 不代表可以触碰红线。另一方面, 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守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 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 该改的坚决改, 不该改的不改。”^[11]

(二)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划定红线有助于稳定国际局势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 加之主观上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大国地位体现在多个方面: 经济上, 中国拥有完整的经济体系, 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重要的一环; 政治上,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 地缘上, 中国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力量, 对地区稳定起着压舱石作用。我国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时明确划定红线, 有利于防止风险升级。特别是对特朗普再次上台可能带来的风险, 中方给美方划定的 4 条红线更是起着稳定局势的作用。

第一, 作为地区大国, 划定“台湾问题”红线稳定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安全局势。台湾问题根源在于美国欲借机从经济、军事、舆论等方面遏制、打压中国。长期以来, 美西方不断评估、预测、试探中国处置台湾问题的底线, 研判干涉和介入空间, 企图为对华极限施压制造借口^[42]。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研判台海形势, 做出正确的决策部署, 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特别是台湾问题红线的划定, 坚决维护了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 既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扎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也有利于保障地区安全, 在世界安全局势极不稳定的当下, 更彰显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第二, 作为人口大国, 划定“民主人权”红线稳定意识形态舆论局势。中国是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 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民主人权道路。然而, 美西方不遗余力地贬低、抹黑中国的民主人权实践。首先, 美西方标榜“西式民主”是唯一合法的民主形式, 给其他任何与“西式民主”有差异的民主制度贴上“威权”的标签。其次, 对中国的民主人权状况指手画脚, 打着涉港、涉台、涉疆、涉藏等议题的旗号, 屡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此,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主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人权发展道路。中国划定“民主人权”的红线, 既表明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信, 又体现出无意与美西方在此问题上相互攻讦的姿态, 致力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意识形态氛围。

第三，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划定“道路制度”红线稳定国际政治局势。美西方对中国的无端抨击指责由来已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此类声音便不绝于耳。冷战结束后，美西方依然不时渲染所谓“社会主义威胁论”。其一，这是美国冷战思维的惯性所致。拜登作为冷战时代的政客，其政府的各种政策充分说明这一点。其二，这是美方肆意夸大所谓“文明冲突”的结果。在美方有关政治人物的偏见中，“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政治实践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基于美国资本伦理和霸权主义的‘美国领导世界’理念形成对抗”^[4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44]中国主动划定“道路制度”的红线，旨在正告美西方，我国无意强行推销“中国模式”，美西方也不要试图改变中国道路制度，走向“新冷战”时代，这有益于国际政治局势稳定。

第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划定“发展权利”红线稳定全球经济局势。2016 年，特朗普上台后，肆意挥舞单边制裁的大棒，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2020 年以来，拜登非但没有扭转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反而加大了对中国的打压。如今，特朗普再次上台。他在 2024 年的竞选声称“将采取更为强硬的经济政策，包括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额外关税，以及采取更为激烈的贸易对抗措施”^[45]。美西方以环保主义、国家安全、反倾销等为借口，针对中国施行各种制裁，其实质就是打压中国的发展权利。中国划定的“发展权利”红线，不仅为自己而划，也为全球经济而划。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极大的市场潜力、强劲的创新能力和稳定的产业链，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稳定和推动力量。

（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划定红线为后发国家提供经验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能树立并坚持底线思维，牢牢守住经济社会发展的红线，这是平衡发展与稳定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红线观”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的结晶，也为广大后发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一，“政治安全”红线保障社会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确立一套可以长期稳定运行的政治制度，以政治安全来保障社会稳定，是实现国家发展的首要条件。然而，在西方所谓民主化思潮的蛊惑下，有的发展中国家不顾自身国情，盲目照搬西式民主制度，导致国家治理低效甚至失败。由于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不同，所谓西式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反而引发了政党派别斗争，造成社会撕裂。正如有研究指出，美国的民主输出不仅对美国自身，而且对输出对象国、对世界秩序和大国关系都造成了负面影响^[46]。这充分说明，后发国家必须自觉绷紧“政治安全”的红线，方能维护政治环境稳定，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二，“生产安全”红线肃正社会风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绝不仅是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的崛起，同时还有其精神力量的崛起。一定意义上，普遍的生产事故从深层次反映出的是社会逐利而对生命的漠视，这实质上就是人的物化，社会矛盾可能由此而起，价值观扭曲可能因之而来。在一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完善滞后于社会发展，安全风险广泛分布于人们生产生活中。这反证中国划定“安全生产”红线的重要意义。“人命关天”红线的划定，有利于推动建立健全安全

魏崇辉, 李垠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实践进路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77-89.

生产监督管理制度,使人们在执行该制度时潜移默化地树立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促进塑造良好和谐的社会风气。

第三,“粮食安全”红线支撑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1] 330}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划定了粮食安全的红线,旨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上设置约束性的底线,以确保基本的自给自足。没有粮食的自给自足,没有粮食安全,就没有国家的独立自主。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对历史大势的科学审视、对西方发展教训的深刻反思、对我们党粮食安全工作经验的充分吸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只有守住粮食安全的红线,我们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的主动权。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

第四,“生态安全”红线兜底可持续发展。“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4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造性地划定了生态安全红线,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安全红线的重要论述凝结着对发展人类文明、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深刻洞见,是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深刻批判与本质超越。

五、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对国际与国内形势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着重阐释了主权和领土、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安全生产、18 亿亩耕地、生态保护等作为红线的核心要义。新时代新征程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必须坚持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生产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一体建设。红线是对风险的警戒与管控。当今世界,各种风险挑战叠加。我们对红线的认识必将随着风险挑战的变化而不断做出调整。只要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定可以科学地划定红线、守住底线、维护安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 [1] 王秉. 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历程、内涵与路径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 (6): 1-11.
-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利马举行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4-11-18 (1).
- [3] 王毅就中美元首会晤向媒体介绍情况并答问 [N]. 人民日报, 2022-11-15 (2).
- [4] 钟声. 发展中美关系, 美国必须放下遏制打压的执念 [N]. 人民日报, 2022-05-28 (3).
-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6]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5.
- [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7 年 8 月 1 日) [N]. 人民日报, 2017-08-02 (2).
- [8] 外媒热议习近平讲话: 中国军队现代化速度超越西方想象 [EB/OL]. (2017-08-02) [2024-12-02]. <http://>

world.people.com.cn/n1/2017/0802/c1002-29445591.html.

- [9] 习近平.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 [N]. 人民日报, 2017-07-02 (2).
- [10] 习近平. 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 [J]. 求是, 2021 (21): 4-15.
- [1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4-10-30 (1).
- [12] 习近平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定战略自信 勇于担当作为 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蔡奇出席 丁薛祥主持 [N]. 人民日报, 2024-12-03 (1).
- [13] 习近平.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 [N]. 人民日报, 2014-10-09 (2).
- [14]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6: 23.
- [15] 李希.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2023年1月9日) [N]. 人民日报, 2023-02-24 (3).
- [16] 习近平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部署 李克强要求, 扎扎实实开展好安全生产大检查, 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 健全各项制度, 切实维护人民生命安全 [N]. 人民日报, 2013-06-08 (1).
- [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141.
- [18] 习近平对加强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守土有责敢于担当 完善体制严格监管 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N]. 人民日报, 2016-07-21 (1).
- [19] 习近平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N]. 人民日报, 2016-11-01 (1).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1.
- [21]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306.
- [22]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1.
- [23] 习近平.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J]. 求是, 2024 (1): 4-9.
- [24] 王召东. 多维分析视角下的“国土安全”概念: 内涵与外延 [J]. 国家安全研究, 2024 (3): 5-26+147.
- [25] 汪曙申. 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前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86-94.
- [26]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李克强栗战书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8-04-18 (1).
- [27] 骆郁廷, 刘鸿畅. 中国共产党政治安全观: 历史演进、核心要义与实践进路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4 (3): 24-35+157-158.
- [28] 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的通报 [EB/OL]. (2014-01-26) [2024-12-02]. https://www.gov.cn/gzdt/2014-01/26/content_2576399.htm.
- [29] 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EB/OL]. (2016-02-05) [2024-12-02]. https://www.gov.cn/xinwen/2016-02/05/content_5039785.htm.

魏崇辉, 李垠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实践进路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77-89.

- [30] 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EB/OL]. (2019-11-15) [2024-12-02]. https://www.gov.cn/xinwen/2019-11/15/content_5452468.htm.
- [31] 李敏副, 朱柏坚, 湛庭苇, 等. 近 20 年重特大化工生产事故统计分析 [J/OL].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1-8 [2024-11-25]. <https://doi.org/10.16265/j.cnki.issn1003-3033.2024.11.0437>.
- [32] 张应良, 徐亚东.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战略应对 [J]. 中州学刊, 2023 (3): 52-61.
- [33] 张晓晶, 曲永义, 林桂军, 等. 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选择 [J]. 国际经济评论, 2023 (4): 9-43+4.
- [34] 李晓晴, 蔡华伟. 去年全国耕地净增加约 130 万亩 [N]. 人民日报, 2023-04-17 (1).
- [35] 常钦. 全国耕地总量 2021 年以来连续 3 年净增加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资源支撑 [N]. 人民日报, 2024-09-20 (2).
- [36]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N]. 光明日报, 2024-12-27 (2).
- [37] 陈亮, 杨攀. 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生态安全及其法治完善 [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2 (5): 98-112.
- [3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 年 10 月 18 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39] 孙秀艳. 《2012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环境形势严峻依旧 [N]. 人民日报, 2013-06-05 (4).
- [40] 王比学. 2022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显示 生态环境质量保持改善态势 [N]. 人民日报, 2023-04-25 (4).
- [41]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2013 年 11 月 15 日) [N]. 人民日报, 2013-11-16 (1).
- [42] 李恒, 周生龙. 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内容、认知与影响——以 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为背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17-135.
- [43] 李帅.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话语策略分析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 (4): 80-91+100.
- [4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7 月 1 日) [N]. 人民日报, 2021-07-02 (1).
- [45]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 [46] 罗艳华. 美国民主输出的战略手段与现实困境 [J]. 人民论坛, 2021 (35): 40-43.
- [47]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329.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龚静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 生成逻辑、主要内容与价值意蕴

张嘉升 杜艳华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红线”通常是指在某个领域内不可逾越的界限或底线，带有强烈的警示性和约束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红线”所作出的诸多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智慧的结晶。这一重要论述的生成受到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亲身实践的影响，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遵守秩序规范等思想的熏陶。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党百余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汲取，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底线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集中于多个关键领域：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领域，严守党纪国法红线；在生产发展领域，严守生命安全红线；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粮食安全领域，严守耕地红线；在国际关系领域，“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价值意蕴深厚，确证了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表达了守正创新的重要原则，体现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宝贵精神，是我们党善用底线思维执政兴国的有力诠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必须把握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1.008

作者简介：张嘉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杜艳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迈向第二个百年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新贡献研究”（21&ZD020）

引用格式：张嘉升，杜艳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与价值意蕴[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90-102．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 “两个结合”; 底线思维; 红线;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1-0090-13

一、问题的提出

在政策制定、社会管理和国际关系中,“红线”是一个重要术语。作为一种比喻性的表达,“红线”通常指在某个领域内不可逾越的界限或底线,带有强烈的警示性和约束意味。越过“红线”即逾越受到严格管控事物的边界,就是触犯规则,往往意味着会引发严重后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强调过严守相关领域的红线,要求全党全社会强化红线意识,重视红线问题,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守牢关键领域,有效防控风险,做到防患于未然。

当前,学界尚未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展开过系统研究。有学者仅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所作的有关“红线”重要论述进行了大致梳理^[1],但这一归纳尚不全面,亦缺乏理论向度的深刻分析。与“红线”研究相对较少形成对照的是,学界对“红线”的近义词——“底线”的相关研究热度颇高。这缘起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运用底线思维治国理政的重视及其所发表的与此相关的诸多重要论述。总的来看,关于底线思维的研究,学界有两个主流方向: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底线思维的总体考察。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四个历史时期运用底线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主要实践活动进行了梳理^[2]。有学者则集中考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底线思维的形成机理与实践要求^[3]。二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考察。这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成果也较为丰富。学者们多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形成原因、内涵、特征、实践要求等诸要素、诸环节出发,进行或总体或部分的研究。例如,有学者侧重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和重要意义展开研究^[4]。有学者则对这一重要论述进行了整体研究^[5]。应该说,“红线”与“底线”是一组含义相近但不相同的词。虽然两者都是为了规范行为、维护秩序等而设定的界限,都起着一种约束作用,但底线体现的是一种基本的要求或最低限度的保障,而红线则具有更强的禁止性。红线常用于禁止某些具有高危害性的行为,而底线常用于保障基本的权益和秩序。此外,“红线”一词还有喻指贯穿始终的正确思想的意涵,但鉴于此一词义在政策制定、社会管理和国际关系领域中鲜少用到,故不将其纳入本文的研究视域之中。

由上可见,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囊括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研究。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研究的起步阶段,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把握其生成逻辑、主要内容与价值意蕴,不仅是一项极为必要的基础性工作,而且有助于加深对“红线”概念的理解,有利于继续坚持与运用“红线观”助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参考意义。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生成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躬行实践的影响,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对中国共产党宝贵历史经验的

汲取。

（一）理论渊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我们现在所讲的“红线”一般指事物不容逾越的界线。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红线”这一概念，但其思想中确有对坚守原则界限等相关问题的哲理阐释和主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提出，离不开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支撑。例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必须正视主要矛盾及其转化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就是利用矛盾分析方法，明确了我国在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矛盾和不可触碰的底线问题。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说明，量变的积累会引发质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逾越红线即体现出对事物界限的准确把握，以控制事态发展的关节点，因为一旦突破关节点，事物就会发生质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表现出深厚的为民情怀与使命担当，旨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更是身体力行，在事关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等核心问题上划定了一系列不可触碰的、不可移易的原则性的界限或底线。特别是他们在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坚持解放全人类的目标、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等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这对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红线意识处置问题有强烈的感召作用。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决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认为任何妥协或背离无产阶级立场的行为，都会损害革命事业。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6]同时，他们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划定了解放全人类的目标，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 411}。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为基础。为澄清谬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了杜林所宣扬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必须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斗争中继续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并将其提升为重大原则之一。他将无产阶级专政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障，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专政来打击资产阶级的反扑，防止旧势力的复辟；任何否定专政的重要性的观点，都是对革命成果的背叛。“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7]此外，列宁还强调革命党必须具备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任何破坏党的团结和纪律的行为都是触碰了革命的底线。“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8]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对原则、底线问题矢志不移精神的教育下形成的。这不仅赋予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以理论深度，也使之具有了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

（二）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遵守秩序规范等思想的熏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治国理政的智慧和思维，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也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古代思想家和统治者曾有围绕规范个体和群体行为、维护秩序与公平、避免冲突与风险等问题的诸多论述，这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伦理和法律思想中均有具体体现。比如，儒家讲求“仁义礼智信”，认为道德和礼法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是社会秩序的基石，这就构成了他们

眼中的“红线”。孔子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9]这便是将“礼”作为人类活动的原则与底线，用以规范个人和群体的行为，防止越轨。道家的老子讲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10]，“知止不殆，可以长久”^{[10] 193}，意在警告人们顺应自然法则，遵守自然和社会的底线，不要违背规律、贪得无厌，否则会招致灾祸。法家则认为：“法者，治之端也。”^[11]他们视法律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红线，强调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任何人都不得突破法律底线，犯法就要遭受惩戒。墨家则强调“兼爱”和“非攻”，反对不义的战争和过度追求私利，认为发动战争会超越道德与正义的红线。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以礼作为“软红线”，以法作为“硬红线”，通过法律政策、礼制道德等手段划定人们行为的边界与底线，以维护皇权的稳定、秩序和权威。同时，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对统治者的统治行为提出了约束。开明的统治者愈加认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道理，正如《尚书·五子之歌》所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2]他们将百姓拥护与否作为施政的重要考量因素，这也成为对统治者自身行为的一种约束与规范。

此外，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还特别重视底线思维、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下》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13]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14]这都告诉人们要居安思危，预判事物发展的最坏结果，尽早采取措施防范危险。综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提醒人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注意运用底线思维处理问题，这对今天防范化解风险、坚守工作的原则界限等方面有启发作用。

（三）历史依据：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汲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生成还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与改革经验的系统总结，凝聚着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百余年探索过程中所收获的真知灼见。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辉煌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能始终在关键问题上保持关切并恪守正确的底线、原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15]的纲领，保证了正确的革命方向。尤其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党一方面肯定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性和领导权的重要性，从而划定了统一战线的红线。1922年7月，党的二大确定，“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15] 139}。在指导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6]。此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纪律与作风建设，始终强调党的纪律是党员不可突破的红线。毛泽东说：“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17]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守住新中国社会大局安定的红线，党领导开展土地改革和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创造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良好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党还严守国家主权与安全的红线，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把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使新中国真正

站稳了脚跟。党还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新中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党的建设方面，党严守党内团结的红线，反对分裂党的活动。1954 年 2 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18]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十三大所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一直将其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19]。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0]邓小平还提出“稳定压倒一切”^{[20] 331}的方针，明确稳定的环境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条红线。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逐渐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早在 1989 年，我国便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此后，党领导进行了改善生态环境的一系列工作，为新时代生态保护红线论断的提出奠定了基础。面对耕地资源紧张的问题，我国在 2006 年已正式提出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任务，这为新时代继续严守耕地红线积累了经验。总之，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坚守原则底线的实践与经验，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提供了经验智慧。

（四）现实观照：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内政外交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提出严守相关领域的“红线”。这是有效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艰难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而“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21]。国家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界限，但守住这一底线并非易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22]。在统筹“两个大局”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意识到：“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23]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持运用底线思维划定了诸多领域的红线，明确其中不可逾越的界限，为全党全社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了根本遵循，确保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在政治安全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注意防范化解党的建设面临的风险，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24]，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党纪国法红线不能逾越的要求。在经济安全方面，面对安全事故频发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安全作为发展的一条红线；面对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形势依然严峻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继续要求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在生态安全方面，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的形势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时系统划出中方在台湾问题、道路制度、民主人权、发展权利上不容挑战的“四条红线”。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既是对原则底线的明确，也是对潜在风险的警醒，目

张嘉升, 杜艳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与价值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90-102.

的是通过在关键领域划定清晰的边界, 实现行有所止, 避免触发系统性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只有强化红线意识、敬畏红线、守住红线, 才能更为有效地统筹发展和安全, 掌握主动权, 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内容丰富, 主要集中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领域、生产发展领域、粮食安全领域、生态文明领域与国际关系领域。

(一) 领导干部队伍建设领域: 不能逾越党纪国法红线

对党员领导干部划出红线, 是习近平总书记防范化解党的建设面临风险的重要举措, 也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写明: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25]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并对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提出严格要求, 强调其在履职尽责中必须严格遵守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红线。从时间上来看, 党规红线和法律红线的提出有一个先后顺序。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 “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 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 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26]。这是他首次提出“法律红线”的概念。此后, 他对领导干部进一步提出“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的要求: “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 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27]2015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法律红线的基础上提出“党纪就是红线, 处分就是惩戒”^[28]的新论述, 并在此后开始着重强调“党纪国法的红线不能逾越”^{[28] 86}这一新要求。党纪与国法作为红线被一起提出和反复强调, 表明我们党已更加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党纪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对全面从严治党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首先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尊重党纪国法的权威, 明确“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28] 15}。对于如何具体地推动领导干部严守党纪国法红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警示教育, “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 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29]。对于那些违规违纪、触碰法律红线的干部, “要坚决严肃查处, 不以权势大而破规, 不以问题小而姑息, 不以违者众而放任, 不留‘暗门’、不开‘天窗’, 坚决防止‘破窗效应’”^[30]。总而言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领导干部不能逾越党纪国法红线的重要论述, 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作出的刚性约束, 不仅维护了党规、法律的权威, 而且亮明了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这一工作的红线。

(二) 生产发展领域: 守牢生命安全底线

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它贯穿于生产活动的每个环节, 是保障经济运行稳定、社会秩序和谐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条件。一旦安全得不到保障, 不仅会给劳动者及其家庭带来灾难性后果, 也会影响企业的声誉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 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问题高度重视, 要求以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不能要带血的生产总值”^[31]。他围绕全社会守牢安全红线专门作出过多次指示, 要求“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31] 179}, 确保各类生

产活动在不突破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进行。2013 年 6 月,针对近一个时期以来全国多个地区接连发生多起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32]2015 年 5 月,他再次强调:“确保安全生产应该作为发展的一条红线。”^{[31] 185}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坚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33]。2018 年 1 月,他指出,“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34]。针对安全生产事故频发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判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方面抓安全生产“失之于软、硬度不够”^{[23] 132}。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23] 145};“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亲自动手抓”^{[23] 132};“要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工作”^{[31] 229}。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实际参加生产活动的各生产单位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其“要承担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第一意识,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31] 234}。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将安全视为生产发展中的基础性、前提性因素,并对各方提出明确的安全要求,从而为生产发展划定了明确的警戒线。

(三) 粮食安全领域:严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国之大者”^[35]。粮食短缺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威胁国家政权稳定。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共产党需要保障 14 亿多人的粮食供应,责任重大。党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把解决好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来抓,强调“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35] 20}。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本载体,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基础,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到粮食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36]。2006 年,“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约束性指标,这是基于中国人口粮食需求、耕地资源承载力和粮食自给率目标所科学测算得出的最低耕地保有量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强调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成为做好粮食安全工作的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甚至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做。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大家立了军令状,必须做到,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23] 198}“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37]他要求全党必须以最有力的举措守住这一底线任务:“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究责任。”^{[35] 37}在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中,必须处理好“改”与“不改”的辩证统一关系,做到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耕地红线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大事,是全党必须牢牢守住的关键领域。2014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就提出,“要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是试点的大前提,决不能逾越”^[38]。为守住耕地红线,党中央先后实施农田水利骨干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黑土地保护工程、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工程等,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建立省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通过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硬措施,我国守住了耕地红线,初步遏

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39]。但同时要看到,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依然突出,耕地撂荒增多,占补平衡存在量不足、质不高问题,守住耕地红线的基础尚不托底^[40],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是做好粮食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 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守护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4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成为这一思想的重要内容。生态保护红线指的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4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可以明确生态系统中最关键、最需要严格保护的区域,为这些核心区域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城墙”,可以有效防止这些对生态平衡起关键支撑作用的区域被破坏。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生态红线问题。他说:“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43]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要精心研究和论证,究竟哪些要列入生态红线,如何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把良好生态系统尽可能保护起来。”^{[23] 181}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并确定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任务^[44]。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45]。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对突破三条红线、仍然沿用粗放增长模式、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绝对不能再干,绝对不允许再干。”^[46]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47]。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48]。到2023年,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已经全面完成,牢牢守住红线、强化监管与管理,成为要紧的任务。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执法监管和保护修复,确保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49]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强调:“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21] 39}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保护红线从无到有,实现了从提出、划定到全面完成、强化监管、持续严守的转变,意义非凡。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中强调最多的方面之一。这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心与高超的治理能力。

(五) 国际关系领域: “四条红线”不容挑战

中国共产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敢于针锋相对^{[31] 21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要敢于划出红线,亮明底线。”^[50]因此,在对外交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划定了不容试探的红线,这集中表现在如何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美国

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5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的一条红线提了出来。2024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登总统通电话时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52]。同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同拜登举行会晤，在“一条红线”的基础上首次系统提出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四条红线”。他强调：“中美是两个大国，难免有些矛盾分歧，但不能损害彼此核心利益，更不能搞冲突对抗。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 4 条红线，不容挑战。这些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栏和安全网。”^[53]“四条红线”的提出，表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找准了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而且深化了对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认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具体地看，中国提出台湾问题红线，就是向世界宣告一个中国原则不容任何挑战；提出民主人权红线，就是向世界宣告我国一直致力于维护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有关国家不能打着维护民主、人权的幌子干涉我国内政；提出道路制度红线，就是向世界宣告我国选择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指摘；提出发展权利红线就是向世界宣告我国持续发展、改善民众生活的权利不容限制和侵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关系领域“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的论述，不仅明确表达了中国“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23] 42}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还为探寻国与国之间正确相处之道指明了方向。

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深厚，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还体现了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持守正创新的重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可贵精神，是对我们党善用底线思维执政兴国的有力诠释。

（一）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集中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关乎经济、政治、生态和外交等多个领域，事关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方方面面，淋漓尽致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真正体现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54]。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且对上至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定、下至微观层面的落实监管，都给予了正确指导、精准应对，保证了国家巨轮破浪前行。同时，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划定了不能突破党纪国法红线的行为规范，这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自觉追求。中国共产党洞悉红线的“眼力”、处置红线的“能力”、守住红线的“定力”，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更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24] 65}。

（二）坚持人民至上价值追求的生动彰显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24] 6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价值旨归就在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员领导干部严守党纪国法红线，就是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幸福；生产发展领域严守生命安全红线，就是保障人

民的生命健康权, 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了第一位; 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就是关心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保护人民的长远利益; 粮食生产领域严守耕地红线, 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维护老百姓的生计; 划出国际交往的“四条红线”, 就是着眼各国人民福祉, 促进国家间相向而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确证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1] 35}。

（三）坚持守正创新原则的鲜明表达

“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 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5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正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坚持守正创新原则的鲜明表达。从守正的角度看,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全党全社会牢牢守住关键领域的原则界限, 决不越雷池一步, 突显了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守党的性质宗旨之“正”、守人民至上理念之“正”、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正”。从创新的角度看, 在关键领域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 以“红线观”助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本身就是一种旨在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关系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我们党在具体领域亮明党纪国法红线、安全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耕地保护红线等警戒线, 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所作出的勇敢尝试和创新举措。可以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正确处理了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通过守正筑牢根基, 以创新开拓发展路径, 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精神的突出体现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 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 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 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 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31] 222} 习近平总书记则是身体力行地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模范战士。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锚定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关键领域, 特别是在长期以来困扰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和对外交往等重要问题上划出红线、亮明底线, 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政治勇气, 也突显了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要一以贯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仍需“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 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48] 23}。

（五）善用底线思维执政兴国的有力诠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 凡事从坏处准备, 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 牢牢把握主动权。”^{[50] 288} 关于“红线”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底线思维的精髓要义治国理政所得出的宝贵成果。在内政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到有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安全生产事故、耕地数量减少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带给全社会的惨痛教训, 为防止事态继续恶化, 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于是在各方面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告诫人们哪些事情不能做。在外交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国际交往中明确划出中国在台湾问题、道路制度、民主人权、发展权利上不容挑战的“四条红线”, 以申明国家间不要做干涉他国内政、损害彼此利益的事情。明者

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底线思维、直面问题和风险，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生动展现。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具有极为深刻的内涵与重大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与运用“红线观”治国理政的具体表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要求我们坚定守住关键领域的原则界限，不犯颠覆性错误，但又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其他一切问题，更不能墨守成规、思想僵化。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我们需要更为精准地认识和把握红线观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制定策略和解决问题时既要保障红线所涉及的核心关切与长远目标，又要灵活多变地化解矛盾，适应变化，激发动力；在坚守正道的同时实现创新发展，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同时促进多元合作。完整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思想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本领。

参考文献：

[1] 卜昭滔，杨文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红线”[N]．学习时报，2024-07-01（3）．

[2] 王炳林，周凯．中国共产党运用底线思维的百年考察[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2）：102-111．

[3] 刘晓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底线思维的形成机理与实践进路[J]．东岳论丛，2024（7）：83-88．

[4] 张琳．习近平“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及其双重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14-25．

[5] 岳红玲．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21．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5．

[7]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9．

[8]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6．

[9]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22．

[10] 王凯．老子《道德经》释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

[11]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230．

[12] 张九成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346．

[13] 朱熹．周易本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251．

[14] 郭沂．子曰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872．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

[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015．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28．

张嘉升, 杜艳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与价值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90-102.

- [19]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6.
- [20]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70-371.
- [2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40.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19.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3.
- [2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0.
- [25] 中国共产党章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6.
- [26] 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改革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4-01-09 (1).
- [27]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39.
- [28]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6: 58.
- [29]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5: 148.
-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2021年版)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445.
- [3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80.
- [32] 习近平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部署 李克强要求, 扎扎实实开展好安全生产大检查, 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 健全各项制度, 切实维护人民生命安全 [N]. 人民日报, 2013-06-08 (1).
- [33] 习近平对加强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守土有责敢于担当 完善体制严格监管 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李克强作出批示 [N]. 人民日报, 2016-07-21 (1).
- [34]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 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 李克强张高丽汪洋王沪宁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8-01-24 (1).
- [3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129.
- [3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74.
- [37]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13-12-15 (1).
- [38]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强调 鼓励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4-12-03 (1).
- [39]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 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 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3-07-21 (1).
- [40] 习近平.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 抓好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 [J]. 求是, 2023 (23): 4-8.
- [4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2: 11.

- [42]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 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147.
- [4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209.
- [4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3.
- [4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2.
- [46]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72.
- [47] 习近平.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J]. 求是, 2022 (11): 4-9.
- [48]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2.
- [49] 习近平.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J]. 求是, 2024 (1): 4-9.
- [50]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2016 年版)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273.
- [5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2-11-15 (1).
- [5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N]. 人民日报, 2024-04-03 (1).
- [5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利马举行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4-11-18 (1).
- [5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23.
- [55] 习近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J]. 求是, 2023 (19): 4-8.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卢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 形成依据、丰富内涵与实践方略

刘金华 杨志平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线思维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深化了对红线的规律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质量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转化，是对中国共产党“红线观”形成发展的总结与提炼，是对“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下机遇挑战的应对与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系统阐述了发展红线、政治红线、思想红线、纪律红线、法律红线、政商红线、治理红线、耕地红线、生态红线、主权红线等一系列内容，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深刻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红线的本质性把握与规律性认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要坚持科学认识红线、坚持完善法律法规、坚持加强舆论引导与坚持凝聚国际共识，牢固树立红线、底线，坚决维护我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红线；治国理政；底线思维；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1-0103-12

DOI：10.13946/j.cnki.jcqis.2025.01.009

作者简介：刘金华，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东北石油大学）研究员；杨志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9LLKDA015）

引用格式：刘金华，杨志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丰富内涵与实践方略[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103-114.

一、问题的提出

“红线”既代表了不可逾越的底线，又是不可突破的界线，更是贯穿事物发展全过程的中心线。坚持与运用“红线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进程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思维和实践经验，鲜明体现中国共产党坚守政治定力、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与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外外交多个场合，就安全生产、耕地保护、依法治国、环境保护、反对“台独”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关于红线的重要论断与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红线观”，对于科学指导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包含发展红线、政治红线、思想红线、纪律红线、法律红线、政商红线、治理红线、耕地红线、生态红线、主权红线等十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多个领域，是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深刻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红线的本质性把握与规律性认识，对于把红线思维贯穿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当前学界对“红线”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概念、内容与价值等方面，研究成果不多。一是概念研究，认为红线是底线，是不可逾越的界线。例如，有学者提出，红线引申为红色警戒线，是不能踩踏、不能跨越、不能侵犯的禁区或底线^[1]。二是内容研究，包括人民立场红线、党建红线、生态红线等。有学者提出，坚守人民立场是贯穿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全部历史进程中的一条红线^[2]。还有学者提出，在社会建设和基层治理中贯穿党建红线^[3]。也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4]。三是价值研究，主要分析坚守红线、树立红线意识的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要划定和恪守生态红线，否则我们设想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难以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保证，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难以保障^[5]。综上可知，目前对于红线的研究较多只是某一个方面的研究，真正将红线作为研究主体的少，在红线理论内涵的挖掘、实践的应用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特别是需要对新时代以来的“红线观”加强研究，深刻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明晰“红线观”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立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深刻挖掘红线背后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要求，揭示“红线观”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形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质量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转化，是对中国共产党“红线观”形成发展的总结与提炼，是对“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下机遇挑战的应对与回应。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质量度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其中的质量度理论，为这一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指导。质量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认识事物总是首先认识事物的质，进而认识事物的量，在此基础上揭示事物的质与量的辩证

统一, 即掌握事物的度。”^[6] 作为哲学范畴, 质是指一事物成为自身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固有的规定性。此物之所以为此物, 并有别于他物, 就是由于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事物的构成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在一定范围内, 量的变化并不影响事物的质, 即不影响事物作为某物而存在。度是指事物保持其质不变的数量界限, 是和事物的质相统一的量的限度、幅度、范围^{[6] 166}。任何度的两端都存在着极限或界限, 这就是关节点或临界点。度就是关节点范围内的幅度。“在这些关节点上, 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相应物体的状态的质变, 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 量转化为质。”^[7] 这深刻要求我们树立底线思维, 在现实生活中掌握“适度”的原则, 防止“过”或“不及”。凡事都不能超越底线, 如法律底线、道德底线等。这些底线就是度的关节点, 一旦超越这些底线, 事物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如在真理问题上, “只要再多走一小步, 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 真理就会变成错误”^[8]。

（二）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精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其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 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 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精华。一是居安思危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告诫人们不能被眼前的安逸所迷惑, 要具有长远的眼光和对潜在危机的敏锐洞察力, 所谓“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二是道法自然理念。“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这一思想突出体现了万事万物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 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人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遵循自然规律, 不可突破自然界生存和发展的底线, 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三是对于“度”的把握。世间万物, 皆有其度。度者, 量与质的交汇点和分界线, 是事物保持其本质的幅度和范围。一旦超过了这个“度”, 将产生不可预知的危险, 所谓“过犹不及”“物极必反”^[10]。四是隆礼重法思想。这一思想是古代中国的重要治国理念, 强调尊崇礼义道德和重视法律制度, 划定道德红线与法律红线, 使人们在内心树立起道德观念, 抑制自身的欲望, 以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加强法律的惩戒作用。

（三）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红线观”的形成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红线观”是一种以原则和底线为核心的观念体系, 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形成发展出来的重要理论思维和实践经验, 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支撑。革命时期, 党将红线理解为一种根本性原则,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上的红线,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批判与反对任何脱离或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此, 毛泽东强调: “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 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 老是那么一套, 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 违背了就要犯错误。”^[11] 建设时期, 党将红线作为一种思维方法, 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凸显了红线的重要意义。例如, 党深刻认识到要始终紧抓毛泽东思想这条红线, 作为党开展各项工作的理论指导。“这里面贯串着毛泽东思想, 成为军队建设的一条红线。”^[12] 改革时期, 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线观”内涵, 将红线引申为党的根本理论、根本路线与根本方针等, 贯穿到党治国理政各方面, 发挥了红线的重要作用。例如, 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贯穿了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全过程, 是发展社会生

产力的红线”^[13]。

（四）时代条件：“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下的机遇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思想深邃、视野宏阔，始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把握了国际国内发展新形势，将红线思维贯穿到党治国理政全过程、各领域，有力推动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15] 中国改革经过 40 多年，现在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更加艰难繁重的改革任务，要继续把改革向前推进，必须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16]，这深刻凸显了在改革中不能触碰红线和底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的国际局势^[17]，我国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在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红线。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一个包含发展红线、政治红线、思想红线、纪律红线、法律红线、政商红线、治理红线、耕地红线、生态红线、主权红线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科学指导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红线：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

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但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要始终坚持人民生命安全至上，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以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为重点，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系统建设，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18] 安全生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体现了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坚持在党和国家发展全过程中贯彻落实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工作部署，坚持生命安全至上，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坚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关系，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二是要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将红线意识贯穿到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中，完善安全监管体制，依靠严密的责任体系、严格的法治措施、有效的体制机制解决好安全生产领域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9]。三是生产单位要积极承担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的红线意识，建立健全预警应急机制、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刘金华, 杨志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丰富内涵与实践方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03-114.

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 有效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 提升安全生产保障水平,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二）政治红线：任何人不得越过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红线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20], 是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 在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 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1]。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任何人不得越过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红线, 越过了就是大忌, 就要付出代价。”^[2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突出了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对于维护党内团结、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意义。在政治纪律上, 对于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在党内拉帮结派, 大搞团团伙伙的, 对于党中央决定拒不执行、阳奉阴违的, 要严厉查处, 防微杜渐。在政治规矩上, 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 必须遵循组织程序,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自觉请示报告重大问题、重大事项、重要工作, 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最后, 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 不得违背组织决定。坚持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内团结统一、重塑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约束力, 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2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政治问题上, 任何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 越过了就要严肃追究其政治责任。”^[24] 党员干部一定要绷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 清楚明白一旦越过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红线, 就会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对于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造成不利影响。

（三）思想红线：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

“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25] 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 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26]。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 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 一旦思想上的“总开关”未拧紧, 没有自觉坚守思想上的红线, 就不能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 就会在思想上出现问题, 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初心使命, 违反党的纪律与规矩。因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加强警示教育, 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 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27] 坚守思想上的红线, 既靠外在监督, 更靠自觉自律, 党员干部必须把纪律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法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牢记于心, 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 守住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24] 377}。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提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坚持学习贯彻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 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 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二是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 坚守思想上的红线,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 追求高尚情操, 自觉远离低级趣味、抵制歪风邪气, 坚守理想信念与初心使命, 始终保持思想上的纯洁。

（四）纪律红线：党纪就是红线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作为一个拥有九千九百多万名党员、五百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坚守纪律红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危及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纪就是红线，处分就是惩戒。党纪处分条例要体现从严治党、加强纪律建设的要求。”^{[22] 58} 这深刻说明了严明党的纪律、加强纪律惩戒，对于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历史和现实深刻证明，党员干部出问题，首要在于突破纪律红线，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将党的纪律看成摆设，缺乏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从而违反党章党规、践踏党纪红线，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自食恶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作用，深刻强调了严格遵守党纪党规是共产党员不可突破的底线，违反党纪和破坏党规就是对党不忠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纲纪不彰，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党纪国法的红线不能逾越”^{[22] 86}。任何党员干部必须保持对党绝对忠诚，模范遵守党章，严格按党的制度和规矩办事，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都不破坏党的制度和规矩。同时，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28]。

（五）法律红线：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的观念

法律是秩序的基石，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宪法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法制保证^[29]。因此，必须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的观念，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始终对宪法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22] 97} 只有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才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才能顺利发展。首先，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依法执政，正确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其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不能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最后，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22] 9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红线’，建立防止司法干预的‘防火墙’和‘隔离带’，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制度保障。”^[30]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不能突破法律红线。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六）政商红线：划定“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红线

政商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是对党治国理政的重大考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了政商关系对于党自身建设、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划定了“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红线，揭示了新型政商关

系的本质, 为中国政商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政商关系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 他就撰文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要亲商、富商、安商; 另一方面, 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 公私分明, 君子之交淡如水”^[31]。2013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 “‘官’‘商’交往要有道, 相敬如宾, 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 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2016年3月, 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划定了政商关系红线, 引起巨大反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型政商关系, 概括起来就是“亲”“清”两个字^{[26] 264}。这个论断强调在政商关系上, 既要做到“亲”, 又要做到“清”。一方面, 领导干部要关心关怀民营企业发展, 积极作为, 帮助解决企业发展的实际困难; 同时, 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 不能以权谋私, 不能搞权钱交易。另一方面, 民营企业家要积极与各级党委和政府沟通、交流, 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 热情支持地方发展, 同时, 要坚持洁身自好, 遵纪守法。习近平总书记的“亲清论”清晰地标注了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家交往共处的界线, 进一步为政商交往划定了红线, 明晰了政商交往之道, 具有丰富的政治、法律和道德内涵^[32]。这对于推动构建风清气正的政商关系、净化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七) 治理红线: 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红线

在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过程中, 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贯穿了整个过程, 是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红线, 有力打通了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进一步提高了社会治理水平, 提升了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城乡社区处于党同群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 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 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18] 129}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 党员发挥应有作用, 党的根基才能牢固, 党才能有战斗力, 才能更好发挥其在社会治理、基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基层党组织作为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组织, 始终扎根社会基层, 具有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作用, 是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基层建设的核心力量, 能够有效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多种力量, 形成高效、协同的社会治理格局。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 “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抓紧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各种短板, 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33]因此, 要真正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必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34],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好, 真正发挥战斗堡垒、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中, 在办好一件件老百姓操心事、烦心事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 把各方面服务工作做好, 使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幸福。

(八) 耕地红线: 坚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 绝不能有闪失。”^[35]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加强耕地保护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加以强调, 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守住了耕地红线, 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但同时人多地少的矛盾依然存在, 耕地保护任重而道远,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必须长期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18 亿亩耕地, 是红线, 是战略底线, 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

线。”^[36]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必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18 亿亩耕地红线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和红线，决不能逾越。二是加强耕地执法，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完善土地执法监管体制机制，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严控对优质耕地的占用，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决不允许任何人在耕地保护上搞变通、做手脚。”^[36]三是守住耕地红线，既要守住“红线”数量，也要守住“红线”质量。一方面，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提高耕地质量；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工程，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四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守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确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决不突破。

（九）生态红线：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37]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38]。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生态红线，就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这个红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必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39]一是严格划好生态红线范围。“划定生态红线的目的便是将重要生态功能区严格保护起来，用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使生态红线内的环境免遭进一步破坏。”^[40]要严格按照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与脆弱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落实到国土空间规划，系统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二是建立与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要强化地方政府在生态环保问题上的法治观念与法治思维，组织修订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将生态红线观念贯穿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实现传统生态环境治理方式的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41]三是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生态保护修复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监管，对于破坏生态行为，必须要依法予以惩处，强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督察执法。

（十）主权红线：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红线”代表了某种绝对不可突破的底线或者界线，一旦突破将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从国家层面来看，“红线”代表着国家主权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是绝对不容侵犯的红线。中国政府一贯强调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2024 年 11 月 16 日，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 4 条红线，不容挑战。”^[42]在台湾问题上，我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

刘金华, 杨志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丰富内涵与实践方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03-114.

的红线。”^[43]在民主人权问题上,我国坚定不移走适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坚决反对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粗暴践踏人权红线。在道路制度上,我国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守道路制度红线,支持和尊重各国自主选择道路和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21] 493}。在发展权利问题上,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同时认为各国人民都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尊重各国发展权利,坚持捍卫发展权利红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44]总的来说,当前我们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与严峻,必须要牢牢坚守主权红线,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实践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为正确处理各种原则底线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要坚持科学认识红线、坚持完善法律法规、坚持加强舆论引导与坚持凝聚国际共识,不断强化红线意识,更好发挥其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一) 科学认识红线,辩证把握红线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红线既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又是不可突破的界线,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必须辩证把握红线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努力发挥红线的最大作用。从红线的原则性来看,它是一种刚性约束,代表了一种不容侵犯、不可妥协的基本准则。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要划好红线,坚持红线的原则性。例如,在国家主权红线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代表了国家核心利益,任何侵占他国领土、试图干涉他国内政都是对主权红线的严重践踏,必须坚决反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坚决反对。”^{[21] 47}从红线的灵活性来看,一方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具体领域的红线进行动态调整与精准划分,确保红线划分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精心研究和论证,究竟哪些要列入生态红线,如何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把良好生态系统尽可能保护起来。”^{[41] 32}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对于红线的界定和划分要随着时代发展、形势变化不断发展。譬如,在耕地红线上,随着可用耕地规模的逐渐扩大,可以进一步进行精准划分,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总之,要辩证把握红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相互依存关系,二者共同明确了红线的核心本质。

(二) 完善法律法规,明确触碰红线的法律责任与加强监督问责

法律具有规范性、强制性与公正性,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明确红线的具体行为与法律责任,在法律层面明晰哪些行为是禁止的、绝对不可逾越的,从而增强法律红线不能触碰的震慑力,有效遏制违反红线的行为。同时,强化监督问责,确保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防止权力的滥用,对于违反红线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惩处,提高监督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把红线纳入法治化轨道,明确触碰红线的法律责任,奠定了坚守红线的法律基础。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法律红线上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45],在耕地红线

上要严格执法、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35] 37}，在生态红线上要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41] 44}，这些深刻说明了依靠法律制度维护红线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41] 13}因此，必须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法律制度的约束性作用，进一步明确触碰红线的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针对各领域具体问题细化法律法规条款、及时更新法律法规内容，强化制度执行，始终以严格的法律制度树立红线、维护红线与保障红线，让法律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筑牢红线的法律边界。

（三）加强舆论引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红线的认同

当前，新媒体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们面临的舆论环境、舆论形势更加复杂，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舆论引导与红线教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红线的认同。一是精准解读红线内涵。要积极利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媒体平台，邀请知名学者或者法律专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各类红线的内涵及其重要性，增强民众对红线的认知。例如，要让民众认识到保护生态红线的重要意义，清楚违反生态红线的严重后果，提高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二是加强红线教育，深入开展舆论斗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守牢守好舆论阵地。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否定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对红线原则性的重大挑战。例如，针对民进党当局炒作所谓“台湾原住民史观”“台湾国族论”“台湾民族自决论”等历史虚无主义论调^[46]，我们必须从历史和现实上阐明一个中国原则的根本立场，牢固树立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红线意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三是坚持正面宣传与警示教育相结合。一方面，注重典型示范，表彰坚守红线模范；另一方面，以违反红线案例为素材加强警示教育，使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到红线不可触碰、不可逾越，营造坚守红线的社会氛围。

（四）凝聚国际共识，牢固树立中国红线不可逾越的观念

在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中，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26] 435}红线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防护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上，要坚持构建中国话语叙事体系，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彰显中国力量、提出中国方案，阐明中国绝对不可逾越的红线与底线，把更多中国主张上升为国际共识、国际行动，形成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不断提升其在全球的话语影响力，以更好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 4 条红线，不容挑战。”^[42]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有力阐明了中国的红线与底线，进一步凝聚了国际共识、牢固树立了中国红线不可逾越的观念。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交，深刻说明了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要积极发声、加强话语叙事，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红线与底线所在，明确绝对不可逾越的界线，从而保障国家正当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

刘金华, 杨志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丰富内涵与实践方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03-114.

参考文献:

- [1] 卜昭滔, 杨文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红线” [N]. 学习时报, 2024-07-01 (3).
- [2] 段治文, 苏悦. 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的百年进程、内在逻辑与价值蕴涵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 (5): 48-54.
- [3] 赵秀玲. 在社会建设和基层治理中贯穿党建红线 [J]. 党的文献, 2020 (4): 8-9.
- [4] 黄雯怡.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守正创新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3 (2): 16-26.
- [5] 刘建伟, 张静. 习近平国家治理的底线思维 [J].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8): 5-10.
- [6] 谢龙.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62.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905.
- [8] 列宁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11.
- [9]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强调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 [N]. 人民日报, 2014-09-25 (1).
- [10] 向贤彪. “努力做到‘刚刚好’” (人民论坛) [N]. 人民日报, 2023-11-14 (4).
- [11] 毛泽东文艺论集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187-188.
- [12] 罗荣桓军事文选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7: 572.
- [13] 武国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77—1991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365.
-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716.
- [1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3.
- [16] 习近平.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J]. 求是, 2024 (10): 4-15.
- [17]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J]. 求是, 2024 (16): 4-11.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62.
- [19]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强调 坚决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决策部署 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改革 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6-10-12 (1).
- [20] 杨志平, 刘金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要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0-22.
- [21]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07.
- [22]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6: 24.
- [23] 王春玺.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重大成就与未来进路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 (6): 17-23.
- [2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2021 年版)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98.
- [2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 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N]. 人民日报, 2013-04-21 (1).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67.

-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76.
- [2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 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充分释放 [N]. 人民日报, 2015-06-28 (1).
- [29]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9.
- [30]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强调 科学统筹突出重点对准焦距 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5-02-28 (1).
- [31]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440.
- [32] 张国清, 马丽, 黄芳. 习近平“亲清论”与建构新型政商关系 [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 (5): 5-12.
- [33]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N]. 人民日报, 2020-07-01 (1).
- [34] 梁伟军.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共同缔造——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J]. 求索, 2024 (6): 92-100.
- [3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31.
- [36] 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 (两会现场观察) [N]. 人民日报, 2022-03-07 (1).
- [3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09.
- [3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576.
- [39]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2016 年版)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236-237.
- [40] 王乔, 卢鑫. 生态红线约束下国家级新区功能区规划及绿色增长能力研究 [J]. 理论探讨, 2018 (6): 102-107.
- [41]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34.
- [4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利马举行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4-11-18 (1).
- [4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2-11-15 (1).
- [44] 习近平致信祝贺“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开幕 [N]. 人民日报, 2016-12-05 (1).
-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721.
- [46] 邓观鹏, 顾友仁.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样态、危害与治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49-164.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卢媛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 及其话语叙事的演变

张建 姜星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世界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上海 200233）

摘要：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深刻改变了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话语叙事。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元首互动保持较高频率，为两国交往提供指导原则；中美高层官员开展沟通，落实元首会晤精神并塑造中美长期交往模式。这显示出中美高层战略互动新的演进逻辑：中美高层战略互动频率更高、互动形式更加丰富、涉及的议题领域更广泛；中国在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中的主动性不断增强，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外交互动模式。在战略竞争导向下，美国一方面试图通过其“话语霸权”在国际社会传播负面涉华叙事，另一方面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运用各种新兴话题施压中国。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与话语叙事的新态势是国际、双边和国内各层次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突发性事件加剧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高层战略互动有助于回应国内外利益关切，扩大双边、多边合作，但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决定了其对华战略竞争叙事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在特朗普 2.0 时代，中方应继续通过中美高层战略互动，通过和平崛起的叙事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关键词：中美关系；高层战略互动；话语叙事；对华战略竞争；红线观；特朗普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5.01.010

作者简介：张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统战研究基地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员；姜星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研究”（23ZDA120）；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ZK01202401065）

引用格式：张建，姜星宇．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演变〔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115-131．

一、问题的提出

当地时间 2024 年 12 月 17 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已在各州的选举人团会议中获得足够的选举人票,正式获得总统职位。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开启特朗普 2.0 时代。为深入分析特朗普 2.0 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趋势,学术界有必要梳理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演变。自 2017 年特朗普政府全面开启对华战略竞争以来,美国政府及社会的对华认知出现急剧转变,中美关系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根本方向,中美关系仍然面临深刻挑战,使得竞争成为双边关系的新常态。在美国对华定位深刻转变的形势下,中美之间的高层外交互动以及互动中的话语叙事出现一定的变化,深刻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演变态势。高层战略互动是两国官方互动层次最高、互动形式最直接的外交交往模式,对国家外交战略和政策制定、双边关系的正常开展具有深刻影响。高层战略互动过程中的话语叙事作为各自阐述其政策行动、争取国内国际支持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反映国家利益关切,对于理解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起到关键作用。

既有研究主要从三个视角分析中美高层战略互动。第一,从国家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等单向度出发,对中美各自的外交互动活动进行研究,分析高层战略互动的演变逻辑和产生的影响^[1]。第二,聚焦于某一议题领域的高层战略互动,分析中美高层战略互动的开展背景、变化原因、作用与不足等^[2]。第三,从中美战略合作等宏观角度对中美高层战略互动进行整体性研究,分析高层战略互动变化的原因,反映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中国对美外交提供对策^[3]。然而,现有对高层战略互动的研究多数只涉及中美国家领导人层面,对涉及其他高级官员、对话机制等高层战略互动形式涉猎较少,也未能结合高层战略互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进行动态分析。针对中美话语叙事的研究则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研究美国对华话语叙事,阐述美国构建对华话语叙事的策略、主导叙事的变化,评估叙事发挥的作用^[4]。第二,对中国的涉外话语叙事进行研究,分析开展话语叙事的具体策略、作用,通过话语叙事的变化分析外交立场的演变^[5]。第三,研究中美互动中的话语叙事,阐述中美两国叙事构建的演变、中国如何开展对美叙事博弈^[6]。既有文献大多从中美两国各自的外交叙事或媒体层面的外交宣传等角度阐述涉华、涉美叙事,未能对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中的话语叙事博弈进行具体分析。

在特朗普重返执政的背景下,执政党更迭为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走向带来不确定性。2024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秘鲁利马举行会晤,通过元首会晤为维持过渡时期的中美关系稳定注入强心剂,再次彰显了高层战略互动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引领作用。因此,本文尝试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梳理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态势和变化,探讨引发变化的因素,分析其产生的作用。梳理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变化,对于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美关系走向、以理论总结指导中国外交和对美政策实践、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美高层战略互动态势及其变化

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上台以后, 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中止, 对华战略竞争成为新常态。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作为双边关系的直接反映, 在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下形成新态势和新特征。

(一) 中美高层战略互动态势

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上台以来, 美国对华战略的大幅度调整使得中美关系陷入剧烈波动中, 中美关系的发展出现很多挑战。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致使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对华关系, 双方高层战略互动实践上升至新的水平。第一, 中美元首互动保持较高频率, 为中美两国交往提供指导原则。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和拜登执政以来, 中美双方重视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2017年1月—2021年1月), 两国元首电话沟通18次^①, 在G20峰会期间会晤3次^②, 在双边外交场合会晤2次^③。拜登总统上台后, 截至2024年11月, 两国元首电话沟通7次^④, 互相致贺信1次^⑤, 在G20峰会期间会晤1次^⑥, 在双边外交场合会晤4次^⑦。受到疫情影响, 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2021年11月和2022年3月采用视频方式举行双边会晤, 开拓了双边互动新模式, 显示出中美元首互动不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停滞,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元首会晤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2024年11月, 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利马会晤期间, 重申双方就中美关系指导原则达成的7点共识, 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保持沟通、防止冲突、恪守《联合国宪章》、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负责任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 为中美关系当下及未来的发展框定有益的方向^[7]。

第二, 中美高层官员从中美关系的战略高度出发开展沟通, 落实元首会晤精神并塑造中美长期交往模式。2021年3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8]。双方同意继续保持高层战略沟通,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管控中美关系, 在2022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中, 两国元首责成双方外交团队保持战略沟通对话^[9]。2024年8月, 沙利文访问中国, 成为自2016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也是沙利文和王毅之间继维也纳、马耳他、曼谷之后的第4次战略沟通, 双方互动形成较为稳定的机制。双方继续讨论战略性议题和地缘政治等具体议题, 努力在美国大选前的敏感阶段保持双边战略稳定。这次访问就两国元首近期开展新一轮互动进行了讨论, 以维持稳定和较高频率的中美元首会晤^[10]。本次访问期间, 沙利文还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举行会晤, 共同表达了对中美两军维持对话、减少误判的高度重视^[11]。

① 两位领导人分别在2017年2月、4月12日、4月24日、7月、8月、9月6日、9月18日、10月、11月, 2018年1月、3月、5月、11月、12月, 2019年6月、12月, 2020年2月、3月通电话。

② 两位领导人分别在2017年7月G20汉堡峰会、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G20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③ 分别是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会晤, 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④ 两位领导人分别在2021年2月、9月、12月, 2022年7月22日、7月28日, 2023年11月, 2024年4月通电话。

⑤ 2024年1月1日, 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互致贺信, 祝贺两国建交45周年。

⑥ 两位领导人2022年11月G20巴厘岛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⑦ 分别是2021年11月与2022年3月举行视频会晤、2023年11月在旧金山斐洛里庄园举行会晤、2024年11月在利马举行会晤。

第三，中美各领域高级官员紧密互动，落实元首互动成果并开展具体外交工作。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以来，中美高层官员在政治、经济、国防安全、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保持沟通交流。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执政期间，杨洁篪、王毅多次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会晤或通电话，就朝鲜半岛局势、新冠疫情防控等问题进行会谈。拜登政府执政期间，中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继续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开展对话。2021 年 4 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共同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12]。11 月，双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继续举行双边会晤并发表《中美关于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13]，有效推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取得重要成果。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高级官员会晤。各层级、各领域的中美高级官员互动的持续进行，有助于维持中美在双边与多边领域的合作。

第四，中美在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不断建立新机制。外交互动机制是具有稳定性与可重复性的沟通渠道，机制的形成和维持不以外交官员的人事变动为转移。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执政期间，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确立了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并陆续由相关官员推动运转^[14]。为解决中美贸易分歧，2018 年 2 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在华盛顿举行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开辟了道路。8 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率中方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举行经贸问题副部长级磋商，就中美具体的经贸问题进行讨论。拜登政府重视气候变化、管控毒品等新兴议题，在多个领域与中国开辟新的高级别对话与工作机制。2024 年 1 月，中国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王小洪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副助理、白宫国土安全事务副助理詹·达斯卡尔率领的美国禁毒联合代表团，正式启动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2024 年 4 月和 9 月，中美两国成立的商贸工作组召开两次副部长级会议，沟通商贸政策和具体商业问题^[15]。5 月，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在华盛顿举办中美“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会议，继续开展气候交流与合作，体现出中美气候合作的稳定性。

不同层级的高层战略互动有序开展，各自发挥独特功能，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元首互动具有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元首达成的共识和精神确立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主基调，为后续各层级互动的开展指明方向。高层战略互动更具专业性，通过不同专业领域的高级官员会晤，落实元首会晤的共识和精神。对话机制的形成有利于开展更加具体的合作，机制化和制度化的交流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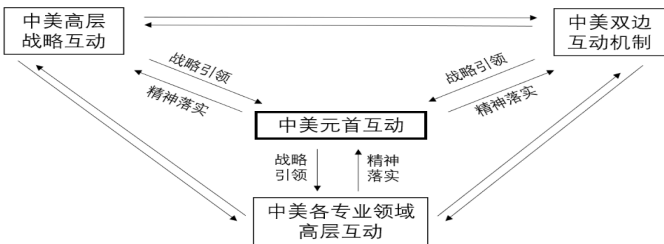


图 1 各层级中美高层互动的关系
(来源：笔者自制)

张建, 姜星宇.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演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15-131.

（二）中美高层战略互动演变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新背景下，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出现一定转变，深刻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演进逻辑。

第一，中美高层战略互动频率更高、互动形式更加丰富、涉及的议题领域更广泛。随着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新的指导思想，中美互动中的摩擦和分歧增加。中美双方都认为有必要保持高层战略互动，妥善管控乃至解决新出现的分歧。奥巴马政府 8 年期间，中美元首的电话沟通次数为 14 次；而特朗普第一届政府 4 年间，中美元首的电话沟通次数达 18 次。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上台后，将原本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与人文对话机制扩充为全面经济、外交安全、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四大机制，显示出继续密切对华关系的意愿。但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互动机制并没有得到有效运转。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之间的高层战略对话和沟通明显增多，不同层级的议题领域分工更加细化。

第二，中国在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中的主动性不断增强，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外交互动模式。随着中国与世界沟通连结程度的上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将对美关系视为最重要的一组大国关系，在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中展现出更加自信的姿态。在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后，中方采取八项反制措施，取消中美两军军区领导通话等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与合作机制^[16]，显示出中国在中美互动中的红线观。2023 年 11 月旧金山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并主动宣布中方未来 5 年愿邀请 5 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启中美农业联委会等多个合作机制，为深化中美人文交流开辟新道路^[17]。由此可见，中国在中美战略互动中既坚持红线观，敢于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也能够主动深化双边交流与合作，在中美战略互动中日益发挥主导作用。在中美关系受竞争思维影响而出现不确定性时，中国积极发挥主动性，通过对美高层战略互动等外交行动规避中美关系中的风险、不断形塑外部环境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体现出中国对软实力建设的重视和水平的提高。

三、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中的话语叙事变化

话语叙事是国家在外交互动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国家通常使用相对连贯的叙事模板构建身份认同并提高政策行动合法性，以此赢得公众支持^[18]。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导向促使两国高层战略互动中的话语叙事同步出现大幅度转变。这种话语叙事的变化深刻反映了两个国家对己方和对方身份的定位、对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成为中美关系演进的深刻缩影。

（一）美国对华外交话语叙事的转变

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与中国崛起引发美国强烈的霸权焦虑，对华战略竞争成为其外交政策焦点与战略认知中的主导思想。依靠在国际话语权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一方面试图通过其“话语霸权”在国际社会传播负面涉华叙事，另一方面则大幅度转变美国在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中的话语叙事，为其对华政策提供合法性。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服务对华战略竞争目标的背景下，美国相关政策行为呈现以下演进逻辑——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影响两国高层战略互动中的两国关系定位叙事，两国关系定位叙事指导具体对华政策主张。

第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与美国高级官员的对华立场出现重大改变。特朗普、拜登两届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将中国界定为“竞争者”（competitor）或所谓“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脱离了新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作负责任合作伙伴的身份定位^[19]。这种转变随即体现在美国政府领导人和高层官员的言论中。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社会的“重大威胁”，妄图反转以往美国的对华认知。时任副总统迈克·彭斯将当代国际关系描述为“大国竞争”（great power competition）的时代，批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扩大地缘政治优势和影响力”，并诬称中国“干涉”美国政治^[20]。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对华战略认知。2023 年 10 月，沙利文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中国既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又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美国需要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加强对华外交^[21]。通过将中国塑造成经济上“掠夺”美国利益、政治上与美国制度存在巨大差异、军事上“威胁”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竞争者”，两届美国政府领导人试图在对华外交中形成“自我-他者”的二元叙事。美国对华认知的逆转使美国政府在高层战略互动中重新定义两国关系，并以此指导对华政策主张。

第二，在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中，美国政府不顾中方的反对与交涉，片面地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以竞争作为美国开展对华外交的目的与手段。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美国高层官员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时强调乃至扩大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2018 年 10 月，国务卿蓬佩奥在北京与王毅会晤期间，声称两国陷入根本分歧（fundamental disagreement）中^[22]。拜登政府上台后，竞争继续成为对华主导战略，美国高级官员的对华叙事中频繁谈及两国关系的竞争定位。2021 年 11 月，拜登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进行视频会晤时，将其对两国关系的愿景视为简单、直接的竞争（simple, straightforward competition）^[23]。2024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利马会晤中，鲜明地指出大国竞争不是时代底色，团结协作才能共克时艰。然而，在会晤中拜登总统仍然强调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24]。这些现象显示出中美两国对于双边关系定位的根本性差异。

第三，在具体议题领域，美国运用各种新兴话题制造标签指责中国，为其在各领域开展对华竞争制造舆论。在贸易关系议题中，美国政府无理指责中国存在非市场经济行为，声称美国对华大规模贸易逆差是两国经贸关系不公平的表现，并要求中国在经贸问题上让步。2017 年 11 月，特朗普访问北京期间，着重提及两国贸易关系存在所谓“失衡”（out of kilter），声称美国需要让对华贸易更加公平^[25]。在技术议题中，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概念，以中国“剽窃”先进技术并威胁其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2024 年 1 月，沙利文与王毅在曼谷会晤中提出，美国将继续通过“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的做法，在科技领域实现“去风险化”（De-risking）^[26]。在人权议题中，美国政府持续污名化中国，编造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人进行“监禁”等谬论。2023 年 11 月旧金山会晤期间，拜登强调所有国家尊重国际人权承诺的责任，并声称对包括新疆、西藏和香港在内的中国所谓“侵犯”人权的表示关切^[27]。在违禁品管控议题中，美国政府片面地将美国社会面临的芬太尼滥用问题归咎于中国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出口。2023 年 10 月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访华期间，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与美国合作阻止造成芬太尼危机的前体化学品流入。通过贴标签、制造新概念等方式，美国政府在多个议题领域开展对华负面话语叙事并提出不合理诉求，妄图迫使中国政府在多项污名化叙事中陷入被动解释的恶性

张建, 姜星宇.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演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15-131.

循环, 达到遏制中国的最终目的。

（二）中国对美外交话语叙事的演进

为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新挑战, 中国政府在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中继续明确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 通过坚持和运用红线观, 为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设置“防护栏和安全网”。在划好红线的前提下, 中国政府坚定驳斥美国政府为遏制中国而设置的话语陷阱, 主动对美方的错误行径展开批评, 通过对美外交话语叙事获得中美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第一, 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叙事具有连贯性, 中国政府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新形势下坚定践行红线观。2024 年 11 月, 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利马会晤时, 将“不能挑战红线、底线”作为中美两国过去 4 年的经验和启示之一进行强调, 并再次重申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 4 条红线, 不容挑战。中国政府明确表达维护核心利益的决心, 反对美方介入和干涉。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 台湾问题的解决面临美国的外部势力干涉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阻扰。国家统一事关中国发展全局, 包含人民群众的期待,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在面对美国政府“对台六项保证”等政策表述以及对台大规模军售等政策行动时, 中方始终强调台湾问题作为核心利益的重要性, 展现出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2022 年 11 月, 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与拜登总统会晤期间, 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美国不能也不应逾越的红线。在涉疆、涉藏等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和民主人权的问题上, 中国同样面临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内部分裂势力的侵扰。为确保边疆地区的安全与和平发展权利、不断提高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人权保障水平, 中国同样将上述议题领域界定为核心利益与不容挑战的红线, 坚决反对任何侵犯中国人民发展权利和民主人权的行为。2019 年 8 月, 王毅会见蓬佩奥, 就南海、涉疆、涉港等问题表明中方立场, 要求美方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28]。由此可见, 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具有复杂多样的内涵, 强调国家核心利益有助于为中国外交设置底线和红线,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第二,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的对华污名化叙事及话语陷阱, 敦促其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美国政府执意以竞争定义和塑造中美关系, 中方则拒绝错误的竞争叙事, 坚持中美两国必须找到正确相处之道。2023 年 11 月旧金山会晤期间, 习近平主席重点指出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 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有力批驳了美国的竞争叙事^[29]。针对 2024 年 4 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访华期间指责中国“产能过剩”^[3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双方会晤中, 强调美方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 从经济规律出发, 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31]。中国外交部、国家发改委随后相继发表声明, 深刻指出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只是为保护主义提供借口, 目的在于限制中国产品出口^[32]。针对美国政府及学术界预言中美关系将步入“修昔底德陷阱”、声称中国必将争霸, 2024 年 8 月王毅会见沙利文时, 明确指出美方不能用自己走过的道路臆测中国, 反对通过国强必霸的模板镜像中国^[33]。通过对美方对华负面话语叙事的澄清与反驳, 中国政府有效缓解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和误解, 进一步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发展利益。

第三, 中方主动对美方的错误行径进行明确批评, 揭穿美国政府的道德伪装。针对美国政府在本国国内治理无力、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污名化中国各项发展成就的“双重标准”行为, 中国政府进行了妥善澄清和严肃批评。美国国内爆发的弗洛伊德事件显示出美国政府和社会漠视人权的深层次

问题，在 2021 年 3 月中美安克雷奇对话期间，杨洁篪在开场白中特别提到“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认为美国在人权方面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美方应首先管好自己的事^[34]。美国为转嫁国内经济发展滞缓、社会矛盾激增的挑战，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的经贸和科技产业进行打压，中国政府明确指出其打压行为的非正义性。2024 年 8 月王毅在与沙利文会晤时，深刻指出国家安全需要有明确边界，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更要科学界定，美方应停止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停止损害中方正当利益。拜登政府多次作出不支持“台独”承诺后，仍然加紧美台军事勾连和对台军售，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并多次敦促美方妥善落实相关政治承诺。2024 年 2 月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与布林肯会晤，强调美方应将拜登总统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体现在具体行动中。中国对美方错误行径和“双重标准”行为的严正批评，向两国人民与国际社会揭示了美国政府对华负面话语叙事下掩盖的遏制中国目的，有效反制了美国政府遏制、打压中国的各项政策行为。

（三）中美双方更加强调风险管控的重要性

自美国挑起对华战略竞争以来，中美外交互动过程中的分歧不断增加，两国爆发危机乃至冲突的风险也有所增加。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的全球影响力及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使得中美之间的冲突不仅会损害两国利益，也会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造成深刻影响，突显出中美风险管控的必要性。中美两国具有进行危机处理和风险管控的成功案例。因此，在不同层级高层战略互动中，中美双方涉及风险管控的话语叙事不断增加，普遍强调双边关系面临的风险以及管控风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具体来看，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由于 2020 年 1 月国会山骚乱爆发，美国国内面临民主危机，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控性持续增加。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美国大选前及政府政权交接前两次和中国军方通话，向中国军方将领保证美国军队不会对中国发动袭击，以缓解紧张的中美关系局势。拜登政府更加重视中美双方的危机管控，通过构建管理竞争的对华话语叙事，谋求在延续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避免冲突爆发。由于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等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两国危机管理机制和接触渠道一度陷入停摆，中美关系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在此形势下，拜登在多个外交场合不断针对作为中国核心利益的各项红线进行表态，以求降低中美关系中的潜在风险。在 2021 年 11 月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时，拜登提出“四不一无意”承诺，指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在 2022 年 11 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时，拜登再次提出“五不四无意”承诺，在原先基础上增加了“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等内容。2024 年 11 月利马会晤期间，拜登继续强调“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不会利用台湾问题同中国竞争”。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的同时重视承担国际责任，乐见中美关系平稳顺利发展。2024 年 8 月沙利文访华期间，王毅指出，中美两国要避免冲突对抗，关键在于遵守三个联合公报^[35]。2024 年 11 月利马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通过划定中方在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方面的 4 条红线，设置了管控风险的防护栏。

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以及风险管控叙事增加的背景下，中美双方运转多个涉及危机管理的互动

张建, 姜星宇.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演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15-131.

机制, 在两国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和不必要冲突的建设性作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 中美两军在 2020 年 10 月举行危机沟通工作组视频会议, 对中美安全形势进行交流和风险评估。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中美两军在 2021 年 12 月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等具体事项^[36]。2024 年 4 月, 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 2024 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对 2021 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评估。这些举措反映出中美双方妥善处理矛盾与分歧的积极态度。

四、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

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与话语叙事的新态势是国际、双边和国内各层次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双边互动的产生、重启或中断、取消, 显示出中美关系演进的曲折性和波动性。

(一) 国际形势变化因素

作为全球性大国, 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受到国际形势等外部因素变化的广泛牵动, 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也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转变。

第一, 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促使中美双方密切互动, 重视了解彼此的立场与意见。尽管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国际事务采取单边主义政策, 但在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上依然重视中国的意见。在朝核问题上, 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抛出所谓“中国责任论”, 声称中国在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和解决朝核问题上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通过中美元首双边会晤和元首通话等多种形式, 特朗普强调美方感谢并高度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37]。拜登总统则多次与习近平主席就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多个地缘政治议题进行沟通, 主张中国应在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同样重视美国的作用, 希望通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全球和平发展注入强心剂。2023 年 11 月旧金山会晤期间, 习近平主席着重提到, 中美应该做表率,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向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美沟通更加密切, 反映出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然而, 美国敦促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要求仍然是基于挑拨中俄关系等遏制中国的考量展开, 具有对华战略竞争的本质特征。

第二, 新兴议题促使中美两国建立或重启互动机制。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 面对新冠疫情, 特朗普在疫情初期高度赞扬中国政府的抗疫努力。2020 年 2 月和 3 月,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两次通电话, 表示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抗击疫情, 愿通过双边和世卫组织渠道同中方保持沟通合作^[38]。拜登政府上台后, 关注气候变化和美国国内芬太尼滥用等议题。美国政府领导人及高级官员多次表态希望与中国在上述新兴议题加强合作。2023 年 10 月,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率领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时, 特别提及对芬太尼的管控合作。2023 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 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重启合作, 协调打击包括芬太尼在内的非法合成药物的全球制造和贩运^[39]。新兴议题的多边性质促使中美两国向对方靠拢, 在多个议题中协调合作。

第三, 国际形势的变化加深了中美两国的误解, 影响互动正常开展。中美两国的利益分歧决定了双方对同一议题存在不同看法。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上台后, 在南海问题上对待中国的态度越发

强硬，企图通过加强美菲同盟关系在南海谋取不正当利益。美国政府多次介入南海问题，污名化中国对南海合法合理的领土主权诉求。2023 年 10 月，王毅访问华盛顿期间，沙利文在会谈中无理指责中国在南海采取所谓危险和非法的行动，宣称美国在南海拥有航行自由的权利，为菲律宾站台^[40]。面对美菲等国对中国主权利益的漠视和侵害，中国政府进行了严肃驳斥。2024 年 8 月王毅与沙利文会晤期间，指出中国坚定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敦促美国不得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支持纵容菲律宾采取侵权行为。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忽视不同国家合理的安全诉求，抛弃劝和促谈的正确解决手段，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对华进行政治打压，拜登政府多次杜撰中国援助俄罗斯的谣言。例如 2024 年 8 月沙利文与张又侠会晤期间，提到所谓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担忧”，试图迫使中国对俄乌冲突承担责任。对此，中国政府明确反对美方的话语陷阱。王毅在 2024 年 7 月与布林肯会晤、8 月与沙利文会晤时，两次强调中国不会和美国一样直接向冲突方提供武器。中美双方在多个议题领域的分歧，激化了双边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并通过话语叙事和高层战略互动的变化表现出来。

（二）国内政治因素

外交战略及政策是国内政治与国家利益的深刻反映，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也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

第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偏好影响双边互动的走向与互动机制的生命力。不同届、不同党派的美政府往往对于同一议题具有不同的政策倾向。这种对华战略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中美双边互动的议题设置，决定互动机制能否正常开展。为转嫁美国经济发展滞缓的危机、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特朗普多次将实现双赢的中美经贸关系歪曲为中国单方面受益的不平等关系，试图获得发动贸易战的“合法性”支持。2020 年 5 月，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涉华演讲诋毁中国，并借此批评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此外，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于气候变化议题采取漠视和质疑的态度，不仅在上台后退出《巴黎协议》，在中美外交互动的过程中也很少提及双边气候合作。拜登政府上台后，将气候合作视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事项。美国高级官员多次强调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中美高层官员在双边和多边场合频繁进行气候议题会晤和政策沟通，取得了有益的政策成果。2023 年 11 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通过两次会谈发布《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决定启动“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这一新的气候变化合作机制^[41]，推动中美气候合作常态化。随着特朗普政府重返执政，其在中美经贸议题的重视和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议题的漠视必将深刻转变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和叙事的重点，进而影响中美互动的走向与相关外交互动机制的生命力。

第二，国内政治压力促使美国政府调整外交互动模式及对华话语叙事。维持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美国人民乐见的结果。美国国内研究民众对外交事务态度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倾向于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克制和不干涉主义，44%的受访者认为避免与中国开战比台湾地区的所谓“自治”更重要，79%的受访者认为只有在美国受到“直接威胁”时才支持进行军事干预^[42]。美国民众在外交事务上的孤立主义态度，一定程度上促使拜登政府追求管控中美冲突。然而，美国政府倾向于通过塑造外部假想敌的方式，将本国政府政策失败造成的恶劣结果归咎于外部势力，以重获国内民众的支持。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错误的防疫政策引起民众的极大

张建, 姜星宇.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演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15-131.

不满。为推卸政府责任、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 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一改疫情初期赞扬中国抗疫行动的话语叙事, 污名化新冠病毒为所谓“中国病毒”“武汉病毒”, 谬称中国应为疫情传播“承担责任、进行赔偿”。

第三, 中国坚持和践行红线观是开展高层战略互动及话语叙事的关键准则。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高度不确定的美国对华外交, 中国政府始终秉持外交为民理念, 从国家利益出发, 通过运用红线观指导对美高层战略互动及话语叙事。2023 年 11 月旧金山会晤期间,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国有必须维护的利益、必须捍卫的原则、必须坚守的底线。中美两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应该充分利用各领域机制开展合作。2024 年 9 月, 依照旧金山元首会晤的共识,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男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 (Samuel Paparo) 举行战区领导间视频通话, 对于避免一线部队的误判和冲突爆发具有重要作用。在美方政策行动与话语叙事严重侵犯中国设置的红线时, 中国政府敢于中断双边高层战略互动, 通过明确的信号回应美方的不正当行为。针对美国政府持续对台军售、挑衅台湾问题这条红线的行为, 中国政府宣布暂停与美方商谈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 明确表示尊重中方核心利益是中美双边交流对话的前提。2024 年 11 月, 中国拒绝在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举行中美国防部长会晤, 明确指出美方不能一边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 一边与中国军队若无其事地开展交流^[43]。中国对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和对双边共同利益的有效把握, 是助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 突发事件因素

突发性事件容易在短时间内造成两国矛盾螺旋式上升。突发性事件有可能引发矛盾激化与误解产生, 致使相关互动机制陷入停滞、合作难以开展。当外交政策制定者认为某一突发性事件已经危及或损害国家核心利益时, 政府领导人及高级官员倾向于对该事件做出强硬回应, 通过严肃的外交话语传递本国政府所设置的红线与底线, 并采取外交行动进行反制。

2022 年 8 月, 佩洛西不顾中方事先的严正交涉与警告, 执意窜台, 损害中国主权安全这一核心利益。事件发生后, 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采取了反制措施, 暂停包括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等多个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与合作机制, 对这一挑衅行为进行强硬反制^[44]。2023 年 2 月, 美国政府不顾中方多次交涉, 执意使用武力袭击误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 引发中美关系急剧紧张。同月, 美国参议院不顾“飞艇事件”的事实真相, 迅速通过决议污名化中国民用设备从事所谓间谍任务, 进一步加深美国国内社会对该事件的误解。事件发生后, 布林肯迅速推迟了原定访华行程, 与王毅在同月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进行非正式接触。接触期间, 王毅严正要求美方正视并解决滥用武力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同时, 双方都强调了保持外交对话和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希望避免这一事件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45]。而原本拟定的布林肯访华行程直到 2023 年 6 月才得以成行。由此可见, 突发性事件能在短时间内对双边关系和互动态势造成深刻影响。

五、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效用评估

中美两国元首及政府高级官员间的外交互动对于构建本国外交战略与政策、促进双边和多边合作具有重要作用。构建符合国家利益、阐明国家红线观的话语叙事, 维持中美高层战略互动正常开

展，有利于管控风险、为中国和平崛起塑造有利外部环境。

（一）回应国内外利益关切

高层战略互动回应了国内外利益关切。高层战略互动发布的各种声明、公报以及外交官员发表的言论共同形成本国政府的逻辑依据。国际社会、国内民众的理解是政府实行政策的必要基础，话语叙事通过说服民众，降低了政策行动的实施成本，有利于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中国在中美高层战略互动中，多次向美方阐述了中国致力于和平崛起、不谋求取代美方地位的战略规划，塑造了热爱和平、积极追求国际合作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的话语权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国内的中美“冷战”和“修昔底德陷阱”叙事，使得中美两国能够有效避免冲突。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国政府针对台湾问题的话语表述始终严肃而清晰。佩洛西窜台后，中国政府发布《佩洛西窜台的若干事实》，严正回顾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法理事实，再次强调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信心与决心。中国各层级外交官员也在多个时间、多个场合批驳佩洛西窜台行为，为维护中国国家统一和出台相关反制措施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针对美国政府设置的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等同的话语叙事^[46]，中国政府进行了严肃和详细的批驳，阐明中方开展军事演习活动和反制措施的合理合法基础。这体现了话语叙事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帮助外交政策行动有效开展的重要作用。

（二）扩大双边与多边合作

高层战略互动有利于双方形成稳定的合作共识和习惯，扩大双边合作空间和共同利益。第一，高层战略互动有利于双方增进了解，塑造能够与对方合作的认知。中美两国关系容易因分歧和误解陷入矛盾，使得双边合作停滞。因此，双边合作的维持需要双方保持能够进行合作的共识，保留进行合作的有利空间。高层战略互动过程中积累的沟通交流经验，能够增加双方保持合作的信心，并为开展各种互动机制提供可靠的行动路径。旧金山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是从 50 年中美关系历程中提炼出的经验，也是历史上大国冲突带来的启示，应该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中美元首会晤塑造的合作精神，一直为双方各层级高层战略互动指明方向，有效增强了双边合作的韧性。

第二，高层战略互动及话语沟通有助于塑造彼此对双边关系的定位，在战略层面推动对彼此认知的转向。2021 年 3 月中美安克雷奇对话中，杨洁篪严正批驳了美方所谓“以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对话”的思维模式，严肃指出美国政府仍然存在以强权政治开展对华关系、以不平等的姿态看待中美关系的错误认知。随着中美高层战略沟通的深入，2024 年 8 月沙利文与王毅会晤后，在声明中同意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对方，显示美方正逐步接受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的基础上开展中美交往，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出现微妙转变。

第三，高层战略互动及话语叙事传递了中美两国加强国际合作的信号，有助于破解全球治理困境。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美两国需要在该领域加强沟通，降低人工智能应用对关键基础设施、全球公共安全、军事冲突升级等带来的风险，为其他国家奠定达成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协定的基础。2024 年 5 月，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双方围绕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等问题深入、专业、建设性地交换意见^[47]，增进了对彼此相关领域做法的理解。围绕人工智能的中美高层战略互动，有利于建立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人工智能

张建, 姜星宇.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演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15-131.

公共知识体系, 降低先进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诸多全球性风险, 填补当前国际社会存在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真空局面。

六、结语

自美国政府开展对华战略竞争以来, 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面临严重压力, 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在此期间发挥了维持战略稳定、弥合误解与分歧的重要作用。然而, 中美外交互动机制容易受到突发性事件的影响而中断。双边互动和话语叙事的具体成效不够显著, 美国对华战略中顽固的冷战思维和权力政治叙事决定了其对华认知难以仅通过高层战略互动得到彻底改变。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到来,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中美高层战略互动迎来新变化, 值得继续关注和警惕。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仍然将围绕对华战略竞争的轨道塑造对华关系, 由此深刻影响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话语叙事的开展。一方面, 特朗普具有在任期内留下外交遗产的政策动机, 和习近平主席有多次会晤的先例, 特朗普政府具备继续开展中美高层战略互动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 特朗普政府强制主义、极限施压的外交风格和其在人文交流、经贸问题等事务上与中国的分歧, 将进一步提高双边关系与外交互动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 未来中美关系仍将在包含分歧与合作的矛盾关系中徘徊前行。

面对这一新形势, 中方应当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坚定践行红线观的同时, 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首先, 坚持发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在增进双边合作、预防管控危机方面的重要作用。稳定的互动机制能够培养中美两国的合作共识, 要在具体议题之上的更宏观层面不断促进双边互动。其次, 重视中美地方层面的外事互动与二轨外交的作用, 通过全面开展中美各层级的外交互动来增加中美关系的韧性。中美战略学术界等民间团体为中美两国了解彼此战略构想和政策意图提供智力支持, 要增强双方学术界交流互动。2024 年 3 月,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回应他们所关心的中美关系议题。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则表态支持美中双方加强各层级交往交流, 增进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48]。广泛的民间交流能够向美国社会传达更多中国声音, 澄清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最后, 主动加强对美外交互动中的合法性叙事构建, 通过专业知识和逻辑揭示美方的话语陷阱、反驳对华负面叙事。要更好、更快、更多地对美开展中国和平崛起的合法性叙事, 努力将中美关系框定在合作与良性竞争的合理轨道上, 降低中美两国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同时, 要积极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外交话语叙事,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敢于表达对全球事务的中国态度, 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 [1] 王浩.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及其互动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 (3): 47-69+156-157.
- [2] 沈国兵. 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和新动向 [J]. 国际商务研究, 2019 (3): 5-15.
- [3] 杨洁勉. 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 经验、教训和前景 [J]. 美国研究, 2018 (4): 10-22+5.
- [4] 山秀蕾, 刘昌明. 话语转向、安全叙事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 [J]. 太平洋学报, 2023 (7): 31-44.

- [5] 张建. 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79-89.
- [6] 曹德军. 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叙事——中美外交话语博弈及其叙事剧本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 (5): 51-79+157-158.
- [7]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利马举行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4-11-18 (1).
- [8] 杨洁篪、王毅同布林肯、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EB/OL]. (2021-03-20) [2024-07-07].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103/t20210320_9136632.shtml.
- [9]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2-11-15 (1).
- [10]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NSC Spokesperson Sean Savett 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Trip to Beijing, China [EB/OL]. (2024-08-23) [2024-08-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8/23/statement-by-nsc-spokesperson-sean-savett-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trip-to-beijing-china/>.
- [11] White House. Readout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Meeting with Vic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Zhang Youx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4-08-28) [2024-09-0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8/28/readout-of-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meeting-with-vice-chairman-of-the-central-military-commission-zhang-youxia-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 [12] 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EB/OL]. (2021-04-18) [2024-08-17].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18/content_5600381.htm.
- [1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China Joint Glasgow Declaration on Enhancing Climate Action in the 2020s [EB/OL]. (2021-11-10) [2024-08-17]. <https://www.state.gov/u-s-china-joint-glasgow-declaration-on-enhancing-climate-action-in-the-2020s/>.
- [14] 王毅介绍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情况 [EB/OL]. (2017-04-08) [2024-09-07].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1704/t20170408_9360776.shtml.
- [15] 中美商贸工作组举行第一次副部长级会议 [EB/OL]. (2024-04-03) [2024-09-07]. <http://file.mofcom.gov.cn/article/syxwfb/202404/20240403488595.shtml>.
- [16] 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EB/OL]. (2022-08-05) [2024-07-13]. 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zcjd/202208/t20220805_10735604.shtml.
- [17] 习近平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 [N]. 人民日报, 2023-11-17 (1).
- [18] 曹德军. 理解战略叙事: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武器与修辞策略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114-119.
- [19] National Archiv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B/OL]. (2017-12-18) [2024-08-03].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20] National Archives.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EB/OL]. [2024-08-05].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

张建, 姜星宇.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演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15-131.

- 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 [21] Foreign Affairs.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 [EB/OL]. (2023-10-24) [2024-08-0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sources-american-power-biden-jake-sullivan>.
- [22] Washington Post. China tells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stop its ‘misguided’ actions and allegations [EB/OL]. (2018-10-08) [2024-08-0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china-tells-trump-administration-to-stop-its-misguided-actions-and-allegations/2018/10/08/cd17c926-cac1-11e8-a85c-0bbe30c19e8f_story.html.
- [23]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Virtual Meeting [EB/OL]. (2021-11-15) [2024-08-0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15/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president-xi-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before-virtual-meeting/>.
- [24]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 Lima, Peru [EB/OL]. (2024-11-16) [2024-11-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4/11/16/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before-bilateral-meeting-lima-peru/>.
- [25] National Archives.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of China Before Expanded Bilateral Meeting | Beijing, China [EB/OL]. (2017-11-09) [2024-08-0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esident-xi-china-expanded-bilateral-meeting-beijing-china/>.
- [26] White House. Background Press Call on APNSA Jake Sullivan’s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4-01-27) [2024-08-1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4/01/27/background-press-call-on-apnsa-jake-sullivans-meeting-with-foreign-minister-wang-yi-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 [27]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Joe Biden’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3-11-15) [2024-08-1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1/15/readout-of-president-joe-bidens-meeting-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2/>.
- [28] 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EB/OL]. (2019-08-01) [2024-08-11]. https://www.mfa.gov.cn/wjbz_673089/zyhd_673091/201908/t20190801_7472252.shtml#:~:text=%E5%BD%93%E5%9C%B0%E6%97%B6%E9%97%B42019%E5%B9%B48.
- [29]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3-11-17 (1).
- [30]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to Travel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4-04-02) [2024-08-11].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2218>, April 2, 2024.
- [31] 李强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EB/OL]. (2024-04-07) [2025-01-02]. https://www.fmprc.gov.cn/wjdt_

- 674879/gjldrhd_674881/202404/t20240407_11277519.shtml.
- [32] 以“产能过剩”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损害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 [EB/OL]. (2024-05-03) [2024-08-11]. https://www.ndrc.gov.cn/xwdt/ztl/jxpl/202405/t20240521_1386910.html.
- [33] 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战略沟通 [EB/OL]. (2024-08-28) [2024-08-25]. https://www.mfa.gov.cn/web/wjzb_673089/xghd_673097/202408/t20240828_11480627.shtml#:~:text=2024%E5%B9%B48%E6%9C%8827%E6%97%A5.
- [3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Director Yang And State Councilor Wang At the Top of Their Meeting [EB/OL]. (2021-03-18) [2024-08-1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chinese-director-of-the-office-of-the-central-commission-for-foreign-affairs-yang-jiechi-and-chinese-state-councilor-wang-yi-at-th/>.
- [35] 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 [EB/OL]. (2023-09-17) [2024-08-11]. 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309/t20230917_11144257.shtml#:~:text=%E5%BD%93%E5%9C%B0%E6%97%B6%E9%97%B42023%E5%B9%B49.
- [36] 国防部介绍 2021 年度中美两军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情况 [EB/OL]. (2021-12-30) [2024-08-11]. <http://www.mod.gov.cn/gfbw/qwfb/4901933.html>.
- [37]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 [N]. 人民日报, 2019-06-30 (1).
- [38]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N]. 人民日报, 2020-02-08 (1).
- [3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Launch of United States-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unter narcotics Working Group [EB/OL]. (2024-02-01) [2024-08-14]. <https://www.state.gov/launch-of-united-states-peoples-republic-of-china-counternarcotics-working-group/>.
- [40] White House. Readout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ssion and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EB/OL]. (2023-10-27) [2024-08-1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0/27/readout-of-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meeting-with-peoples-republic-of-china-director-of-the-office-of-the-foreign-affairs-commission-and-foreign-minister-wang-yi/>.
- [41] 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 [EB/OL]. (2023-11-15) [2024-08-14].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11/t20231115_1056452.shtml.
- [42]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Americans Continue to Say the US Should Stay Impartial in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EB/OL]. (2024-02-28) [2024-08-25]. <https://globalaffairs.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americans-continue-say-us-should-stay-impartial-israeli-palestinian>.
- [43] 林剑: 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商谈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 [EB/OL]. (2024-07-17) [2024-08-17]. https://www.mfa.gov.cn/web/sp_683685/wjbfyrlxjzh_683691/202407/t20240717_11455456.shtml.
- [44] 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EB/OL]. (2022-08-05) [2024-08-25]. <https://www.mfa.gov.cn/>

张建, 姜星宇.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高层战略互动及其话语叙事的演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15-131.

web/wjdt_674879/zcjd/202208/t20220805_10735604.shtml.

[45] 王毅就飞艇事件向美方表明立场 [EB/OL]. (2023-02-19) [2024-08-25]. 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2/t20230219_11027107.shtml.

[46] Representative Nancy Pelosi. Pelosi Statement Marking One Year Since Historic Visit to Taiwan [EB/OL]. (2023-08-02) [2024-08-25]. <https://pelosi.house.gov/news/press-releases/pelosi-statement-marking-one-year-since-historic-visit-to-taiwan>.

[47] White House. Statement from NSC Spokesperson Adrienne Watson on the U.S.-PRC Talks on AI Risk and Safety [EB/OL]. (2024-05-15) [2024-08-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5/15/statement-from-nsc-spokesperson-adrienne-watson-on-the-u-s-prc-talks-on-ai-risk-and-safety-2/>.

[48] 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N]. 人民日报, 2024-03-28 (1).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王京菁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 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徐政¹ 宁尚通²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9;

2.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 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发展新质生产力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相辅相成: 国家安全稳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的环境,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物质技术支撑, 体现了发展与安全的高度统一。在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下,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 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在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以应对复杂挑战情形,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深化改革与优化治理以稳固社会发展环境。总体国家安全观赋能新质生产力具有内在逻辑, 包括: 总体性布局保障产业供应链体系高效稳定运行, 数字信息安全驱动生产力变革升级与科技创新, 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生产力实现高质量转型。当前, 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核心技术自主性障碍、绿色发展困境、高端人才匮乏、制度保障滞后等困境。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升综合防控能力、夯实人才基础和优化制度环境, 以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1.011

作者简介: 徐政,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 河北省重点高端智库“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 宁尚通,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江苏省全省党校系统调研课题“江苏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研究”(XT24015); 2024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重点资助项目“江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路径研究”(24SYA-019)

引用格式: 徐政, 宁尚通.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32-142.

更好筑牢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生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5) 01-0132-11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基础。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由与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构成，而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态则是在经济基础之上构建的相应结构^[1]。同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亦需依托于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生产力水平作为衡量物质技术基础的关键指标，不仅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而且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国际竞争加剧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重大挑战，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安全稳定的创新环境。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国针对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新态势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力回应。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把握正确的方向，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高端核心技术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而科技封锁使我国科技领域面临“卡脖子”风险，给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带来了压力。除了外部安全压力，内部安全也存在挑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造业“内卷式”竞争、就业结构性矛盾等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仍然存在。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稍纵即逝，中国如果不能迅速抢占新兴产业领域的制高点将面临被动局面。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在眉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助力我国应对国际挑战、解决当下燃眉之急，保障国内社会安全稳定，推动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这体现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相辅相成：国家安全稳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的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物质技术支撑，体现了发展与安全的高度统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在巩固和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宏观视野下，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这对于国家整体实力的系统整合与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当前学界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学理化阐释以及创新赋能作用等方面，缺少新质生产力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忽视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的协同关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因此，本文将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经历深刻变革的当下，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内源性和外生性风险，促使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扩展与重构^[3]。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的以军事国防为核心的安全观，已难以指导现代化情景中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提出了一个全面、系统、协调的安全战略，旨在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国家安全体系。新质生产力不仅直接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更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它凝聚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最新成就，成为推动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关键动力，对于维护和增强总体国家安全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以应对复杂挑战情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2]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战略转折点，这一时期既要解决高速现代化下累积的问题、舒缓经济结构性转型的阵痛，又要培育新兴增长动能。在这一系列的转型与调整过程中，影响国家安全的危险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4]。若不能对当前的国家安全形势进行准确判断，及时识别、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那么原本可控的风险就有可能演变为不可控的突发性事件，处于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风险会转化为政治风险甚至是全局危机，最终威胁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安全。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正致力于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这一过程不仅要深入分析并综合考量“两个大局”的交织互动，还需要准确判断国家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任务。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推动国际政治从传统的“地缘政治时代”迈向“技术政治时代”^[5]。从这个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新权力领域，诸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等九大未来产业，它们已经成为大国竞争和博弈的前沿领域。这些领域不仅涉及战略理念的更新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且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系统性工程，是国家应对复杂安全风险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技术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促进产业的深度转型和升级。这不仅涉及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要求对国家治理能力进行整体性赋能，以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挑战。通过系统性赋能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和安全提供坚实的支撑。

（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6]，这一观点与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和“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论述相辅相成^[2]，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根本遵循和行动蓝图。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7]。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新质

徐政, 宁尚通.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32-142.

生产力的驱动和支撑,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 国家安全的内涵已经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扩展到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多个维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对于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升国家的科技竞争力、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 还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全局性、长远性、先导性和支柱性的作用, 对于维护国家的产业链安全、减少对外部关键技术的依赖具有决定性影响。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方式, 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从传统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进而增强国家在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 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 深化改革与优化治理以稳固社会发展环境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 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首先, 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能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升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增强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离不开完备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增强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借助现代化产业体系带来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为国家治理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和水平。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可提升国家治理的精准有效性。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及未来产业的布局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 能够促进就业、改善民生,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进而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公共服务的高效化、社会管理的精细化, 这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稳固社会发展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 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构建了稳固的安全屏障, 保护了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 总体性布局保障产业供应链体系高效稳定运行

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价值理念上追求整体性、全局性安全的目标导向^[8]。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统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效稳定运行, 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总体性布局能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有效应对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风险, 保障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建设，能够确保科研领域的关键环节不受制于人。具体而言，通过支持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可以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进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格局，能够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总体国家安全观秉持国际合作与开放发展的理念^[9]。积极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多边合作和协调发展能够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抵抗风险的能力，保障经济稳定发展。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风险显著增加。特别是在疫情等突发事件以及地缘政治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国际供应链暴露出脆弱性^[10]。全球化使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孤立地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提升各国的经济实力。要将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用以提升国内产业的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多边合作建立起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也提升了供应链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

（二）数字信息安全驱动生产力变革升级与科技创新

数字信息安全是推动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变革升级的重要保障。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生产力的形态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数字信息安全是保障生产过程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在智能化生产过程中，数据要素贯穿生产过程始终，生产设备与智能系统的互联互通使得生产过程更加高效灵活。然而，高度的智能化生产也会存在安全隐患，随着网络攻击手段的不断升级，黑客会通过网络攻击侵入生产系统，严重干扰生产。期间数据的篡改、泄露或丢失会导致生产中断、效率降低，甚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运用区块链技术采取加强数字信息安全的措施来防止网络攻击，能够确保生产设备和系统的正常运行，保障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升生产力水平。企业通过加强数字信息安全可以有效保护客户的数据隐私，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在科技创新和生产力提升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数字信息安全对科技创新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政府制定数字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为科技创新活动构建起安全稳定的环境，数据的完整性得到保护，进而提升科研结果的准确性。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机构在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信息共享，进行协同创新，共同推动跨学科研究，能够进一步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产生新的科研成果。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新的安全威胁也促使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技术创新。区块链技术作为近年来数字信息安全领域的重大创新之一，凭借加密技术提供的数据存储和传输方式，增强了数据的安全性，推动了金融、物流等领域的创新发展。比如在金融领域，区块链技术广泛应用于数字货币、支付等方面，提高了交易的安全性和效率；在物流领域，区块链技术被运用于供应链管理，确保了物流信息的透明性。

（三）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生产力实现高质量转型

可持续性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理念之一，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传统生产力高质量转型。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8]，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绿色技术的

徐政, 宁尚通.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32-142.

推广应用能够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提高资源利用率, 实现降本增效。具体而言,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 在工业生产领域更加重视环境安全, 采用新型节能环保生产设备, 对生产工艺绿色化升级, 以新能源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 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危害; 在农业生产领域更加重视生态安全, 绿色有机肥料和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能够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保护土壤及水资源, 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在服务业领域推动物流、金融的绿色发展显著提高了服务质量, 满足消费者对绿色服务的需求。

发展绿色产业等新兴产业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推动生产力的高质量转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下,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11]。在此期间, 政府制定有利于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包括从资金支持、技术指导和市场准入等方面打造绿色产业集群, 形成创新生态系统, 能有效推动经济和环境的协同发展。集约化生产体系能够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协同效应, 提高资源利用率。集群内企业之间紧密合作和信息共享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创新, 推动整个产业的升级, 实现生产力高质量转型。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困境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关乎国家竞争力,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我国在关键技术自主研发、高端人才培养以及制度保障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 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突破口。

(一) 核心技术自主性障碍: “卡脖子”技术的依赖与制约

习近平总书记曾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 “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 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 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 甚至会不堪一击。”^[12]近年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维护自身科技霸权, 通过出口限制和市场围堵等手段限制关键技术及产品对我国出口^[13], 对我国相关的高科技企业加以制裁和限制, 试图遏制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崛起, 尤其在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我国在某些关键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相对薄弱, 比如半导体领域。我国虽然在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在高端芯片制造和光刻机等方面存在“卡脖子”现象, 在面对国际技术封锁时, 难以迅速实现技术突破, 进而影响了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首先, 研发投入不足是导致“卡脖子”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2023 年我国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为 2.64%, 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明显偏低, 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资金, 社会资本在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偏低。研发投入不足影响技术创新的进展, 有的创新项目停滞不前, 使得我国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技术瓶颈。其次, 技术壁垒也是造成“卡脖子”现象的原因。比如, 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行业等领域需要持续的研究和长期的研发投入, 技术领先者在相关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比较完备的技术生态系统, 并采用申请专利等手段保护其技术成果。而我国在这些领域起步较晚, 技术积累相对薄弱, 导致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再次, 产业布局不协调也是造成“卡脖子”现象的原因。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 不同区域选择相同的热门行业一哄而上, 造成产业结构同质化倾向, 低水平的模仿使得当地科技领域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二）绿色发展困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难题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环境保护往往面临巨大挑战。我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经济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付出了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消耗的代价。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环保力度，推行绿色发展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其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面临困难。在新旧动能的转换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立”与“破”的关系，成为掣肘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领域仍占据重要地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企业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以及专业队伍建设方面缺少资金投入，导致企业在进行绿色转型时面临技术和人才的双重瓶颈。其二，市场机制未充分发挥作用。绿色金融、碳交易等手段的应用还不够广泛，绿色金融作为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新型金融工具，其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存在顶层设计不足、绿色金融产品短缺等问题^[14]，导致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激励和支持。碳市场作为新兴市场机制，碳配额分配的法律框架及具体制度发展较为迟缓^[15]，且市场覆盖面有限、交易活跃度不高、中小企业的市场参与度不够，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三）高端人才缺乏：人才培养与留存的双重困境

高端人才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我国在高端人才的培养和留存方面面临双重困境。一是人才培养方面。高端技术领域需要具备深厚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需要长期的教育和培训投入。当前人才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由于公共服务投入低，人才相对缺乏^[16]。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上，高校的课程设置仍然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课程和实验机会相对较少，学生缺乏参与创新实践的机会。教育评价体系更注重考试成绩而非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成果。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仍不够紧密，学生在校期间相对缺少进入企业实习和参与实际项目的机会，影响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二是人才流失问题。有的优秀人才选择到国外发展^[17]，优秀人才的流失会导致技术和智力资源的流失，可能会削弱国家的科研实力 and 创新能力。

（四）制度保障滞后：政策与法律适应性挑战

制度保障是进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在政策和法律的适应性方面仍存在一些挑战。其一，科技创新领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存在滞后性。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数据隐私、安全风险、伦理道德以及产权保护上会产生新的问题。制定新的政策能够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对确保科技发展健康有序至关重要。而政策的制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调研、讨论和审批，致使政策与实际需求之间可能存在脱节。其二，政策的实施过程也存在滞后性。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而资源的局限是政策实施的一大阻碍。地方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在执行政策时，资金、人员和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会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导致有的政策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其三，工作人员的理解偏差妨碍政策实施。工作人员在理解政策时出现偏差会导致政策在具体执行中走样，破坏政策的统一性。此外，频繁的政策变动可能使企业和科研机构难以适应，增加其运营风险，影响政策

徐政, 宁尚通.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32-142.

的长期成效, 导致企业和科研机构对政策的信任度下降, 进而削弱其创新积极性。其四, 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不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会严重打击创新积极性。知识产权保护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 但在实际操作中, 侵权行为不断升级, 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侵权行为为更加隐蔽, 而执法手段和技术更新速度较慢, 难以应对新型侵权行为。跨国侵权行为的增加也加大了知识产权的保护难度, 互联网的全球化使得侵权行为跨越国界, 而各国的法律法规具有差异, 使得跨国追责变得复杂。侵权行为不仅损害了创新者的合法权益, 也打击了他们的创新积极性。企业和个人因为担心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而不愿意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创新。

五、总体国家安全观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指向

突破发展新质生产力难题, 以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式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动能, 是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的坚实基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风险防控能力、夯实人才基础和优化制度环境, 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 确保我国社会安全稳定、经济平稳发展, 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确航向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全面领导能够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确航向, 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障。

第一, 党的全面领导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源投入, 离不开各部门协同合作和不同领域的跨界融合发展。在国家层面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 有利于保障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确保了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部署上的统一性, 数据、人才、资本等要素的联动发展也需要国家层面的协调推进。只有在党的领导下, 才能确保各项政策措施有效落实、形成合力, 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18]。

第二, 党的全面领导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科学理论阐明了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 为新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具体的指导方针。党中央始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明确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 为我国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第三, 党的全面领导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党的组织体系覆盖全国各地, 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来^[19]。各级党组织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能够形成强大的组织合力, 确保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序推进。在科技创新领域, 党组织在新兴科技创新型企业中设立党支部, 通过党建工作引导员工增强创新意识和责任感, 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 引领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 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科技创新型企业通过组织党建联盟能够整合产业上下游资源, 增

进企业协同作用，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保障经济安全^[20]。

（二）提升综合防控能力：维护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安全与稳定

加强对关键技术的保护能够确保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安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依赖于高新技术的应用，其中核心技术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因而要加强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工作。企业和科研机构应建立完善的技术保密制度并对员工进行保密教育，防止内部泄密。实施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对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核心技术进行出口限制，防止技术外流，同时加强对技术转移的监控和审查以确保技术转移过程安全。网络安全建设也是确保技术安全的重要手段。企业和科研机构应该加强网络安全保护，健全网络安全管理体系，采用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防止黑客入侵。政府要加强网络安全领域的监管，依法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稳定。

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风险。一是制定应急预案，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明确各类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确立责任分工是确保新质生产力在各种突发情况下稳定运行的前提。二是加强应急演练。应急演练对于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改进预案中的不足、提高应急响应的实际操作能力起到重要作用。要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模拟突发事件开展全方位的应急演练，确保各部门人员熟练掌握应急预案的内容和操作流程，在应急演练中提高工作人员的危机意识和应急技能，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三是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评估可能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风险。通过建立大数据分析平台，政府和企业能够整合来自不同渠道的海量数据，帮助决策者全面了解市场动态和技术发展趋势，及时察觉潜在的风险因素，确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制定应对策略。

（三）夯实人才基础：完善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完善的人才支撑体系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急需的“新素质”^[21]。

人才支撑体系包括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多个方面。完善人才支撑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加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首先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通过创新激励机制、加强跨学科教育和加强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在教学活动中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推动人才在实际应用中进行创新实践。其次要完善人才引进机制。政府和企业应提供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同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公平的薪酬体系和晋升机制，激励员工不断进取；表彰在科技创新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最后，合理使用人才是发挥人才最大效能的关键。政府和企业应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和使用机制，通过量化指标对人才进行评估，政企合作推动人才合理使用，帮助人才更好地发挥作用。

（四）优化制度环境：提升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

良好的制度环境对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尤为重要。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培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的政策支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创新活力。

一是制定和完善科技创新领域的法律法规，使其适应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政府制定并实施

徐政, 宁尚通.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32-142.

鼓励创新的政策, 推动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创新研发, 是提升全社会创新活力的重要手段。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 良好的创新生态是实现科技创新的基础, 可通过设立科研专项基金的方式支持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活动,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政策以鼓励其进行绿色技术改造, 激发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属性。原创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只有在稳定的政策环境下才能有效进行, 政府应减少政策的频繁变动, 为各创新主体创造一个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各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 促进各地区和部门对政策的理解一致, 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应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保护科研机构 and 企业的创新成果; 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负责知识产权的申请和保护。三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的重要举措。政府应通过政策协调来打破地区壁垒, 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这对促进资源流动、提高市场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3] 钟开斌. 构建新安全格局: 逻辑起点、理论指引与实践进路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 (19): 5-14.
- [4] 闪淳昌, 周玲, 秦绪坤, 等. 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现状、问题及解决路径 [J]. 公共管理评论, 2020 (2): 5-20.
- [5] 刘新, 曾立.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研究 [J]. 科学管理研究, 2023 (6): 11-17.
- [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1-11-17 (1).
-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 (1).
- [8] 何丽.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特征探析 [J]. 东岳论丛, 2024 (5): 141-147.
- [9] 凌胜利.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4 (4): 28-52+156-157.
- [10] 阙天舒, 闫姗姗. 美国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识别与韧性操作逻辑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4 (4): 106-130+159-160.
- [11] 毛艳华, 邱雪情, 荣健欣. 产业集群效应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广东省制造业集群的调研 [J]. 南方经济, 2024 (5): 150-166.
- [12] 习近平.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年4月19日) [N]. 人民日报, 2016-04-26 (2).
- [13] 罗党论, 张思宇, 杨文慧. 大基金与“卡脖子”行业发展——来自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J]. 南方经济, 2024 (6): 15-38.
- [14] 乔东, 徐凤敏, 李本初, 等. 绿色金融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研究现状与路径展望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3): 87-101.
- [15] 刘瑞, 冷罗生. “双碳”目标下中国碳配额分配法治化的优化路径 [J]. 河南社会科学, 2024 (7): 56-66.

- [16] 陈劲, 陈书洁.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键问题、现实逻辑与主要路径 [J]. 现代教育技术, 2024 (7): 5-12.
- [17] 陈鹏鑫, 何金廖, 曾刚, 等. 全球城市顶尖人才流动网络的空间格局与结构特征——基于 AI 顶尖人才成长流动轨迹数据 [J]. 地理科学, 2023 (12): 2069-2079.
- [18] 杨玉文.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 历史、经验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44-55.
- [19] 熊辉. 以党的建设科学化推进党的领导能力现代化探赜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1-10.
- [20] 吴新叶, 吕培进. 在“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之间: 基层党建联盟的活力空间 [J]. 学术界, 2021 (7): 83-94.
- [21] 蒲清平, 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1-11.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龚静阳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八大经验

焦洪昌 何智伟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25 年来，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民主政治有序推进，法治建设日益完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宪法与基本法、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安全与权利保障、“爱国者治澳”与政制发展、行政与立法、法律清理与法治建设、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这八对关系。澳门的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关键词：“一国两制”；澳门；宪法与基本法；全面管治权；高度自治权；“爱国者治澳”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1-0143-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出发，对“一国两制”、港澳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实现新发展、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2019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澳门地方虽小，但在‘一国两制’实践中作用独特。”^[1]2021 年 12 月 22 日，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时指出：“祖国始终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中央将继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继续支持澳门积极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不断书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1.012

作者简介：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参事；何智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焦洪昌，何智伟.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八大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143-156.

功实践新篇章。”^[2]2024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澳门回归祖国 25 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接续奋斗,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巨大成功。”^[3]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迎来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研究阐释“一国两制”澳门成功实践的经验,对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意义。

一、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2014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1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4]2017 年,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4] 435}2022 年,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再次指出:“‘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3]

“一国两制”方针的规范性内涵在于,“一国”强调主权行使,“两制”强调繁荣稳定和经济发展^[5],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权重差异,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的:“‘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6]“一国”与“两制”关系蕴含着三层含义:其一,“两制”没有变更我国的主权制度。在我国宪制之中,国家主权首先体现为宪法第 1 条所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第 2 条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政体、第 3 条第 4 款所规定的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两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否定、变更这些宪法规范,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制度之中。其二,中央政府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内行使主权,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中央管治权的相关规定之中。其三,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这主要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第 5 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第 6 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权”。一般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并不直接规定资本主义制度,只规定私有财产权。《澳门基本法》第 5 条用“否定+肯定”的^[7]双重保险方式,充分展示实行“一国两制”的坚定决心。

为解决澳门土地资源紧张等发展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发展,推动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2018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访问团时强调:“建设好大湾区,关键在创新”,“要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框架内,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流通”^{[1] 400}。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作用,首要的是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8]。澳门回归以来一直积极配合国家政策,主动和内地相关部门进行区际法治协商、协调与合作,完善区际法律法规,携手处理各种区际事务,为澳门居民融入大湾区生活创造便利条件。例如,有关方面出台了人才补贴政

焦洪昌, 何智伟.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八大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43-156.

策, 为到横琴工作的澳门居民提供住房、就业、创业、教育补贴。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 一直坚持融入国家整体发展的大局观, 与中央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关系^[9]。“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有力证明: “一国两制”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 符合澳门根本利益的好制度, 其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日益彰显; 广大澳门同胞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澳门; 伟大祖国始终是澳门的坚强后盾, 祖国日益昌盛为澳门繁荣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总之, “要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高于一切, 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 尊重‘两制’差异, 充分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 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确保不会变、不动摇, 确保不走样、不变形”^[3]。

二、正确处理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 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 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 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4]⁴³⁶2019年12月20日, 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 “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年来, 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秩序牢固确立, 治理体系日益完善。”^[1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在法律体系中居于至上的地位^[11]。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后, 宪法作为中国法律体系中位阶最高的法律, 对于香港、澳门而言同样是有效的法律。“一国”是宪法的一般条款, “两制”是宪法中的特殊条款。因此, 宪法中的“一国”适用于特别行政区, 宪法中的“两制”亦适用于特别行政区^[12]。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13], 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确认和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14]。根据《澳门基本法》第11条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基本法》的决定, 凡属于宪法第31条所指的内容, 并由基本法规范了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政策, 以基本法为准。相反, 基本法没有规范的, 就应该以宪法的规定为依据。因此, 宪法中的“一国”规范直接可以在特别行政区适用, 在特别行政区内任何违反宪法“一国”原则的行为都是无效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促进宪法的普及和适用。一是加强对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历任行政长官均强调要落实好“一国两制”, 大力宣传宪法和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团和学校持续推进宪法和基本法的普及教育, 致力于提升市民对宪法和基本法的理解, 将普法工作作为重点, 确保宣传和教育活动的内容与法律精神相符合。比如, 行政公职局、法务局、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等部门通过开设基本法培训课程及活动对公职人员进行教育, 举办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以及合办多项爱国教育及普法教育活动, 讲解《宪法》《澳门基本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法律知识。这种既面向全体市民又重点针对青少年、公职人员的宪法和基本法推广教育,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9]。澳门居民因此对《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关系有准确的认识, 并广泛认同和拥护依据《宪法》和《澳门基本法》治理澳门。因此,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履行宪制责任, 制定和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护》

等法律时，获得民众的高度支持。

二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在裁判中使用宪法与基本法来维持宪制秩序。例如，在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可否仅以基本法为依据核准行政法规的争议中，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就第 28/2006 号案件作出判决，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历部宪法中有关“行政法规”的概念及有权制定“行政法规”的主体，并引用我国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体制，确认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没有预先授权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制定独立行政法规^[15]。又如 2019 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有个别澳门居民试图举行集会反对香港警方未获准许而引发诉讼。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在该案判决中，援引了宪法第 31 条和 62 条。特别行政区宪制基本原则根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两部基本法，其效力及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不能违反有关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本原则，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部事务”^[16]。该判决郑重确认了我国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效力，有效维护了澳门的社会稳定。

总体而言，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秉持司法谦抑主义立场，尊重行政主导，避免将宪法与基本法相对立，从而平稳处理了各类司法争议。

三、正确处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2024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澳门特别行政区系统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行政主导体制运行顺畅，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更加稳固。”^[3]

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中央在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制度、重大事务和重要问题上拥有决定权和主导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在中央授权范围内，特别行政区可以自主管理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法律。主权是“一国”的规范根基，全面管治权从主权派生并构成“两制”范畴治权体系的关键要素，高度自治权则来自中央通过宪法与基本法的授权^[17]，特别行政区并不存在“固有权力”或“剩余权力”。就“一国两制”的治权体系而言，立法者的规范意图在于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相结合、相统一。“两权结合论”作为新时代“一国两制”法理发展的重要成果，已成为指导“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理论原则^[18]。中央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就是恢复行使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予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19]，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具有监督权^[20]。中央全面管治权是设立特别行政区、制定基本法的权力依据，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21]，是全国人大授权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基础。宪法和基本法是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的法律基础^[22]。中央和特别行政区要在宪法和基本法范围内行使权力，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同时，中央要积极履行宪制责任，行使全面管治权以保障“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特别行政区也要在宪法和基本法框架内积极履行自身的宪制责任。中央不干预港澳地方事务上的高度自治，港澳也要尊重和维护国家体制和内地的制度政策^[23]。港澳在涉及相互协

焦洪昌, 何智伟.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八大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43-156.

调的问题上, 要秉持尊重、配合而非消极、对抗的心态^[24]。

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在实践中既体现为两权分工配合, 又体现为两权统一衔接。分工配合方面, 自澳门回归以来, 中央负责特别行政区的防务, 特别行政区采取具体措施予以配合。特别行政区不用担心外部的干扰, 有利于集中精力谋发展。中央的外交政策之一是要发展与葡语系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澳门特别行政区利用历史上与葡语系国家的联系, 提供平台促进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在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往^[25]。例如, 由中央政府发起、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承办的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由中国主导和推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国际交流合作平台^[26]。深入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 成立中国-葡语系国家科技交流合作中心, 同葡语国家交流合作更加密切。深化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合作, 扩大缔结友好城市、姊妹城市范围, 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经贸关系。

在两权统一衔接方面,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深刻认识到高度自治并不等同于完全自治, 而是受监督的, 从未无视中央全面管治权而过度强调高度自治权, 因此在维护国家及特别行政区安全或者对外交往等各方面均一直与中央保持良好沟通并积极配合国家政策。2009 年, 澳门自行立法率先完成了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2020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 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制提供了参考。2023 年 5 月 18 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全票通过《修改第 2/2009 号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法〉》法案, 进一步完善第 23 条立法。2021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其立法精神与原则也对澳门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27]。2023 年 12 月 27 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布第 20/2023 号法律《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 2024 年 4 月 22 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又以全票通过修改后的《立法会选举法》, 借鉴了香港的经验做法, 旨在遏止选举违规行为, 优化选举管理流程。此前, 香港特别行政区由于两权衔接不畅, 中央不得不直接行使全面管治权, 完善相关立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在一系列事务上以中央政策精神为导向, 自行运用高度自治权及时立法, 维护国家安全、完善政制, 顺畅实现了两权的衔接统一, 为正确处理两权关系树立了范例。

四、正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与权利保障的关系

2014 年 4 月 1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8] 2024 年 12 月 20 日, 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 “要维护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维护安全和推动发展都要坚定不移。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安定祥和局面, 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搞建设, 不断塑造新动能新优势。”^[3]

2024 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10 周年, 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理论属性上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权威性哲学思考与思想结晶。总体国家安全观被《国家安全法》吸收, 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29]。就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而言, 保持安全与发展的平衡, 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支点与枢纽^[30]。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持续健全和完善澳门维护国家安全体

系所需的配套立法和执法工作机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澳门特别行政区于 2009 年顺利完成《澳门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将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权授予了特别行政区。底线的维持需要特别行政区积极配合，如果特别行政区配合得好，两制便相得益彰^[7]。现代法律中最为经典的基本权利都是消极权利：公民享有一系列受到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政府没有正当理由、未经正当程序不能干涉^[31]。宪法的基本功能在于两个方面：对国家权力的规制和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32]。澳门居民均深明国家不是站在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对立面，国家安全是基本权利保障的前提^[33]，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不会因为制定及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而受到损害。《维护国家安全法》第 1 条便规定了其宗旨是保障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及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是国家的责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是公民的义务^[34]。国家首先自己要安全，才有能力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如没有强大的国家，一国国民在国际上的人权亦不能受到尊重和保护^[9]。

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实践中主要通过立法和司法两方面途径协调维护国家安全与权利保障的关系。在立法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均认同国家要保护个人权利，个人要维护国家安全，彼此之间是互相保护的关系。因此，澳门特别行政区在 2009 年便率先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落实《澳门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的宪制责任。2018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又制定了配套行政法规《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细化及完善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机制。2023 年，鉴于全球安全局势日趋复杂，我国面临更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日益繁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又对《维护国家安全法》作出修改。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其发布的修法咨询宣传中明确指出，修法目的在于积极贯彻中央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落实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的宪制责任，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修法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平衡了维护国家安全与权利保障的关系。在程序方面，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了为期 45 天的公开咨询，共收集到 5 937 份意见和建议，从中整理出 111 049 条意见，其中同意意见占 93.37%，修法获得社会普遍支持^[35]。这一民主立法程序体现了对特别行政区居民政治权利的尊重。修改后的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完善了关于“分裂国家”罪、“煽动叛乱”罪的条款，将“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修订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将“窃取国家机密”罪修订为“侵犯国家秘密”罪，增订“教唆或支持叛乱”罪，为维护国家安全建构起更加严密的法律屏障。此外，修法还引入“情报通讯截取”“临时限制离境”“提供活动数据”等预防性措施，并建立相应的程序手续、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平衡了风险防控和权利保障的需要^[36]。

在司法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来协调维护国家安全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例如，2019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在前述第 94/2019 号案件所作判决中明确宣告：宪法和基本法“分别确立了一系列有关澳门特别行政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本原则，确保了两个特别行政区各自管理其内部事务。相对于澳门居民的集会权及示威权而言，维护上述有关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本原则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法律利益”。为此，澳门特别行政区警方就有关人士举办非法集会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依法驳回有关上诉。通过司法诉讼来裁断个人权利与其他法益之间的冲突竞合，是现代法治社会通行的权利救济模式。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具体个案中对人权与国家安全的平衡，贴近民众的法治生活，有助于为澳门社会树立起正确的国家意识。

此外，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一直注重加强宪法和基本法、国情国史和国家安全教育，全社会牢

焦洪昌, 何智伟.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八大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43-156.

固树立国家民族观念、厚植家国情怀。澳门居民在制定及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的过程中均表现出支持及拥护的态度, 坚决抵制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及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和强大, 澳门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会受到更好的保障和发展。当前澳门形势总体稳定, 但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着力防范各种风险, 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澳门稳定; 促进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市民参与良性互动, 引导和规范社团发展, 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解决好广大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 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 不断实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3]。

五、正确处理“爱国者治澳”与政制发展的关系

2022 年 7 月 1 日,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明确指出: “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会允许不爱国甚至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3]

“爱国者治理”原则是“一国两制”的重要内涵^[37], 政制发展的目标是确保“爱国者治澳”, 落实“爱国者治澳”是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重要范畴。“一国两制”下的爱国者标准体现了两个最基本的要求: 一是认同和尊重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二是遵守和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的宪制秩序^[38]。

“爱国者治理”的本质功能是解决特别行政区管治者的政治忠诚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追求贤能政治与良政善治^[39]。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高度重视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发展, 在落实“爱国者治澳”方面, 坚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宏观部署, 依法督促特别行政区政府落实“爱国者治澳”实践,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3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 增强港澳同胞的爱国精神, 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在“一国两制”之下, 绝对不能允许特别行政区损害国家利益^[40]。澳门政制发展的实践主要体现为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和立法会选举法, 调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构成和规模, 增加立法会直选和间选议员的名额, 修订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间选办法。澳门政制发展的经验主要体现为特别行政区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尊重并维护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全面管治权。2012 年,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了俗称“2+2+100”的政制改革, 即同时增加两个立法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议员名额, 并将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由 300 人增加至 400 人。在这个过程中,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遵循“五步曲”的程序, 并严格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 确保中央对澳门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和决定权^[41]。此外, 澳门在 2016 年修改立法会选举法时, 明确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不得兼任外国的政治职务, 参选人必须拥护基本法、效忠澳门特别行政区, 否则无被选资格, 有效防止“双重效忠”问题。2021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中, 21 人因不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别行政区被取消参选资格。

2021 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 澳门特别行政区亦借鉴其制度检视自身现行制度中需补充完善之处, 修改两部《选举法》, 进一步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2023 年 12 月 27 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布第 20/2023 号法律《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 新增拥护《澳门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参选和出任选委会委员的资格条件, 规定上述人士在参选时须就拥护和效忠事宜作真诚声明, 须签署并提交声明书, 拒绝签署声明书者不得参选。2024 年

4 月 22 日，澳门立法会又以全票通过修改后的《立法会选举法》，设置确保资格审查程序顺畅运作的机制，规定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国安委负责审查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是否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两部《选举法》的修改妥善处理了“爱国者治澳”与政制发展的关系。一是确保了澳门政制发展的连贯性。202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之后，“原附件一以及有关修正案同时被取代”^[42]。这意味着香港基本法原附件所规定的“五步曲”程序不再适用^[43]。但《澳门基本法》仍保持着原附件一、附件二和 201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正案，有关“政改五步曲”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仍然有效，可继续适用。二是根据澳门自身实际情况设计澳门政制，并未机械照搬香港的做法。例如香港选举制度完善后，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判定候选人的“拥护”和“效忠”情况，并向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书。澳门两部选举法则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未设立专门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而是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拥护”和“效忠”问题分别向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和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书。

此外，澳门回归前，公务员团队中的领导、主管官员、法官和检察官大多由葡萄牙人担任，极少由中国人担任。回归 25 年来，澳门逐步实现了公务员本地化的目标，绝大部分各级公务员以及法官、检察官皆由中国人担任，第七届立法会全部议员均为爱国爱澳人士，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澳”原则，爱国爱澳政治社会基础日益巩固，开启了特别行政区治理的新篇章。未来，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要“弘扬核心价值、促进包容和谐。传承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增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凝聚一切积极力量，画出海内外支持‘一国两制’事业的最大同心圆”^[3]。

六、正确处理行政与立法的关系

2019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履行职责，正确处理相互关系，自觉维护行政长官权威，确保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顺畅运行。”^[1]“行政主导是基本法设计的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要原则，体现了行政长官代表整个特别行政区向中央负责的根本要求。”^[44]基本法中没有明确写上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以行政为主导，但是在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中贯穿了这一原则。以行政为主导是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的主要原则，不能以基本法没有用文字规定以行政为主导的原则而否定这一原则^[45]。

行政主导是指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中，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要高，行政长官的职权广泛而且要大，在政治体制中有较大的决策权。行政长官是保障中央授权得以依法行使的核心和中枢所在^[46]。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是我国的一种全新的特别的地方政权形式，它不同于内地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也不同于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47]。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的双重首长，要对国家和特别行政区双重负责^[48]。而在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中，关键是依照基本法处理好行政与立法的关系，保障司法独立^[49]。从管治角度而言，最密切的是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在行政主导前提下，行

焦洪昌, 何智伟.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八大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43-156.

政和立法机关实现互相配合和互相制衡^[50]。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精髓所在是行政主导^[51], 行政与立法之间如果只有互相制约, 而缺乏互相配合, 这对特别行政区是不利的, 所以要重在配合, 这将有利于提高特别行政区的工作效率^[52]。

澳门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在互相配合方面已建立起一套运转顺畅的良性机制。行政长官一般会事先通过行政会协调行政与立法的关系, 着重行政与立法的沟通和配合^[53]。按照《澳门基本法》第77条、第144条和附件一、附件二的规定, 立法会的法案、议案由全体议员过半数通过, 基本法修改议案、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要经全体议员 2/3 多数通过。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中, 间选议席基本都是由爱国爱澳的传统社团和工商界获得, 加上由行政长官委任的议席, 爱国爱澳的议员成为绝对主体, 所以政府施政一般比较容易得到立法会的配合。不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全部议席均由选举产生,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席除了由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产生外, 还有由行政长官委任的议席。因此, 建制派议员长期占据多数, 行政和立法机关可以实现良好互动和配合。

回归后,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对行政机关的民主监督取得长足进展。一是澳门立法会议员对行政机关的书面质询数量从第三届立法会以来呈阶段性波动增长趋势, 至第六届立法会, 每个会期的书面质询数量都在 700 个以上, 是回归以来书面质询数量最高的一届, 且七成以上都能够在法规规定的 30 天内得到政府回复, 四分之三以上都集中关注民生议题^[54]。二是从第四届立法会起,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内设置跟进委员会, 承担专门监督行政机关的职责。第五届立法会又进一步完善跟进委员会制度, 不再由常设委员会主席兼任跟进委员会主席, 改由委员会成员自行选举, 最终 3 位跟进委员会主席均由直选议员出任^[55]。这使得跟进委员会的会议次数大幅提升, 专项监督的议题更贴近市民关心的议题。这一举措在第六届立法会得以延续。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成员历来以爱国爱澳力量为主, 既能较好地配合政府施政, 又能寓支持于监督之中, 担任建设性的监督者, 故而能够妥善处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配合与制约关系。面向未来,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管治团队在行政长官带领下, 加强跨领域跨部门协调合作, 切实提高行政效率, 将继续交出亮丽成绩单。

七、正确处理法律清理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2014 年 10 月 2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 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障碍。”为使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和平平稳过渡, 《澳门基本法》第 8 条规定, 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除同《澳门基本法》相抵触或经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 予以保留。第 145 条又规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时, 澳门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为同本法抵触者外, 采用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 如以后发现有的法律与本法抵触, 可依照本法规定和法定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因此, 随着澳门回归和基本法生效实施, 回归之前制定的法律法规, 不抵触基本法的都可以转化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面对不同法律制度以及不同法律文化的差异, “一国两制”展示了尊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为世界法治文明的多样性提供了中国的智慧、经验与思考^[56]。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法》第 3 条的规定, 采用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法规的澳门原有法律, 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 在适用时, 应作出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或例外, 以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后澳门的地位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实践中，为遵守基本法及《回归法》的规定以及实现法律本地化目标，同时因回归后澳门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均发生相当大变化的情况，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对在回归前公布、已经不合时宜的澳门原有法律和法令进行清理及适应化处理，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因澳门原有法律数量极其庞大，1976 至 1999 年间颁布的法律及法令有 2 100 多部，约 4 万条，因此需要分步骤展开清理工作。时任行政长官于 2010 年作出第 345/2010 号行政长官批示，对在 1976 年至 1999 年 12 月 19 日期间颁布并采用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法规的 2 123 项法律及法令进行清理及适应化工作。首先完成的是对失效法律的确认工作。很多原有法律制定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在葡萄牙都已经失效，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澳门特别行政区于 2017 年颁布第 11/2017 号法律《确定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公布的若干法律及法令不生效》，2019 年颁布第 20/2019 号法律《确定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公布的若干法律及法令不生效》，合计确认 746 项法规已被默示废止或失效，废止 17 项已没有存在价值的法规，从而基本确定了仍生效的法规清单。在此基础上，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对仍生效法规的适应化及整合工作。2024 年 2 月，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完成《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三年公布的若干法律及法令的适应化及整合》法律草案，该法案内容涉及 204 项法规；8 月又完成了《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九年公布的若干法律及法令的适应化及整合》法律草案。有关法案将送交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审议，争取 2025 年获立法会通过。据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法务司司长介绍，此两法案通过后，澳门仍生效的原有法律法令数量将大幅减少至 406 项，不过其中还包含一些大法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将继续加快推进剩余的清理工作^[57]。

在回归 25 周年之际，澳门再次清理已经不合时宜的原有法律，并进行适应化整合，持续完善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较好地落实《澳门基本法》第 8 条以及第 145 条的有关规定。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比较彻底地清除了葡萄牙曾经实施管治的法律痕迹，真正做到“法律回归”“澳法治澳”。澳门自回归祖国以来，一直将宪法和基本法视作自身的宪制基础，并将维护宪法和基本法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法宝^[58]，通过法律清理，澳门逐渐形成以宪法和基本法为核心，以继续保留并经修改的五大法典以及众多经过清理和修订后继续使用的法律，还有回归后新制定的一大批法律为主干的本地法律体系^[59]。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涵盖了各个领域。这是澳门法治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澳门回归以来一直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完善法规体系，以良法保善治^[60]，为依法治澳打下了坚实基础^[61]。

八、正确处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019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澳门回归祖国 20 年来，社会保持稳定和谐，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回归前治安不靖的状况得到迅速扭转，澳门成为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政府和市民、不同界别、不同族群保持密切沟通，社会各界理性表达各种诉求，形成良好协调机制。”^[1]

《澳门基本法》序言第二段指出，“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有利于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国家决定实行“一国两制”。可见，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是基本法确定的

焦洪昌, 何智伟.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八大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43-156.

基本原则, 而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方法是实行“一国两制”^[62]。回归前, 澳门社会治安混乱, 黑社会势力猖獗, 恶性犯罪频发, 影响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经济亦处于低迷, 有待复苏和发展。因此, 在《澳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 考虑到澳门当时的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与香港情况不完全相同, 并没有照搬《香港基本法》“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写法^[60], 将其改为“有利于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63], 但“繁荣和稳定”作为“一国两制”的初心不会改变^[64]。

回归初期, 澳门居民对特别行政区政府能否解决治安问题抱持观望态度, 但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 一举扭转局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不仅在人员、物资上给予保安部门大力支持, 而且通过了《有组织犯罪法》《内部保安纲要法》等法律, 加强了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监控、预防和打击, 完善了澳门内部的保安体系^[65]。《澳门基本法》未明确规定中央在澳门驻军问题, 在澳门市民的一再强烈要求下, 1999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该法第 3 条规定:

“澳门驻军不干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 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澳门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首任澳门特别行政区保安司司长张国华指出, 虽然解放军驻澳部队从未实际履行治安执法职能, 但其“威武之师”的形象对犯罪分子起到了心理震慑作用。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共同努力下, 澳门警方连续多年把精力重点投入到打击黑社会犯罪、绑架及纵火等恶性犯罪上, 顺利解决了治安不靖的问题, 还创造了位列国际上最安全城市之一的佳话。其中, 本地区的绑架案件从 1999 年的 24 宗变为连续 8 年零案发。

回归前, 澳门经济连续多年负增长。回归后, 通过实施相应的经济转型措施和产业结构调整策略, 确立了以博彩旅游业为支柱, 同时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策略。澳门本地生产总值 (GDP) 从 1999 年至 2023 年实现了数倍提升。2023 年澳门 GDP 达到 3 794.8 亿澳门元, 自 1999 年以来年均增长 4.9%; 人均 GDP 为 55.9 万澳门元, 年均增长 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4 年 3 月预测, 澳门 2024 年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13.9%, 优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并预计将于 2025 年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环球金融》杂志 2024 年 5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 2024 年全球最富有国家或地区排名中, 澳门排名第二。澳门经济保持有序增长, 居民的就业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失业率由 1999 年的 6.3% 持续下降至 2024 年第一季度的 2.1%。旅游业稳定发展, 访澳旅客由 1999 年的 744 万人次增长至 2023 年的 2 821.3 万人次。

澳门回归祖国 25 年来, 与内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在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澳门更大更好发展。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切实加强“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 大力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巩固和拓展与葡语国家的合作和联系, 以更大作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不断增强澳门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澳门居民亦从政府推出的现金分享计划、医疗补贴计划、住宅单位电费补贴计划、持续进修发展计划、15 年免费教育、双层社保制度等惠民措施中, 分享到澳门经济发展的成果。面对居民置业难的问题且受限于澳门土地稀缺的困扰,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适时把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机遇, 在横琴兴建“澳门新街坊”项目, 积极解决居民上楼难的问题。

回归 25 年来, 澳门善于利用“一国两制”这一最大的制度优势,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促进经济持续适度多元发展, 并善用财政收入改善民生, 让澳门居民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红利, 感受

到安居乐业的幸福感，社会长期保持和谐稳定，被评为国际最安全城市和全球最富有地区之一。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着力提升治理效能，“要把依法治理和担当作为结合起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深入推进公共行政改革，完善组织架构，革新管治理念，改进管治方式，强化宏观统筹，建设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激发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和发展潜力”^[3]。

澳门回归 25 年来，在中央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接续奋斗，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习近平指出：“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是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好制度，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3]《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牢固树立，澳门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澳门之所以能谱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华彩篇章，根本在于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始终准确把握“一国两制”正确方向，始终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始终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强调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这为澳门砥砺奋进、阔步向前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经验不仅对推进“一国两制”未来在港澳继续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对于采用“一国两制”方式，最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2]。“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成功实践，既给人类社会解决矛盾和冲突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有效路径，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政治非凡的品质和特色^[66]。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12.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09.
- [3] 习近平在庆祝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N]．人民日报，2024-12-21（2）．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27.
- [5] 强世功．中央治港方针的历史原意与规范意涵——重温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论述 [J]．港澳研究，2020（4）：3-22+93.
- [6]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19-11-06（1）．
- [7] 陈端洪．论港澳基本法的宪法性质 [J]．中外法学，2020（1）：41-63.
- [8] 秦前红．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 [J]．中国人大，2019（24）：1.
- [9] 王振民，刘林波．“一国两制”澳门实践：成就、经验与展望 [J]．港澳研究，2020（1）：40-47+94.
- [10] 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N]．人民日报，2019-12-21（2）．
- [11]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 [M]．4 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51.

焦洪昌, 何智伟.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八大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43-156.

- [12] 骆伟建.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新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53+54.
- [13] 黄明涛. 论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效力与适用 [J]. 法商研究, 2018 (6): 101-110.
- [14] 胡锦涛, 刘海林. 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变迁及其意义 [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 140-153.
- [15] 常浒. 澳门特区行政法规制定权限争议及其解决 [J]. “一国两制”研究, 2010 (6): 44.
- [16] 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裁判. 第 94/2019 号案 [EB/OL]. (2019-09-27) [2024-11-28]. <https://www.court.gov.mo/sentence/zh-b94c1d08b129e03f.pdf>.
- [17] 焦洪昌, 杨敬之.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中的授权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 (3): 15-20+128.
- [18] 田飞龙. “一国两制”的渊源、制度与文明内涵——以香港实践为例 [J]. 南大法学, 2023 (3): 2-28.
- [19] 王禹. 全面管治权理论: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基石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 (21): 44-53.
- [20] 骆伟建. 论“一国两制”在澳门实践的特色——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回顾和思考 [J]. 澳门理工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3): 27-36.
- [21] 莫纪宏.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的政理·法理·宪理 [J]. 当代法学, 2023 (6): 3-14.
- [22] 骆伟建. 论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 [J]. 港澳研究, 2018 (1): 14-24+93.
- [23] 许昌. 论国家宪法与港澳基本法关系的若干问题 [J]. 求是学刊, 2019 (3): 98-105.
- [24] 焦洪昌. 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J]. 中国司法, 2022 (11): 33-36.
- [25] 骆伟建. “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经验研究 [M].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20: 173.
- [26] 李晓兵. 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发展与转型——纪念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20 周年 [J].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5): 15-26+125.
- [27] 江华. “爱国者治澳”原则与澳门特区宣誓效忠制度的完善 [J]. 澳门法学, 2021 (2): 74-88.
- [2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34+307.
- [29] 田飞龙.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香港 23 条立法的制度正当性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51-165.
- [30] 漆程成.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思考 [J]. 政治学研究, 2024 (4): 121-130+190.
- [31] 刘晗. 海国宪志: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宪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325.
- [32] 张翔. 宪法概念、宪法效力与宪法渊源 [J]. 法学评论, 2021 (4): 24-35.
- [33] 王振民, 黄凤, 毕雁英, 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读本 [M]. 香港: 三联出版 (香港) 有限公司, 2021: 67-68.
- [34] 莫纪宏. 特别行政区内的宪法适用问题研究 [J]. 环球法律评论, 2022 (5): 5-19.
- [35] 澳门特别行政区保安司司长办公室. 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公布 [EB/OL]. (2022-11-07) [2024-11-29]. <https://www.gcs.gov.mo/detail/zh-hans/N22KGD1W50>.
- [36]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 行政会完成讨论《修改第 2/2009 号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法〉》法律草案 [EB/OL]. (2022-12-02) [2024-11-29]. <https://www.gov.mo/zh-hant/news/947661/>.
- [37] 郭天武, 李峥. “爱国者治港”的理论证成与实践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3): 117-129.
- [38] 骆伟建. 论“一国两制”下的爱国者治理 [J]. 澳门理工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 27-37.
- [39] 田飞龙. 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国两制”统一战线的规范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23-37.
- [40] 骆伟建, 周挺, 张强. “一国两制”下的中央管治权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22.
- [41] 鄞益奋. 回归 20 年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基本经验 [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 (5): 2-10.
- [42] 沈春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J].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1(4): 656-660.
- [43] “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具有十分重要深远的意义”——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N]. 人民日报, 2021-03-31(6).
- [44] 习近平.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致辞(2019年12月19日)[N]. 人民日报, 2019-12-20(2).
- [45] 萧蔚云. 论香港基本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829.
- [46] 焦洪昌, 王柳. 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制度: 宪制基础与制度完善[J]. 行政管理改革, 2020(7): 55-63.
- [47] 焦洪昌. 宪法学[M]. 6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437.
- [48] 杨允中. 澳门基本法释要[M]. 澳门: 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 2018: 98.
- [49] 冷铁勋. 基本法与澳门“一国两制”实践[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254.
- [50] 许昌. 论澳门特区政治体制设计原则及顺利落实的成因[J]. 港澳研究, 2015(2): 59-67+95.
- [51] 韩大元, 陈佩彤, 刘海林. 许崇德论基本法文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15.
- [52] 萧蔚云. 论澳门基本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281-282.
- [53] 蒋朝阳. 澳门基本法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治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88.
- [54] 郭小敏, 霍伟东. 政府注意力视角下的澳门立法会书面质询与政府响应[J]. 澳门研究, 2023(2): 28-58.
- [55]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第五届立法会第一立法会期(二零一三—二零一四)第一组[J].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会刊, 2013(V2): 1-59.
- [56] 韩大元. 论“一国两制”的文明观及其当代意义[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1(3): 83-95.
- [57] 澳葡旧法律法令尚存四百多生效中[N]. 正报, 2024-08-15(1).
- [58] 邹平学, 冯泽华. 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挑战与深化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1): 32-42.
- [59] 王禹. 澳门的治理、政制与法治建设[M]. 澳门: 三联出版(澳门)有限公司, 2021: 47-48.
- [60] 王利明. 法治: 良法与善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03.
- [61] 杨允中, 王禹, 等.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研究[M]. 澳门: 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 2015: 158-160.
- [62] 焦洪昌, 姚国建. 港澳基本法概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17.
- [63] 骆伟建, 江华, 赵英杰.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析: 立法背景和立法原意的探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33.
- [64] 韩大元, 陈佩彤. 论香港基本法序言中“繁荣和稳定”的规范内涵[J]. 当代法学, 2021(5): 75-85.
- [65]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文化教育部. 濠江扬帆再起航——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报道汇编[M]. 澳门: 澳门基金会, 2010: 203-204.
- [66] 林尚立. 论当代中国政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J]. 政治学研究, 2024(2): 3-12+257.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龚静阳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及其影响

钟厚涛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91）

摘 要：特朗普 2.0 时期在对台政策上将与拜登时期出现较大差异，即由“以台制华”到“锁台遏华”，由打“台湾牌”到构筑“台湾陷阱”，由“意识形态挺台”到“经济榨台”，由两面平衡到双重讹诈，由战略关切到利益交换。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将进一步掏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加剧台海地区的“闪爆”风险，加速全球地缘政治重组。但特朗普 2.0 时期的对台政策也面临着结构性困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与全球“东升西降”的基本态势存在错位；特朗普轻视台湾与特朗普团队鹰派“挺台”之间也有较深分歧。特朗普对台政策的交易性和多变性，将加深民进党当局战略焦虑，进一步催生岛内的“疑美”氛围；特朗普的贸易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也将恶化台湾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边缘化处境。未来民进党当局只有认清历史大势，放弃“倚外谋独”幻想，彻底调整两岸政策，才有可能为台湾地区寻求到广阔发展空间。

关键词：特朗普；美国对台政策；台海局势；“疑美”氛围；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1-0157-11

一、问题的提出

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就任美国第 47 任总统。在 2024 年竞选美国总统过程中，特朗普多次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1.013

作者简介：钟厚涛，国际关系学院对台战略预置和重点问题创新研究团队负责人，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美国对台湾当局海洋政策的影响研究”（22FZZB009）

引用格式：钟厚涛.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及其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57-167.

就台湾问题发表言论^[1]。由于特朗普决策模式变化多端且擅长“极限施压”，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 2.0 时期如何落实“以台制华”战略，是否会进一步助长赖清德当局“倚外谋独”的嚣张气焰。特朗普政府的“猛打台湾牌”与赖清德当局的“激进台独布局”会产生怎样的叠加震荡效应，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台海风暴”，进而导致台海局势由严峻复杂走向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

目前学术界对特朗普 1.0 时期的对台政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比如，汪曙申认为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加快与台湾构建所谓“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直接冲击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和“双轨策略”等^[2]。郭拥军认为，特朗普时期对台政策在躁进与谨慎的区间运行，出现极端恶性事件和淡化台湾议题的两极化可能性同时存在^[3]。吴迪提出，特朗普 1.0 时期美国对台政策主要受到对华战略调整、意识形态、国会“亲台”势力、特朗普个人及团队等多重因素影响^[4]。

整体来看，特朗普 2.0 时期在涉台政策上将体现出对 1.0 政策取向的选择性延续和对拜登任期政策的扬弃，呈现“变与不变”共存的状态。大国博弈在各个领域持续深化、异常激烈，美国“以台制华”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由于特朗普思维的不可预测性和政策的不连续性，美国打“台湾牌”的策略、手法、力度和频次等将发生一定变化，台海地区黑天鹅现象与灰犀牛现象可能交织呈现。本文在全面回顾特朗普 1.0 时期美台关系脉络和深度解析特朗普“台湾观”和“台湾圈”的基础上，探讨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打“台湾牌”的主要动向、影响与结构性制约。

二、特朗普 2.0 时期对台政策的主要走向

近年来，美国政府确立了“强化战略竞争”的对华政策基调，将中国定位为“唯一有潜力全方位挑战国际秩序的主要竞争对手”^[5]。美国从贸易制裁、科技封锁、意识形态围堵等多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与全体系的打压。在妥善应对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的良好态势^[6]。遭遇战略挫折后，美国对华遏制可能将进入躁进期，以更加疯狂的方式、“强美争霸遏华挺台”策略，为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一）从打“台湾牌”到构筑“台湾陷阱”

对于美国而言，对华打“台湾牌”成本小但收益大。台湾问题成为美国妄图撩刺、激怒、消耗和压倒中国大陆的关键筹码。未来，美国将构筑“台湾陷阱”，对华实施战略阻断，利用台湾问题消耗中国大陆的各项资源，妄图迫使中国大陆因为台湾问题陷入战略透支困境，妄图迟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一是由“促和”到“拱火”。特朗普第一任期在 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宣称要“把美国国家实力的全部要素（政治、经济和军事）结合起来以在竞争中取胜”。为了达到“竞赢”中国的目的，美国竭力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中国。美国评估认为：就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而言，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并不完全符合其战略利益。部分反华势力妄图推动两岸“似战未战”“似冲突未冲突”“处于战争的边缘”，进而推动两岸“永久分离”，以此为美国霸权提供更大空间。在特朗普胜选后，特朗普倚重的重要幕僚马斯克要求为 SpaceX 提供零部件的

台商搬出台湾以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其核心意图是要制造所谓“台海战争危机论”。未来美国政府将通过情景推演等多种方式来渲染战争的紧迫性，不断在台海地区煽风点火。

二是由“防统”到“阻统”。台湾处于美国精心构筑“第一岛链”的中枢位置，对于美国维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具有重要作用。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出的“印太战略”中，把台湾塑造为遏华“桥头堡”和关键支点。在中美综合国力相差较大时，美国为抢占道德制高点，明确表示不反对两岸迈向统一。例如，2014 年 11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明确表示“美方没有围堵或损害中国统一的意图”^[7]。但随着中美实力的此长彼消，美国对于两岸统一的防范意识显著提升，频频炒作两岸统一时间表，企图为进一步介入台海局势制造借口和幌子，竭力阻挠两岸统一进程。

三是由“疑独”到“纵独”。1998 年 6 月，美国总统里根在访华时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8] 2003 年 10 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公开批评陈水扁为“麻烦制造者”。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内所谓“台独金孙”，是“升级版李登辉”“加强版陈水扁”和“暴力版蔡英文”，上台之后全面加速“台独”布局^[9]。美国为强化台湾的棋子作用，默许、纵容甚至支持赖清德的“柔性台独”行径，如“文化台独”“教育台独”和“社会台独”等，这也将进一步助长赖清德当局“倚外谋独”的嚣张气焰。

（二）由对台军售到对陆强化不对称威慑

1982 年美国政府在中美《八一七公报》中明确承诺，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此后美国食言，不断增加对台军售，出售范围也逐渐由防御性武器向进攻性武器转变。特朗普 2.0 时期很可能继续加码，更加快速和按需增强对台军售。

一是制造台海紧张迫台军购。特朗普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理念，谋求以压倒性的实力优势来落实军事威慑。特朗普被外界称为“全力以赴‘武装’台湾”的美国总统，其第一任内对台军售总额高达 183.3 亿美元，远超此后拜登时期 80.08 亿美元的规模。其中，特朗普第一任期 2019 年 8 月批准的关于售卖 66 架 F-16V 战机、总额为 80 亿美元的订单，成为美国对台军售史上单笔金额最大的军售案。特朗普 2.0 时期很可能以武压台，进一步渲染台海紧张局势，迫使台湾当局扩大对美军购。

二是助台构建不对称战略。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台军售 11 次，拜登时期 8 次，两个时期都有随提随审、逐案审批、化整为零、小步快跑等军售特点。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一方面会协助台湾构建不对称作战理念，向台湾提供短小精悍、具备精确制导性能的中小型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向台湾出售虽不实用却能让美国获利更多的传统大型武器，妄图对中国大陆构成延伸“威慑”和不确定性“威慑”。台湾当局积极迎合这种意图。据《金融时报》披露，目前台湾当局正在谋划发起 4 800 多亿新台币的对美军购案，其中包括 60 架 F-35 战斗机^[10]。

三是引台融入美“印太”战略。特朗普第一任期在传统的亚太战略基础上提出“印太”战略，鼓吹台湾在其中所谓关键支点价值。特朗普第一任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在《外交事务》上刊文，建议特朗普对台湾作出更明确的承诺，向台湾扩大军事援助并邀请其参加“红旗军演”和“环太平洋军演”等。

（三）由“意识形态挺台”到“经济榨台”

近年来美国深陷政治极化危机，“国会山骚乱”等事件让美国选民和国际社会对所谓“美式民

主”进一步祛魅。拜登政府为挽回美国形象，连续 3 年举行“全球民主峰会”，企图借此恢复美国“民主灯塔”形象，淡化特朗普反建制路线对美国“民主”形象的破坏。随着拜登卸任，美国民主价值观纽带面临断裂风险，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湾是民主价值链重要一环”的图谋也将随之破产。

一是由经济伙伴到“芯片小偷论”。拜登政府颇为重视与台湾当局的经贸关系，2022 年 6 月启动“美台 21 世纪贸易倡议”，2023 年 6 月签署首批协议，2024 年 12 月正式生效，主要内容包括贸易便捷化，简化一般性通关与进出口贸易流程等。特朗普与拜登的对台认知存在较大分歧，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彭博商业周刊》专访时公开表示：“台湾确实抢走了美国大概百分之百的芯片生意，我认为台湾应该付给美国保护费。美国跟保险公司没两样，但台湾什么都没给美国”^[11]。

二是由“无偿军援”到收“保护费”。拜登政府在“2023 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提出：“自 2023 年起，在未来 5 年内美国每年向台湾提供 2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 1978 年 12 月以来美国首次提出对台“军援”举措。2024 年 4 月，拜登政府签署多项支出法案，其中包括向台湾地区提供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依据特朗普“绝不吃亏”的决策性格，其第二任期对台无偿“军援”可能性较小，甚至会加大力度向台湾收“保护费”。

三是由“挺台撑台”到“锁台榨台”。特朗普在评估美国与盟伴关系时，主要基于两大标准，即是否从美国赚取贸易顺差，防务预算是否达标。台湾处于特朗普清单上的“红色危险区”而非“绿色安全区”。近年来，台湾地区对美贸易顺差急剧上升，2018 年为 120 亿美元，2019 年上升至 193 亿美元，2022 年则猛增至 510 亿美元。这在特朗普眼中无疑是台湾在“占美国便宜”和“搭美国便车”。此外，虽然台湾地区 2025 年防务预算高达 6 470 亿新台币，较 2024 年猛增 7.7%，但没有达到特朗普预期。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极有可能以此为由加大对台勒索。

三、特朗普 2.0 时期对台政策的主要影响

2024 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实现了全面胜利，既赢得了普选票和选举人票，其所在的共和党也同步掌控了国会参众两院，加之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占有明显优势（现任 9 名大法官中有 6 名保守派）。特朗普首度完全执政，有效控制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民主党很难对其掣肘。特朗普大权在握，极有可能以全政府方式调动联邦各政府机构对华实施对抗性遏制，利用台湾问题来围堵中国大陆。未来的美台关系有可能出现拐点性甚至是不可逆性变化，给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系统性风险。

（一）全球地缘政治重组与台海地区风险上升

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特朗普重返执政，给全球秩序投下新的变数。

一是特朗普重返执政与世界秩序重塑。与特朗普 2017 年首次入主白宫相比，2025 年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韩国总统被弹劾，叙利亚政权“变天”，德国政府未通过信任投票，欧洲、中东和非洲陷入持久战争，全球和地区秩序正在经历新一轮变局。曾在冷战期间流行的东西南北概念，如今再度风靡，显示国际政治正在迈向“再阵营化”。这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秩序失控或爆发冲突的风险。

二是特朗普极限施压与临界点的逼近。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已经从战略竞争逐渐转向“敌对性对抗”。美国民意和社会基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降至 1979 年以来的新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 只是策略技巧和方式方法的不同, 拜登被称为“有掩饰的特朗普主义”。在对华遏制方面, 民主党是手术式精准打击, 特朗普则是用棒子乱打一气。特朗普的副手万斯宣称, 推动俄乌冲突的快速解决, 主要是让美国聚焦到中国这一所谓“核心威胁”。对华极端鹰派的国务卿人选卢比奥和国安顾问人选沃尔兹均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遏制, 预示着特朗普 2.0 时期打“台湾牌”的力度势必进一步加强。

三是联动处理涉台议题。特朗普 2.0 时期前半程将重点聚焦美国国内议题, 在涉台议题上相对克制; 但随着美国对中国无法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特朗普有可能将台湾议题与贸易议题等联动处理。美国政府持续挑动台湾问题, 台海地区已被部分媒体炒作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12]。

（二）美国对台政策反建制化与“一个中国”政策被掏空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台政策涉及面广、颠覆性强, 未来特朗普若继续加码, 将进一步侵蚀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和战略互信, 产生广泛的外溢效应。

一是美国“深层政府”失灵。特朗普 2.0 时期在人事任命上标准更加清晰, 以“政治忠诚度”作为最重要依据。这也导致此前对台湾问题重要性和敏感性相对了解的建制派人物有可能被排除在决策圈外。另外, 马斯克专门成立政府效率部, 企图削弱美国“深层政府”, 也将为美国涉台政策走向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是称呼台湾为所谓“国家”。1982 年美国里根政府在与中国达成《八一七公报》后, 故意玩弄所谓平衡策略, 向台湾当局口头抛出所谓“对台六项保证”。特朗普第一任期首次向外界公开披露“对台六项保证”具体内容, 其中包括“美国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主张”^[13]。此后, 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愈演愈烈, 在官方文件和涉台法案中频频将台湾称为所谓“国家”, 特朗普在与蔡英文通话时也公开称呼蔡英文为所谓“台湾总统”。2021 年 1 月 9 日,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卸任前 11 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取消此前国务院关于对台交往的限制, 妄称“政府各部门应将此前国务院发布的各种禁令视为失效”^[14]。特朗普 2.0 时期或将故技重施, 以所谓“国家”来定位台湾地区, 并加强与台湾所有层级人员的互动。

三是重新炒作联合国 2758 号决议。1971 年 10 月 25 日,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 2758 号决议, 明确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国家,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 不存在所谓“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特朗普重返执政后美国很可能在涉台问题上加大认知战操弄, 重新炒作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 谬称联合国 2758 号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 “并未涉及台湾问题, 因而台湾有权加入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

（三）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再模糊化

1954 年美国曾与台湾当局签署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1978 年美台“废约”后, 美国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策略, 意在为美国预留最大的弹性决策空间。拜登时期, 美国对台政策出现过战略清晰化态势, 但特朗普 2.0 时期有可能出现回调。

一是由明确协防到回避表态。2021 年 1 月,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卸任前提前解密了 2018 年版的“美

国印太地区战略框架”文件，声称美国将会保护第一岛链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台湾在内”，“协助台湾发展非对称防御战略和能力，以确保其自身安全，避免遭受‘胁迫’”^[15]。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台政策呈现进一步的战略清晰化态势，拜登本人多次明确表态“若两岸发生冲突美国会‘协防台湾’”^[16]。但特朗普自诩“和平总统”，其最引以为豪的是在他第一任期并没有发动过战争，他直接派军介入台海冲突的意愿较低。《时代周刊》等媒体多次追问特朗普是否会“协防台湾”，特朗普每次都“顾左右而言他”，拒绝正面回答。特朗普声称：“这个问题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了”“现在不想透露自己的底牌”“站在总统的位置上不可能说出心中所想，因为一旦说出，谈判时将处于不利位置”^[17]。

二是由武力介入到提高关税。目前两岸实力发生了变化，中国大陆对台湾形成多方位优势。岛内分裂势力深知，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根本不可能达到“台独”图谋，转而“倚美谋独”，幻想着台海地区若发生冲突美国将会派兵介入，或至少为台湾提供军事武器装备和情报支撑。特朗普的表现让岛内分裂势力错愕。2024 年 10 月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声称：“若是中国大陆武力‘侵犯’台湾，美国将向中国大陆征收 150%到 200%的关税”。

三是从利益捞取到风险规避。长期以来，美国将台湾视为与中国大陆竞争博弈时的谈判筹码。近年来，随着台海局势日趋严峻复杂，为避免被岛内分裂势力拖入战争泥潭，美国战略学界有人反思台湾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战略资产”，而是美国的战略包袱和战略负债^[18]。特朗普认为挑动两岸适度冲突有助于维护美国利益，但若是美国介入台海冲突，则会得不偿失，甚至陷入与核大国对撞的战争泥潭。

四、特朗普 2.0 时期对台政策的结构性困局

特朗普 2.0 时期在对台政策上将呈现较强的激进性和不确定性，面临着一定的战略两难和内在约束机制。

（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与全球“东升西降”的基本态势

特朗普高举“让美国再次伟大”大旗并得到数以亿计追随者的支持，显然是因为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认为“美国已经不再伟大”，“因而需要恢复昔日荣光”。目前世界的主流态势是“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特朗普的很多举措势必会引发地区性和全球性冲击，其对台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一是全球权力格局的重心转移。全球正在加速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此背景下，中美对全球影响力的竞争已经超越短期政策调整的范围，逐渐演变为深层次的战略博弈。特朗普直言，中美联手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这显示，未来美国将依然在中美关系大的架构下处理台湾问题，不可能将台湾问题从中美关系中剥离出来；美国对台政策既会受到全球地缘政治的牵制，更会服从和服务于对华政策。

二是中美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美国对中国博弈的本质是“名为竞争实为打压”，竭力通过各种方式遏制中国发展。面对新一轮“特朗普冲击”，中国在应对美国对华竞争和打压方面的心理准备和政策储备远远超过 2018 年，具备了更强的战略韧性和更大的战略自主性。这会对美国“以台制

华”构成平抑效应。

三是美对华认知出现战略迷雾。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和美国利益最大化，对于中国的战略认知出现偏差。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认知偏离客观实际。若无法形成正确的战略认知，反而展开战略豪赌，美国对台政策有可能往更加激进的方向转变。

（二）特朗普的轻视台湾与特朗普团队的鹰派“挺台”

相较于第一任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倾向于在美国政治圈主流之外挑选内阁成员。这意味着特朗普与其团队成员需要磨合，也意味着美国未来对台政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一是特朗普对台策略边缘化。在国内政治极化与国际秩序动荡的双重挑战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将担负起前所未有的艰巨使命。特朗普政策议程展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降低对次要区域的资源分配。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认为台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笔尖”。这种独特的“台湾观”，显示了特朗普对于台湾的轻视，也意味着台湾问题没有被摆上特朗普的议事日程。2024 年 11 月 16 日，习近平主席在利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强调，“台独”分裂行径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明确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19]。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直接点名赖清德，释放了强烈的警示信号，有助于引导特朗普进一步认清“赖式台独”的危险性和危害性。

二是特朗普本人具有不可预测性。特朗普十分自信，行事反复无常、难以捉摸，经常玩弄两面手法，不按常理出牌，其最大的可预测性就是不可预测。特朗普上任给美国对台政策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民进党当局有可能逆势而行，对美自我筹码化，展开一场政治豪赌，加速“倚外谋独”布局，试图引导甚至掌控与美关系的进程。蔡英文曾称，台湾不是“棋手”而是“棋子”。这显示民进党当局不甘于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从属和附庸位置，而要在整盘棋局中扮演控局者角色。

三是特朗普团队“鸽鹰并存”。特朗普团队并非“同质集团”，其中既包括相对务实的马斯克，也包括一大批强硬的对华鹰派，甚至被外界称为“群鹰荟萃”。例如，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卢比奥就是美国政坛臭名昭著的“反华急先锋”。这种“鹰鸽共存”的安排和“对手团队”（team of rivals）的组建，必然会增加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内部分歧的协调难度。

（三）特朗普政府弱盟轻伴策略与台湾的全球孤立困境

拜登执政时期偏爱多边主义，在原有的轴辐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基础上精心构筑了“多边栅格战略架构”（multilateral lattice-like strategic architecture）联盟体系，主要包括三边（AUKUS）、四边（QUAD）、五边（五眼联盟）等多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结构体系，并在其中强行塞入台海议题。特朗普奉行战略收缩，注重从多边主义盟友政策转回“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体现了强烈的美国本位特征，试图塑造一个对美国更加有利的联盟结构，引导盟友在共同防御体系中支出更多费用。

一是“拉盟挺台”后继乏力。拜登时期聚焦拉帮结派，注重利用盟友体系集体遏华“挺台”，甚至企图将台湾问题强行塞入各种军事安全同盟。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对盟友的态度较为冷漠，公开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为“加拿大州长”，暗示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这引发了加拿大各界高度不满。特朗普还倾向于玩弄“退群外交”，试图重新定义美国的国际责任，扬言如果美国盟友的防务支出“不达标”，美国绝对有可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势必会导致美国盟友出

现与美国“离心离德”“面和心不和”的态势，一定程度上倾向于选择“两边下注”而非完全倒向美国。

二是“价值观挺台”将会弱化。相较于拜登政府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联盟，特朗普的外交思路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强调美国利益至上，更具“权衡”与“交易”色彩，在外交政策中注重实际利益的交换与获取，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和交易。这意味着特朗普不愿意拘泥于意识形态，在“价值观挺台”议题上力度会有所弱化。

三是所谓“助台固邦”动能不足。为协助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制造所谓“台湾是独立政治实体”的假象，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执政时期都高度重视帮助台湾所谓“固邦”，不但专门出台所谓“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简称“台北法”），而且直接威胁恐吓台湾相关“友邦”。2018 年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时，美国国务院罕见表态称，对萨尔瓦多“断交”决定深感失望，美国参议员则声称将设法限制美国对萨援助，以警示台湾其他“友邦”，从而降低台湾遭遇“断交潮”的风险。即便美国高调“挺台”，2016 年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台湾当局已经接连失去 10 个所谓“友邦”。这显示美国所谓“助台固邦”面临有心无力的困境，更以铁的事实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基本准则。

五、特朗普 2.0 时期民进党当局的战略焦虑与“外造台独”困境

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党纲中明确强调美台之间的关系“将继续以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为基础，同时我们重申 1982 年里根总统对台湾的六项保证”^[20]。但在 2024 年共和党党纲中，却只字未提台湾，这让民进党当局如遭当头棒喝，预示着“倚美谋独”之梦终将破灭。

（一）特朗普的交易性格与岛内疑美氛围高涨

特朗普著有《交易的艺术》，奉行赤裸裸的交易主义，所有问题思考的出发点皆以利益为中心。对于作为筹码和棋子的台湾而言，“工具化”和“筹码化”色彩明显。美台正陷入新一轮的战略互疑，即美国担忧被台湾牵连，而台湾则担忧被美国抛弃。

一是特朗普存在非干预主义倾向。特朗普提名彼得·赫格塞斯（Peter Hegseth）和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分别担任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二人均来自国民警卫队而非传统的海军，均反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特朗普对传统干涉主义的反思，试图重新定义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军事角色。2024 年 12 月叙利亚冲突发生后，特朗普在第一时间表示：叙利亚一片混乱，美国不应该参与其中，这不是美国的战斗，不要介入。在台海地区，特朗普也倾向于避免直接武装介入。

二是特朗普存在交易主义思维方式。美国舆论界和决策层一直有人认为应该以台湾问题作为筹码和中国大陆进行一场“大交易”。2011 年 11 月 10 日，《纽约时报》刊发社论，题目为“为了拯救我们的经济，抛弃台湾”。11 月 11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收到其助手沙利文（在拜登政府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发来的邮件，认为美国可以台湾问题为筹码来“抵消”中国大陆持有的上万亿美国的美国国债。希拉里对此表示：“我看了，这个想法很聪明。我们可以讨论看看。”岛内舆论高度担心连希拉里这样高度“挺台”的美国政治人物都认为台湾是可以被交易的，对于本来就奉

行交易主义的特朗普而言，台湾被交易更是变得“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

三是台湾对美不信任感上升。特朗普当选后，台湾各界忧心忡忡，担忧台湾会被美国“交易”，由“棋子”变为“弃子”。2024 年 11 月 19 日，“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显示，对于“是否乐见特朗普胜选”，44%的受访者表示不乐见，仅有 31%的人表示乐见；对于“特朗普是否会派兵‘协防’台湾”，57%不相信，仅有 30%相信；对于特朗普收取“保护费”，51%表示不同意，仅有 39%同意。台湾当局也高度惶恐，为防范危机，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透露台湾发起成立“台美合作交流专案小组”。2024 年 12 月，民进党当局又指派台湾“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林飞帆和徐斯俭赴美窜访，加大对特朗普团队的公关。

（二）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策略与台湾外向型经济体的困局

特朗普 2.0 时期以“降低风险”和“增强经济安全”等为名，启动供应链“近岸外包”“离岸外包”和“友岸外包”，进一步推行逆全球化，加剧全球经济的硬脱钩。这种过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台湾将深受其害。

一是特朗普政府重启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扬言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未来美国有可能通过边缘化 WTO 来破坏全球和地区经济秩序。同时，特朗普还承诺要废除拜登政府时期精心构筑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未来美国对台政策将呈现对台安全强化和经济弱化的两极化态势，在“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宣示等层面，会进一步发出“挺台”信号；但在涉及关税、科技等实质领域，则很可能毫不留情地加大对台湾的“勒索”和“敲诈”。

二是特朗普政府经济胁迫台湾当局。特朗普公开指责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未来特朗普很可能提升控台尺度，拉高对台索价，对台进行经济胁迫，要求台积电变为“美积电”，将高端芯片制造转移到美国本土。美台之间的经济产业合作也将逐渐转变为美国对台经贸施压，美台之间传统的经济与安全双轨驱动的模式将逐渐走向美国对台湾地区进行安全强化和经济压榨的分离趋势。面对美国的“压台就美”，台湾既无议价空间，更无战略自主，只能任由美国宰割勒索。

三是出现经济逆全球化与台湾边缘化趋势。特朗普再度执政，有可能导致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阶段性困境。而台湾是外向型经济体，需要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约 26%的台湾出口贸易额来自《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约 60%的台湾出口贸易额来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特朗普催生的逆全球化趋势下，台湾融入相关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难度大幅上升，台湾在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中也面临逐步边缘化的趋势。

（三）美国“挺台”法案的政策宣示与难以落实

美国长期奉行假想敌策略，布热津斯基在《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一书中指出，即使战后普遍认为 20 世纪是“美国世纪”时，这种不安情绪也没有消除^[21]。在此情势下，特朗普 2.0 时期将进一步凸显中国作为美国“假想敌”的色彩，进而强化“以台制华”战略，不断炮制涉台立法。

一是美国涉台立法密集化。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数量和立法活动频率都达到了当时的历史之最，其中第 115 届国会（2017—2019 年）炮制涉台法案 12 项，第 116 届国会（2019—2021 年）炮制涉台法案 30 项。特朗普 2.0 时期，由共和党掌控的美国参众两院将可能制造“滚雪球”效应，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加速推进涉台法案，妄图给台海局势埋下隐患。

二是国会与行政部门共谋。除特定的涉台立法，美国国会还会通过“裹挟式”即“大法套小法”的模式，在每年的拨款法案中塞进涉台条款或涉台法案。例如在 2025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就提及台湾 67 次，做足“挺台”姿态。根据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理论上讲应该分庭抗礼、相互对抗。但在“挺台遏华”成为“政治正确”的舆论氛围下，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对于美国国会炒作的涉台立法行径未予约束，并顺势利用，加大己方筹码。

三是涉台立法落实大打折扣。2017 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已经提案 281 部涉台立法，其中绝大部分在国会讨论阶段就不了了之，未能正式成法。即使有些法案如“台湾保证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经由总统签署成法，但多是保留巨大“模糊空间”，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避免被岛内分裂势力绑架和利用。美国国会以法助“独”向民进党当局发出错误信号，刺激岛内分裂势力铤而走险，助长民进党当局“倚外谋独”的狂妄幻想，但美国炮制涉台法案又不落实的做法，迟早会让民进党当局幻想破灭。

六、结语

在 2024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延续前两次竞选打“中国牌”的策略，发表大量涉华言论，主要谈及经贸政策、能源发展、制造业回流、国家安全、公共卫生、台湾问题等议题，有关政策表述延续性、自利性、煽动性较强^[22]。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在对台政策上将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且带有冒险色彩，极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冲击。2022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明确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23]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总体基调依旧是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保守“鹰派”观点或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风向标^[24]。面对涉台消极因素的叠加震荡以及台海局势的新变化与新挑战，中国大陆要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强化危机管控和战略稳定，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决挫败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岛内“台独”势力的挑衅，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动两岸关系逐步由和平发展迈向和平统一。

参考文献：

- [1] Gustaf Kilander. Trump suggested at fundraiser he ‘would have bombed’ Russia and China [EB/OL]. (2024-05-29) [2024-12-04].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us-politics/donald-trump-russia-china-fundraiser-b2552749.html>.
- [2] 汪曙申.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J]. 美国研究, 2021 (5): 117-134.
- [3] 郭拥军. 躁进与谨慎之间：再论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 [J]. 台海研究, 2018 (4): 63-73.
- [4] 吴迪.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台政策研究 [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2.
- [5]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EB/OL]. (2021-03-29) [2024-11-19].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798>.
-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二〇二五年经济工作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4-12-10 (1).

钟厚涛.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及其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57-167.

- [7]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 强调从六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 [N]. 人民日报, 2014-11-13 (1).
- [8] 克林顿公开重申对台“三不”承诺 [N]. 人民日报, 1998-07-01 (1).
- [9] 钟厚涛. 台湾地区 2024 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22-133.
- [10] Taiwan considers big US defense purchases as overture to Donald Trump [EB/OL]. (2024-11-13) [2024-11-19]. <https://www.ft.com/content/7b218d0f-31dc-4b74-b993-797388767b85>.
- [11] The Donald Trump Interview Transcript [EB/OL]. (2024-06-25) [2024-11-19]. <https://www.bloomberg.com/features/2024-trump-interview-transcript/>.
- [12]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EB/OL]. (2021-05-01) [2024-04-24]. <https://www.economist.com/weeklyedition/2021-05-01>.
- [13]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EB/OL]. (2024-03-28) [2024-11-14]. <https://sgp.fas.org/crs/row/IF11665.pdf>.
- [14] Michael Pompeo. Lifting Self-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he U. S. -Taiwan Relationship [EB/OL]. (2021-01-09) [2024-11-13]. <https://2017-2021.state.gov/lifting-self-imposed-restrictions-on-the-u-s-taiwan-relationship/>.
- [15] Trump White House.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EB/OL]. (2021-01-13) [2024-11-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 [16] Biden says U. S. forces would defend Taiwa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EB/OL]. (2024-09-18) [2024-11-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biden-says-us-forces-would-defend-taiwan-event-chinese-invasion-2022-09-18/>.
- [17] Trump noncommittal on defense of Taiwan [EB/OL]. (2021-12-11) [2024-12-13].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24/12/11/2003828299>.
- [18] 钟厚涛. “资产”与“负债”: 美国“弃台论”思潮的历史演进 [J]. 台湾研究, 2021 (5): 83-92.
- [19]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利马举行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4-11-18 (1).
- [20] Republican Platform 2016 [EB/OL]. (2021-07-21) [2024-11-24]. https://prod-cdn-static.Gop.com/media/documents/DRAFT_12_FINAL%5B1%5D-ben_1468872234.pdf.
- [21]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战略远见: 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 3.
- [22] 张腾军. 从 2024 年竞选言论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4 (4): 41-63+126-127.
- [2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2-11-15 (1).
- [24]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王京菁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 价值图景与实践进路 ——基于“三大体系”视角

刘春泽 张换

（哈尔滨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作为一门生发于中国本土的学科，统一战线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和“力量论”。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总结和凝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经验的需要；是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现实要求。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以学科体系推动统一战线学知识建制的体系性：要尽快明确统一战线学学科属性，助推统一战线学学科规范化发展；要凝练学科方向，形成“论、史、方法、实践”的主干学科和布局合理的分支学科；要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学教材体系建设；要提升统一战线学人才培养。以学术体系推动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要夯实统一战线学的理论基础；推进基础理论研究；加强相关学科理论借鉴；用好“两种力量”筑牢学术共同体。以话语体系推动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表达的自觉性：需要凝练标识性概念；创新话语内容；推动统战话语和叙事方式的互构耦合；提升统一战线话语效能。要总结好、提炼好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和“力量论”，用中国统战实践丰富中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1.014

作者简介：刘春泽，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换，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媒体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政治认同研究”（24BZZ046）

引用格式：刘春泽，张换.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图景与实践进路——基于“三大体系”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168-182.

国理论、用中国统战道理总结中国经验,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 统一战线学;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1-0168-15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 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1]。2024年11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2]。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要求, 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之一, 统一战线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是生发于中国土壤的、具有中国智慧的系统化知识和系统性科学。2022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现在, 统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 而是更重要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 越是变化大, 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3]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为统一战线学的创新发展赋予新使命、提出新要求、带来新机遇。然而, 当前学术界对统一战线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形态还存在不同理解, 社会各界对统一战线的理解仍有待加强。统一战线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建设还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与其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作用不相称, 迫切需要构建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新时代新征程上, 应进一步增强统一战线学的学科自觉、提升学科自信, 加快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统一战线学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体系是对一定专业知识概括后形成的概念范畴与价值原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和实践经验, 总结提炼形成的规律性知识, 这些知识经过体系化、系统化, 形成知识体系^[4]。2022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5]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 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6] (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三大体系”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7]。知识体系的核心是理论和思想, 学科体系必须遵循知识体系的内在规律, 学术体系服从于知识体系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要求, 话语体系的内容由知识体系中的理论或思想构成。综合来看,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三大体系”的核心内涵, “三大体系”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完整外延^[8]。学术界分别围绕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展开了广泛研究。

一是关于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研究。学术界围绕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价值、历程、研

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发展路径等问题开展了研究。目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是一项集政治性、政策性、综合性于一体的学术工程，具有学科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9]。从研究对象来看，统一战线学是一门主要研究在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中，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组成政治联盟的规律的科学^[10]。从学科归属来看，有学者认为统一战线学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的学者认为统一战线学是政治学的二级学科^[11]，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有学者认为应当将统一战线学划归其中^[12]。从学科发展路径看，学术界围绕平台、载体、人才、教材、政策支持等方面，从学科发展的一般性条件展开研究^[13]。二是关于统一战线学学术体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应加强统一战线学“元理论”研究，进一步厘清统一战线学的内涵外延、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和理论基础^[14]。有学者认为应重点回应党的创新理论，如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关注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统一战线等领域。有学者重视方法研究，注重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加强统一战线学交叉学科研究^[15]。另有学者关注学术体系建设的整体性，提出在高校建设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整合不同主体资源，为党的科学决策提供重要支撑^[16]。三是关于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的研究。有学者基于统一战线话语的独特性以及新形势下统一战线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统一战线学话语构建的内容、方法、途径。从内容看，统一战线话语不是语词原子化的简单排列，而是一系列概念、命题、论断等的有机组合，这些不同层面的话语要素共同组成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17]。新形势下，统一战线话语具有引领思想、整合社会、激励大众、传播文化等功能。从话语演变来看，统一战线话语从“统战话语”逐渐演变为“话语统战”^[18]。为此，应创新统战话语内容，提升统战话语传播效力，营造良好的统战话语环境^[19]。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建设高度关联，要推进统一战线话语理念创新、内容创新、载体创新^[20]。有学者从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分析统一战线话语，提出要加强话语内容生产、提升叙事能力、创新话语与叙事体系的生态环境^[21]，推进统一战线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实践话语的融合发展^[22]，加强对中华民族团结话语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深入研究^[23]。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于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研究日渐丰富，但关于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为深入推进统一战线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从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的角度来看，学科体系表现为一种知识的外在建制，构成了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外在条件；学术体系推动知识生产，源源不断生产出时代所需要的统一战线学知识；话语体系集中体现为知识的表达，是知识产品被人们广为接受的主要载体和途径。由此，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形成了知识建制—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的完整闭环。

二、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图景

从理论上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学”和“力量论”的理论凝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实践中，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体现了“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有利于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刘春泽, 张换.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图景与实践进路——基于“三大体系”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68-182.

战线,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有利于凝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经验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显著的精神标识。统一战线学是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系统化知识, 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构建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学”和“力量论”的理论升华。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的伟大实践为构建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资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起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取得了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统一战线在巩固新生政权、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充分调动各族各界人士的积极性,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统一战线呈现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 并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来看, 统一战线以大团结大联合为永恒主题, 始终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周围, 百余年来的伟大统战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 夯实了构建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根基。在此基础上, 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经验的理论凝练和升华。统一战线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也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从战略上谋划统一战线, 并以制度化方式落实统一战线, 为党的事业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 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丰富经验出发, 立足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提炼出原创性理论, 揭示统一战线作为一门科学所蕴含的内在本质和一般规律, 在构建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中进一步凝练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和“力量论”。

（二）有利于发展独具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丰富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内涵, 深刻体现了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要求。一方面, 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拓展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内涵, 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24]。统一战线学既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门学科; 既有理论形态, 也有学科形态。通过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 揭示统一战线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成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生长点。另一方面,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体现了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要求。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是“两个结合”在统一战线领域的生动表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聚焦于实现“真正的共同体”, 呼吁“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形成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 推动成立“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和共产国际,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此外, 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六合同风, 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互助思想、“人心所归, 惟道与义”的德义思想等。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三）有利于在“两个大局”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之中。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利于统筹“两个大局”，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一方面，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必然。“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25]西方对社会主义长期的“污名化”和国外鼓吹“中国威胁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一系列论调，企图制造分裂活动攻击崛起的中国，妄图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而继续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26]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驳斥美西方对中国的污名攻击。另一方面，汇聚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需要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一致性不断加强的同时，我国的阶层结构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利益诉求差异化凸显，统一战线工作范围日益扩大、工作对象更加复杂、工作内容更繁重、任务更艰巨。统一战线工作唯有借助系统化理论，才能有效聚合多元主体力量，整合利益需求，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以理论形态的统一战线学研究推动工作形态的统一战线实践，既有利于坚持、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也有利于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

三、以学科体系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

学科是按照知识性质而划分形成的知识门类，学科集合构成学科体系。学科体系是知识的承载，建立在知识结构、科学分工基础之上，由学科集群、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等要素环节组成。学科体系是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外在建制和组织保障。

（一）明确学科属性，推动统一战线学学科建制的规范化发展

学科归属是新兴学科在建设必须面对和回应的基础性问题，明确学科属性有助于推动统一战线学学科建制的规范化发展，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外在的单位建制和组织依托。

从统一战线学学科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统一战线学建设。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强调“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27]。此后党中央和有关部门多次强调“统一战线学是一门科学”。进入 21 世纪，“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提出要“把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8]。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学学科发展。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29]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从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现状来看，要尽快明确统一战线学学科归属。关于统一战线学学科归

刘春泽, 张换.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图景与实践进路——基于“三大体系”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168-182.

属问题存在以下四种观点。从学科研究对象出发, 有学者认为统一战线学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 从统一战线的源头来看, 有学者认为统一战线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 从统一战线工作的角度, 有学者认为统一战线学是中共党史党建学下属的二级学科; 从统一战线学科建设的整体和作用角度, 有学者认为统一战线学是法学门类的一级学科^[30]。目前, 统一战线学学科归属尚未明确。从长远来看, 统一战线学作为一级学科有利于其在多个一级学科互动协同中发展, 并在其所辖二级学科支撑下完善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相较其他多个学科而言, 同样具有较强实践性特征的统一战线学学科发展相对滞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论断得以正式确立, 40 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取得了快速发展, 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规模最大的二级学科之一。再如, 同样作为“三大法宝”组成部分的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都已分别发展为军事学和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 而统一战线直到 2015 年才首次作为独立学科被纳入国民教育序列, 隶属于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 学科化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 应尽快明确统一战线学学科属性,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实现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二）凝练学科方向，推动统一战线学主干和分支学科群建设

学科群是对一门学科知识领域的进一步细化, 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 需要凝练学科方向、优化学科结构、扩大学科规模, 形成统一战线学主干和分支学科群。

从学科建设的经验来看, 明确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向构成学科的基本要素。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于 2024 年 6 月调整组建统一战线教研部后, 拟从 2025 年开始按照统一战线理论、党的民族宗教理论与政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港澳台统一战线、国际统一战线 5 个子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山东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统一战线学研究中心。其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显示, 统一战线学设置了 6 个招生方向: 统一战线历史、理论与政策, 中国政党制度, 参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 统一战线中的民族与宗教理论, 人民政协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海外华人华侨与文明互鉴。《统一战线学研究》作为目前统一战线学领域唯一进入 CSSCI 扩展版的期刊, 在栏目上设置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研究、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研究等专题。

从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看, 应加快形成“史(历史)、论(理论)、方法、实践”四大主干学科和若干分支学科。目前, 统一战线学已经形成了包括统一战线史(含思想史和制度史)、统一战线理论(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统一战线实践(政党、民族、宗教和社会实践等)在内的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群^[31], 但还存在不均衡现象。如对统一战线基础理论、基本原理, 统一战线史等子学科建设较为薄弱, 对统一战线学方法(工作方法和研究方法)研究阐释不足等。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需要深耕上述方向, 深化统一战线学研究方法, 形成“史(历史)、论(理论)、方法、实践”四大主干学科, 并进一步发展众多分支学科。

（三）完善教材体系，加强统一战线学知识体系化的规范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 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32]统一战线学教材体系的建设有利于推动学科知识规范化传播, 对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统一战线学学科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教材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在不断完善之中。建立与四大主干学科相适应的教材体系势在必行。本研究结合山东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统一战线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材体系，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馆藏图书，找到四大主干学科对应教材专著 16 部，如表 1 所示。从“史、论、方法、实践”四大主干学科对应的专著来看，统一战线史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统一战线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等。关于统一战线学基础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有《统战理论讲座——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纲要》《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概论》《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统一战线新论》《统一战线学研究》等。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专门的统一战线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出版。关于统一战线实践的代表性著作有《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参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破解宗教问题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统一战线工作方法论》等。上述著作的作者多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各级社会主义学院、高校等。从这些专著的出版社来看，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专业教材出版社的比例有待进一步提高。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学教材体系建设，强化“马工程教材”“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教材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以高质量教材体系助力专业人才培养，助推学科内涵式发展。

表 1 统一战线学四大主干学科对应的专著

作者	书名	出版时间	出版社
朱真	统战理论讲座 ——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纲要	1989	中国文史出版社
阎志民	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概论	1990	中国文史出版社
王世豪、刘庆祥、 贾平安	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	1993	外文出版社
中共中央统战部政策理论 研究室	统一战线工作方法论	199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刘传学、丁允才、丁三青	统战学	1993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蔡世藩、肖阳明	中国统战学	1995	天津教育出版社
姜汝真	统一战线思想史	1998	吉林人民出版社
罗振建、吴文华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05	重庆出版社
王小鸿	多党合作思想史	200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李小宁	统一战线新论	2007	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金河	中国政党政治研究	2007	中央编译出版社
孙瑞华	中国参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007	华文出版社
中共统战部研究室	统一战线实用工作方法	2011	华文出版社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统一战线教程	20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叶小文	中国破解宗教问题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201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孙信、张树桐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	201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四）加强人才培养，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动力源

专业化的人才培养是学科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刘春泽, 张焕.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图景与实践进路——基于“三大体系”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68-182.

提供人才支撑和动力源泉。目前, 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形成了三种模式。

一是由统战部门主管, 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省级社会主义学院为主阵地, 对党外人士进行培养教育的模式。社会主义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 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就学科发展而言, 社会主义学院需要加强统一战线学专业化、学科化的人才培养。二是由社会主义学院和高校联合培养的模式。2015年1月, 教育部正式批准将“统一战线学”纳入国民教育招生序列, 山东大学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联合培养统一战线学方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同年, 信阳师范学院与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培养“统一战线学”方向硕士研究生。2018年12月,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提出把“培养统一战线理论人才”作为社会主义学院的一项基本任务, 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 可以与国内有关高校联合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33], 多所省级社会主义学院与高校建立联合培养模式。2020年6月,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与湖南师范大学合作培养统一战线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将该方向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一级学科。2022年7月,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与广西师范大学在党的建设学科方向下联合培养“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硕士研究生。2024年6月,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与浙江工业大学依托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人才培养。三是党校(高校)独立进行统一战线人才培养的模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5年在统一战线教研部招收统一战线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标志着统一战线人才培养迈向新台阶。统一战线学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涉及学科建设、教材、师资、课程等系列工作。社会主义学院拥有较为雄厚的统战学科师资力量, 但目前大多不具备研究生招生资格; 而高校具有丰富的学科门类, 但统一战线学专业的师资力量相对匮乏。因此, 应加快形成本硕博贯通的一体化培养机制, 为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和事业发展输送高质量专业化人才。

四、以学术体系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

学术体系是围绕特定研究对象形成的学理性知识和有秩序的学术认知体系。知识生产是在已有知识和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新知识的过程, 反映着一门学科的生机和活力, 而学术研究是知识生产的引擎和动力, 要以学术体系推动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性。

(一) 夯实理论基础研究

理论基础是知识体系的根基, 为知识体系提供理论论证, 确证其学理上的合理性和价值上的合法性^[34]。统一战线学理论基础确保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的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统一战线学的理论基础, 位居核心和统摄地位。其中包含了三个层次: 一是统一战线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最基本的方法论指导。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统一战线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指导。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方法指导。例如, 人民的立场、实践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等, 特别是“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两个结合”的基本要求。二是统一战线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与统一战线学

高度相关的理论构成了统一战线学的理论基石。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理论：无产阶级“联盟”理论、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历史合力理论等。三是统一战线学的理论基点。这由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统一战线的最直接论述组成。如毛泽东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看作革命首要问题，提出要团结真正的朋友，即“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36]。毛泽东明确了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三大法宝”地位，坚持“求同存异”，巩固社会主义阵营。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37]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原创性论断，进一步揭示了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明确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是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等^[38]。

（二）推进基础理论研究

相对于理论基础，基础理论是一门学科的骨架，置于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之中，对统一战线学具有理论支撑作用^[34]。

统一战线学基础理论包含本体论（是什么）、方法论（何以能）、价值论（为何能）等基本问题，还包括由此引申出的其他基本理论，如统一战线的发生论、形态论等。从统一战线的本体论来看，学术界对统一战线学“是什么”还未有定论，“统一战线学”“统战学”“统一战线学科”“统战”“统战工作”等概念容易混淆。在相关概念群中，统一战线的外延最为广泛，包含了理论形态的统一战线学、工作形态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学科形态的统一战线学学科。从统一战线的发生论来看，统一战线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团结、互助、协作等现象在原始社会就存在，人们以部落或氏族为行动单元，共同抵御外侵。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团结的范围更加广泛，由最开始的基于劳动的团结延伸到社会观念、价值行为、社会文化等方面。从这一意义上讲，统一战线学这一概念虽然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但其发生有着普遍性。因此，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更要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多基于“团结现象”的知识产品，为人类知识和文明发展提供推动力量。从统一战线的形态论来看，统一战线具有工作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治理形态、文化形态、学术形态和思维形态等。在知识生产中，统一战线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团结、共识、协商、底线、共赢等思维构成了统战思维的基本内涵^[39]。统一战线还具有思想的形态，表现为通过政党协商、政协协商和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增进思想共识。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形态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夯实统一战线学的理论基础。从统一战线的方法论来看，统一战线是“强大法宝”，需要运用系统方法提升统一战线工作的艺术性。统一战线还是一门科学，科学的本质就是科学的方法。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化统一战线学的研究方法，以研究方法推动统一战线工作方法的科学化，以统一战线丰富实践凝练统战工作方法，形成理论方法和实践方法的双向互动，共同驱动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三）加强相关学科理论借鉴

统一战线学是实践之学、经世致用之学，统一战线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强的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加强对相关学科的理论借鉴，为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提供新的增长点。

刘春泽, 张换.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图景与实践进路——基于“三大体系”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168-182.

统一战线学是一门具有鲜明协同性、实践性、多学科性质的社会科学, 涉及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学术界需要加强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借鉴, 做到“为我所用”。如从政治学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五大关系, 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 从社会学利益分析视角研究统一战线各阶层的关系; 从语言学视角研究统一战线话语及其话语权力的变革; 从叙事学视角研究统一战线叙事方式的创新; 从传播学视角研究统一战线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完善大统战传播格局; 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研究如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从发生学视角探究统一战线的发生、起源与演进; 从管理学视角研究如何深化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提高统一战线工作治理水平; 从文化学研究文化形态的统一战线, 以文化认同促进团结统一;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视角分析统一战线“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等。在加强学科理论借鉴的时候, 不能生搬硬套, 要坚持问题导向、遵循以“统一战线为主”的原则, 推动统一战线学知识增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提升统一战线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除了使用一般定性研究方法, 还要特别注重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 如问卷法、访谈法、田野调查法、口述史研究方法、大数据研究方法、混合研究方法、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等。

(四) 构建学术共同体

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 要运用好建制性和研究性“两种力量”, 不断推动统一战线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目前, 统一战线学研究力量较为分散, 分散在高校、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党校等机构。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政治主导的逻辑, 加大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 另一方面要按照学术发展的逻辑, 共同促进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一是以统战部门为主导、其他力量协同, 为统一战线学学术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要进一步加强政策供给与制度力量, 通过顶层设计, 以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学建设。要以统战部门为主导, 推动组织机构、科研、人才培养、课程、教材等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对统一战线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作用。2004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提出, 中宣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作为主管单位密切配合, 取得显著成效。二是以高校和各级社会主义学院为重要依托, 为统一战线学学术共同体搭建高效平台。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是主体平台, 党史党建研究院和政治学院是重要支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同步发挥在统一战线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不同研究主体要在课题申报、项目论证、学术研讨、团队组建、科研攻关等方面发挥力量协同和优势互补作用。三是以学术期刊为基础支撑, 推动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统一战线领域的研究成果集中发表在各级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上。重庆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统一战线学研究》期刊着力提高办刊综合质量, 2023 年成为 CSSCI (扩展版) 来源期刊。《统一战线学研究》期刊为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作出期刊努力, 发掘、培养、联系作者, 策划相关选题, 研究好中国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 我国要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领域高质量学术期刊建设, 发挥期刊的支撑作用。

五、以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

话语体系是学科建制的基础, 也是学术体系的表达。完善的话语体系有助于提升统一战线话语

效度，巩固统一战线话语权，促进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表达与国际传播。

（一）凝练话语概念

概念是理论的基础，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抽象化提炼。凝练统一战线学话语概念，应当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以时代变迁为风向标，落脚于统一战线学自身特点，形成统一战线学标识性概念。

一是统一战线学标识性概念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应当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中国特点和民族特色，提炼具有标识性的统一战线学概念。一方面，统一战线话语应坚持体现时代特色。统一战线话语经历了从“以团结赢得斗争”到“以团结强国复兴”的话语演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面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兴起，统一战线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需要立足于新形势，积极拥抱“数智”时代，构建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统一战线话语概念。另一方面，统一战线话语要坚持守正创新。尽管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话语有所不同，但“大团结大联合”的话语本质没有变，统一战线“集民心、聚民智、合民力”的内涵没有变。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变与不变”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坚持守正创新，把握话语内核、创新话语方式。二是统一战线学标识性概念的构建应体现深厚学理性。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学理上提炼统一战线学的标识性概念，形成与“联合”“共识”“团结”“凝聚”“一致性”等统一战线学概念群密切相关的话语体系^[40]，对统一战线的性质、构成、范围、主题、任务、特征等作出学术性的话语表达。从理论维度讲，构建统一战线学标识性概念需要重点厘清统一战线学的四个基本概念，即领导者、同盟者、共同利益及政治联盟；明晰统一战线学的两个基本范畴，即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

（二）优化话语内容

统一战线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不断优化话语内容，将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效能。

一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以“团结奋斗”话语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五个必由之路”，其中一个必由之路即“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成功之道，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得出的规律和结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强大作用。二是巩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以“求同存异”的话语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强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理念，这与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走和平发展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价值高度契合。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引领，构建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国际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在政治领域，统一战线话语要围绕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展开。在安全领域，统一战线话语要围绕总体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构建普遍安全的国际统一战线展开。在经济领域，统一战线话语要突破西方“零和博弈”的话语悖论，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扩大沿线国家和地区“朋友圈”。在文化领域，以中华文明话语打破“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等西方中心主义论调，为人类文明的交流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在生态领域，积极弘扬中国主张，把清洁美丽作为价值追求。三是坚持大安全

刘春泽, 张换.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图景与实践进路——基于“三大体系”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68-182.

与大统战。面对西方话语霸权袭扰，需要强化话语意识、构建话语体系。面对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政党制度的抹黑、歪曲、污名，要敢于发声、掷地有声，把道理讲明白，从根本上解决“挨骂”问题。防范化解统一战线领域重大风险，要从战略高度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统战声音。

（三）创新话语方式

在数字时代，统一战线的话语表达要善于运用叙事元素，推进二者互嵌同构。

从话语结构看，要巧妙运用统一战线多种话语。统一战线话语分为生活话语、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等。用好统一战线生活话语，善讲“大白话”、勤用“贴心话”、常讲“知心话”。如用“人心齐，泰山移”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以“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来比喻民族团结，以“众人拾柴火焰高”来阐释统一战线最朴素的团结道理；用“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作为检验统一战线工作的标准，用“一盘棋”“大合唱”比喻大统战工作格局，用“公约数”“同心圆”等数学概念阐明统一战线的目的旨归，用“不做快餐要做佛跳墙的功夫菜”比喻统一战线要交“挚友诤友”，用“自家的肉不香，人家的菜有味”说明要坚定中国政党制度自信，用“舟水之喻”说明“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的重要性，等等。这些话语人们耳熟能详、家喻户晓、广为传颂，更益于人们理解和接受。讲好统一战线政治话语，使统一战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已形成一定的特色话语，要聚焦统一战线的民主话语，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统战民主话语、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的团结话语、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发展话语。阐发统一战线学术话语。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学理支撑，以学术话语提高统一战线诠释政策的解释力和现实观照。

要灵活运用统一战线多种叙事方式。叙事即“讲故事”，分为文本叙事、图像叙事、国家叙事、情感叙事、数字叙事等。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推动其话语体系创新，形成大叙事格局、完善叙事体系、改进叙事方式。具体而言，善用宏大叙事，即统一战线的国家叙事、政党叙事、阶级叙事、民族叙事。善用情感叙事、微小叙事和生活叙事，提升统战话语的亲力和共情力。比如，“三千孤儿入内蒙古”的故事以通俗、简短的话语诠释了跨越民族、地域、血缘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永恒主题，至今仍是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推动统一战线学不同话语与叙事方式同构互嵌。推动统一战线学话语与叙事的互嵌同构，形成统一战线政治话语—图像叙事/文本叙事/数字叙事、统一战线生活话语—图像叙事/文本叙事/数字叙事、统一战线学术话语—图像叙事/文本叙事/数字叙事的有机整合。此外，要立足大历史、大空间、大视野，规避“资本技术裹挟”误区，保障网络统战安全和话语叙事优势，从“技术依赖”转向“数字赋能”，推动形成基于“文本—图像—视频”于一体的多模态表征和人机协同的复合性统一战线话语叙事方式。比如，杭州市围绕数字统战，形成了数字体验馆、数字驾驶舱、统战微信公众号、数字统战平台、融媒体传播矩阵“五位一体”的统战工作模式。

（四）提升话语效能

提升话语效能是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要求。统一战线要着眼于国内社会实践，汇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也要面向世界形成国际话语权，促进人类社会合作共赢。

一是要以党对统一战线话语的领导力为方向，提升统一战线的话语权。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是否科学、有效和管用，关键在于能否获得广泛认同。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决定着统一战线的方向、前途和命运，也是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统一战线的向心力，增强统一战线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具体而言，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确保统一战线的话语始终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二是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升统一战线国际话语的传播力。中国的统一战线话语不是西方话语的“翻版”，也不是传统话语的“复版”，而是在服务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形成的独特话语实践。要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不断加深国外民众对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社会环境，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这个背景下，促进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科学表达与国际传播，提升统战话语的凝聚力、引领力，进一步增强统一战线话语的传播力、影响力。三是聚焦统一战线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升统一战线学的国际影响力。虽然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生发于中国实践，但也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普遍政治现象，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基于科学的知识角度，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伟大实践中提炼出能够被国际社会接受和理解的一般性理论，为团结的现代化、人类现代化提供一般性的知识产品，为“人类知识的总和”作出中国统一战线学的原创性贡献。

六、结语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说到底就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理论创新体系，而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全过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因此必然以问题议程为核心^[41]。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聚焦党和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前瞻性思考、整体性谋划和方法论创新，注重“三大体系”之间的结构耦合，促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协同发展。运用“两种力量”，加强政策主导、国家扶持和顶层设计，同时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尽快完成从“明确属性”到“独立学科”的发展转变。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要统筹“两个大局”，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巩固和拓展团结基础，优化和升级团结方式，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形成共圆中国梦、创造历史新篇章的强大合力。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总结好、提炼好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和“力量论”，用中国统战实践丰富中国理论、用中国统战道理总结中国经验。当然，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呈现方式不限于“三大体系”，还有其他重要维度需要社会各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 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

刘春泽, 张换.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图景与实践进路——基于“三大体系”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68-182.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蔡奇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4-11-30 (1).

- [3]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求是, 2024 (2): 4-7.
- [4] 张东刚.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 (5): 90-104.
- [5]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2-04-26 (1).
- [6]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6.
- [7] 谢伏瞻.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N]. 人民日报, 2022-05-17 (9).
- [8] 郁建兴, 黄飏.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 [J]. 政治学研究, 2023 (3): 14-24+167-168.
- [9] 徐锋. 统一战线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J].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2): 43-50.
- [10] 许奕锋. 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回溯性反思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3): 131-142.
- [11] 张毅. 统一战线学的构建: 学科、学术和话语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3): 51-54.
- [12]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15.
- [13] 钱再见. 从科学到学科: 新时代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 (4): 45-53+242.
- [14] 杨跃进. 论统一战线概念的外延 [J].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2): 50-60.
- [15] 路璐.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由来新探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4): 92-99.
- [16] 闫涛, 刘浩然. 高校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的建设与践行路径 [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报, 2024 (2): 32-35.
- [17] 杨彬彬. 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构建机制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52.
- [18]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26-144.
- [19] 丁俊萍, 颜苗苗.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建构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3): 1-14+181.
- [20] 罗振建, 林华山. 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 (1): 32-40.
- [21] 龚静阳.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 梳理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29-146.
- [22] 郭路.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构建与表达——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实践话语的互动融合 [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6): 28-32.
- [23] 梁杰皓, 丁俊萍.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基础、原则和价值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 (4): 100-106+123.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51.
-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27.
- [26]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609.

- [27]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15.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G]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581.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39.
- [30] 王军. 推进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反思、基础、归属与对策 [J] .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5）：22-30.
- [31] 徐锋. 统一战线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J] .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2）：43-50.
- [32] 习近平. 论党的青年工作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78-179.
- [33]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N] . 光明日报，2018-12-26（1）.
- [34] 刘建军. 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基础的体系建构研究 [J] .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1）：84-93.
- [35]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 [36]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2.
- [37]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3.
- [38] 王冉. 论习近平对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发展 [J] .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6）：33-35.
- [39] 张献生. 统战思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 [J] .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4）：13-21.
- [40] 商红日. 共同话语的形成与统一战线话语权 [J] .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2）：28-38.
- [41] 韩云波，陈思思. 社科学术期刊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理论创新之问题议程的研究 [J] . 科技与出版，2024（4）：5-13.

责任编辑：龚静阳 校对：王京菁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yj/hlwz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5年第1期 总第49期 第9卷

双月刊 2025年1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王 鸿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微信公众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定价：20.00 元